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ZILIAO

4

1989

总第58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9年第4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204,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ISBN 7-01-000636-9/Z·30 定价 3.00 元

AS
7006

76401



200010843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9年第4辑目录

(总第58辑)

DF64/51

对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的初探 肖贵铤(1)

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续完).....〔民主德国〕君·施泰格尔(19)
张念东译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困惑与思考(提纲)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张奇方(31)

恩格斯晚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贡献..... 〔苏〕鲍·塔尔塔科夫斯基(38)
籍维立译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苏〕A·齐普科(46)
刘彦章摘译

目前围绕《资本论》初稿进行争论书..... 〔苏〕阿·切普连柯(54)
马兵译



文献和资料

马克思和约·列列韦尔..... 〔波〕A·格拉布斯基(67)
华明译

论策略..... 〔俄〕格·普列汉诺夫(81)
高敬增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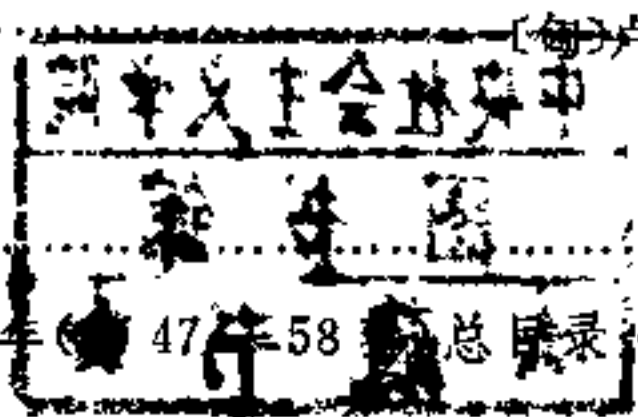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全国代表会议记录(续)..... 王士云译(92)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葛兰西思想的主要特点 张 本(117)
- 阿尔贝斯论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 殷叙彝编译(135)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
的比较(二) [美]劳·克拉德(148)
莫立知译
-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法]克·巴雷尔(161)
李其庆译
-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英]J·施瓦尔茨曼托(172)
俞可平编译
- 弗兰尼茨基论实践与辩证法的基础 柴方国(191)
- “真正的哲学是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
——霍克海默的晚期思想
..... [联邦德国]H·贡尼 R·林古特(205)
任立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 人类思维与活动的本体论基础
..... [匈]卢卡奇·捷尔吉(220)
李惠斌译
- 敬告读者 (235)
- 本刊1987年—1989年(47—58)总目录 (236)



对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 理论的初探

肖 贵 毓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设想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首先经过过渡时期,尔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研究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思想内容,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一、基本思想的形成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中提出来的。但是,就这个理论表现形式来说,它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原理一样,首先是从前人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

(一)空想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思想及其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早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从18世的马布利、巴贝夫到19世纪40年代的卡贝、布朗基、魏特林和德萨米等许多空想家都谈了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为后人创立科学的过渡时期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材料。例如,德国的魏特林在1842年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就比较系统地讨论了过渡时期的问题。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推翻旧

制度到建成和谐、自由和共有共享的社会之间，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革命成功后应立即建立革命政府，并采取如取消继承权，发展生产，办好学校和军队等一系列的“最初的”过渡性措施；“在过渡时期专政是必要的，以便把新的组织建立起来”^①；建立这种新的组织即“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同时，它也是“逐渐地剥夺富人”发财致富的手段^②；还谈到了实现过渡和进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通过和平方式或精神力量来实现；另一种则是通过暴力或物质的力量来实现，等等。

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谈到的过渡时期思想，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曾对这本书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魏特林的这部著作，是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是“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从他这部著作中所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倾向，“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③

但是，魏特林和其他的空想家一样，由于没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既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又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因此也就不能科学地说明过渡时期的问题。例如，在“专政”的问题上，魏特林的唯心史观暴露得十分清楚。他看不见无产阶级，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伟大的人物出现。魏特林说：“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由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即耶稣基督——引者注）更伟大。”^④实际上，这第二个救世主不是别人，

①②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68、249—2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④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72页。

“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⑤

魏特林的思想对工人运动影响比较大。当时，他不仅是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同盟的理论家。例如，在1845年2月和1846年1月，同盟在伦敦举行了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会上，讨论了由魏特林列出的18个问题。其中，第17个问题，就是“在过渡时期应该更多地注意什么？是原则的核心呢？还是个人自由？”^⑥经过讨论，参加会议的盟员已经同意，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并反对进行所谓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试验，等等。但是，这些人也和魏特林一样，既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看不见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最终也就不能科学地解释过渡时期的问题。

（二）形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科学地论述过渡时期的问题，固然与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但是，他们首先是完成了哲学方面的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系统地制定了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作用的理论，才能科学地说明过渡时期的问题。因此，他们对过渡时期的论述，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而逐步变成科学的。

第一，开始提出的思想还带有旧的痕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了关于过渡时期思想的萌芽。他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提出：“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33页。

^⑥ 转引自马丁·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2页。

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⑦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的思想，还带有“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⑧因为在1844年，马克思还处在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初期。他和恩格斯一样，都是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而走向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创立唯物史观，不能科学地说明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因此还要借助德国古典哲学的某些命题和范畴，特别是黑格尔的“异化论”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他在这段话中，就是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复归”或“自我扬弃”的逻辑的结论，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从而使他的论述还带有伦理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

第二，科学地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系统地制定了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作用的理论，因此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并且在这个科学思想的基础上，他们明确提出“通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⑨，从而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三）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过渡时期”的科学概念

1847年6月，恩格斯应约出席了“正义者同盟”改组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面说过，“正义者同盟”在此以前，虽然曾讨论过有关过渡时期问题，但并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他的意见，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⑧ 同上书，第21卷第297页。

^⑨ 同上书，第3卷第221页。

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代替了原来的“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他在这次代表大会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吸收了同盟过去和这次大会讨论过渡时期问题的成果，首次使用了“过渡时期”的科学概念。不仅如此，《信条草案》中所列举的三项过渡性措施中，也有类似魏特林等空想家们曾经提到的“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加以限制以及对儿童实行“公费教育”等内容。当然，这些措施的内容及其实行的目的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说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却进一步说明，恩格斯考虑到他们所提供的积极思想材料。

恩格斯在《信条草案》中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不仅与魏特林和“正义者同盟”的思想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相比也前进了。例如，《信条草案》认为，从财产私有制到公有制之间一段时间是“过渡时期”。并且指出，以财产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是一下子能实现的，而是“逐步前进的。”这是因为“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⑩。又如，《信条草案》还明确写道：“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⑪稍后，恩格斯在另一篇著作中把这一思想阐发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⑫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恩格斯还具体分析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他根据同盟各个支部对《信条草案》讨论的意见，并受巴黎区分部的委托又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他在《原理》中，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问题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占人民的大多数。而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地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

^{⑩⑪} 同上书，第42卷第378、379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6页。

农和城市小资产者^⑬。

（四）《共产党宣言》阐明了过渡时期的基本思想

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受大会的委托，起草了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制定《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又是《宣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文件。因此《宣言》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过渡时期的基本思想。其主要的內容是：

首先，《宣言》谈到过渡时期的开端，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接着，《宣言》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经济上的过渡相互关系以及过渡时期的进程问题又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再接着，《宣言》还例举了10项“过渡性”的措施。同时强调说，这些措施是“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所必须首先采取的；它虽然在经济上似乎还不够充分和没有力量，但是在运动的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会是不同的。”

最后，《宣言》谈到过渡时期结束时说，在发展的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灭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即国家政权归于消亡。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⑬ 同上书，第1卷第219页。

件。”^⑭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到 1847 年底的《共产党宣言》已经“阐明”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思想。其主要的内容是：“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⑮

二、思想的深入发展和理论的论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由于参加并总结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对过渡时期的论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 1875 年，他们又在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中，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理论的论证。

（一）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理论的发展

第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从总的说来，1848 年欧洲革命虽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的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⑯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中，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而发展了过渡时期国家的理论。

首先，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以前的

^⑭ 同上书，第 273 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0 页。

^⑯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29 页。

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①；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②，等等。这些提法尽管已经包含了“打碎”和“专政”的思想，但既没有明确提出这些科学的概念，又没有展开论述。现在，马克思在为总结法国革命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与此同时，他还在1850年3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的概念。

其次，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当时，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者，都“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他们“把未来的历史过程想像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并且企图“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这个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表现出的各个阶段，从而也就否定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同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论断。他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④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个论断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272、417页。

④ 同上书，第479—480页。

再次，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布朗基等人的“专政”也有本质的区别。诚然，如前所述，法国空想家布朗基等人早就有了“专政”的思想。他甚至在谈到1848年二月革命时还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和实行必要的改革，需要革命专政，即“巴黎专政”^①。德国的魏特林也说过，1849年大多数的法国共产主义者都倾向“专政制度”，以适于“由旧的组织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组织的过渡时期”^②。但是，他们这些人由于受唯心史观的支配，“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③而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他在上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论断中，特别加了重点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从而和布朗基等人的“少数人的专政”区别开来。

总之，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时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对此，他在1852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概括性地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段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④。

第二，阐述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究竟应当建立什么样国家形式的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中，曾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是“**红色共和国**”的国家形式^⑤。当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对

① 《布朗基文选》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

②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0—5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⑤ 同上书，第1卷第474页。

这个思想也没有展开讨论。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公社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再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③}他和恩格斯在1872年把这个结论写进了《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作为对《宣言》的重要修改和补充。那么，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述了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有权对政府公职人员实行选举、监督和罢免；取消官吏的高薪和特权，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公社应当成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式并组织民族的统一，等等。总之，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②④}因此，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②⑤}。它“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⑥}

（二）系统阐述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还比较深入和系统地论述了关于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所谈到这个问题的主要思想是：首先，指出巴黎公社必须

^{②①} 同上书，第2卷第372页。

^{②②③} 同上书，第424、374、378页。

坚持阶级斗争。因为公社虽然标志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敌人还没有消灭，旧社会组织还没有消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其次，强调公社的工人阶级斗争必须经历“几个不同阶段”。马克思认为，在过渡时期，未来新社会的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种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从而使各种生产形式摆脱掉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即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因为这个伟大的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

然后，还从经济规律上说明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马克思说，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这就好象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被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一样^④。

马克思还进一步从社会发展规律上，揭示了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他在《法兰西内战》（正文）中，把上述《初稿》的思想概括为：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级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⑤在这里，马克思从理论上一方面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必将到来，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

^④ 同上书，第 416、417 页。

^⑤ 同上书，第 379 页。

果,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又把《初稿》中关于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的内容精辟地概括为:“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明确过渡时期必要性的意义很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过渡时期原理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找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过渡时期“长”或“短”的依据。一般地来说,当他们谈到有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问题时,总是说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时期的。例如,方才说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是这样说的。又如,在1874年,当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歪曲过渡时期的国家“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的时候,马克思批判道:“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②

但是,当他和恩格斯把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相比较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和对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过渡时期时曾说道:“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③恩格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④在道义上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④。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还从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谈到了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快”或“慢”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涉及了对过渡时期“长”或“短”的看法,但它和前面的意

^② 同上书,第6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9页。

义不完全相同。例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经设想，共产主义革命至少在英、美、法和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⑤

（三）对过渡时期理论的论证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进一步证明了过渡时期的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样一个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同志李卜克内西等人并没有接受。他们在制定的《哥达纲领草案》中，却散布了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自由国家”的错误观点，从而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基本原则。对此，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在批判中，不仅运用了《资本论》中的伟大科研成果，而且把巴黎公社的经验普遍化，从理论上把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进行科学的论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⑥这是马克思对过渡时期理论的经典表述。

但是，长时期以来，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即通常说的“大过渡”的观点。这种理解，从理论上说，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后来人们通常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包含在过渡时期里面了，从而混淆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思想相矛盾。

^⑤ 同上书，第221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21页。

实际上,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或低级阶段之间的时期。因为他在这段话中已经明确指出,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和经济上的过渡时期是相适应的,即“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这段时间。在这里,从字面上看,句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没有说明是指第一阶段或高级阶段,容易被人们误解。但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理论。因此,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包括第一和高级阶段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出现的。由此说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的时期和国家了。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国家制度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它们不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问题了。因此,不能把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混为一谈。

三、理论的重要补充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前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当怎样继续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他们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到了7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了90年代,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是他在晚年,对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一)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1870年,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农业工人解放问题时就提出,只有把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合作团

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②

1874年，马克思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论调时，又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不必等待小农经济被资本主义所排挤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革命时机成熟，无产阶级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夺取政权，然后再“以政党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③。

到了1894年，恩格斯针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特别是法、德两国党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上坚持“保护农民小块土地”的错误，发表了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作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其中，突出的思想之一，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他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在对待农民土地的问题上，总的说来，应当明确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④这是党纲的一项基本原则。恩格斯还指出：“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⑤

（二）提出合作社的生产是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

这个思想，开始是恩格斯在1886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的。信中写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么，这里说的“合作生产”即“合作社生产”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合作社生产”是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95页。

③ 同上书，第633页。

④⑤ 同上书，第4卷第302、293页。

专政为前提的。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家舒尔采-德里奇和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等人也都提出建立合作社。但是，他们的合作社是“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社。”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建议，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说：“我的建议要求把生产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第二，这种“合作社”，是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明确提出，建立这种合作社，首先是无产阶级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①显然，恩格斯当时说的合作社，是过渡时期的性质。

后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合作社”的过渡时期性质。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设想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是由个体农民组成的。它是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的田庄，共同出力耕种”。但是，社员是“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②。这当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恩格斯还指出，随着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无产阶级就可以领导农民“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也只有当“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的时候^③，合作社的经济才算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③ 同上书。

(三) 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政策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还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各种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他强调说：“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④小农，也就是“小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恩格斯认为，他们既是私有者又是“未来的无产者”。因此，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对他们应当采取宣传、示范、教育、等待和帮助的措施和政策，引导他们自愿地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对他们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强迫命令，更不能采取暴力的剥夺（无论有无报偿，都一样），只能坚持自愿的原则。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争取、团结和教育农民“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⑤；而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本人又是完全属于专靠剥削生存和发展的腐朽寄生的阶级。因此，恩格斯说：“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当然，“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⑥；至于谈到如何改造介于小农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中农和大农时，恩格斯认为，对这类“较大的农民”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地说，对待这类农民“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⑦。应当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即使是顽固的中农和大农，也会改变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但是他们**★揭示资本主义★**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中，在总结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中，在剖析和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某些工人政党的错误理论

^④ 同上书，第298页。

^{⑤⑥⑦} 同上书，第312、314—315、314页。

领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和科学的预见。这些思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和科学的方法。正像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因此，关于过渡时期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⑨，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续完)

[民主德国]君·施泰格尔

三、耶拿授予卡尔·马克思博士学位

——原始文件的陈述及其命运^①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由于这篇论文被耶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²⁹。哲学系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的决定是通过函件于4月13日作出的。³⁰马克思是在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从柏林申请博士学位的,就是说他无须亲自赴耶拿。没有进行口头答辩。

根据1840年耶拿通用的1829年哲学系章程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本人不到场并且不举行口头答辩的情况下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是可能的。当然,这不是定例,但19世纪前半叶在耶拿却是常有的事,在这样做时,系里对博士论文的考核也并不总是十分认真的。哲学系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不举行口头答辩(即在候选人不到场的情况下)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如下:申请人必须“1.证明本人以前完成的大学学业;2.提交有效的操行评语和品行端正的证明;3.向系里呈交一篇用拉丁文印刷或书写的应考论文及其作者身份的确凿证明。”³¹

马克思把他的博士论文连同注明日期为1841年4月6日的一封信以及送审材料(波恩和柏林两大学的学业证明、自传等)和考试费用十二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寄给了哲学系主任³²。系主任、哲学教授卡·弗·巴赫曼很快审阅了博士论文。巴赫曼在给系务委员们的推荐信中推荐了这篇论文,并作出评语认为,该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因此,他“认为该候选

^① 本文第一、二部分载于本刊1989年第2、3辑。——编者注

人实应授予学衔”^②。哲学系系务委员(正教授)都毫无保留地未加评论就同意这一评语。他们是:历史学家亨·卢登,古典语文学家斐·哥·汉德,化学家约·沃·德伯赖纳,哲学家克·恩·哥·莱茵霍尔德和雅·弗·弗里斯,大学图书馆馆员卡·威·格特林,农业科学家弗·哥·舒尔采。

连哲学系长老,古典语文学家亨·卡·阿·艾希施泰特也没有对博士论文提出异议。诚然他没有签字,因为当时他在病中。但是他收到了分给他的考试费³³,因此可以认为,他后来还看过论文,或许就把它留了下来(?)。

就在巴赫曼表明态度(1874年4月13日)的两天以后(4月15日),签发了拉了文的博士学位证书³⁴。证书表现了当时常用的耶拿证明文件的封建传统形式。在祈求上帝保佑并表示祝福之后,证书首先提到该大学是16世纪在皇帝斐迪南治下创办的,然后以冗长的学究式的腔调和相应的赞辞首先称颂了1841年管辖该高等学校的萨克森恩斯特世系各位公爵,特别是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卡·弗里德里希“校长阁下”。接着以不断变小的字母印着实际校长(“副校长阅下”)以及系主任并列了他们的各种头衔和各科学家协会会员名称,以便最后在下面三分之一处按这种等级制列出本文件中最重要的名字即博士的姓名,并且凭哲学系的印章确认授予的博士学位。

对于马克思为什么恰好在耶拿申请博士学位的问题,并不是在一切细节上都能明确地作出回答的。由于资料很少又不完整,这个问题有不少地方是很费猜测的。可以肯定的是,1841年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比在柏林有利。自1836年以来,他一直在柏林上大学并发展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拥护者。耶拿当时有萨克森恩斯特世系辖区的邦立大学,位于普鲁士境外。³⁵而在普鲁士,自1840年弗·威廉四世上台执政并任命约·阿尔勃莱希特·弗·艾希霍恩为文化大臣以来,对高等学校实行了一种思想上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99页。

端反动的政策，其目的之一正是要反对黑格尔哲学。1841年，马克思原打算大学毕业以后，在普鲁士的波恩大学开始教书生涯，为此必须有博士学位，但是他不愿意通过在柏林提交一篇迎合普鲁士思想上的反动势力的博士论文去谋求任教的前程。即使连写一篇应景文章去应付“令人讨厌的考试”³⁵（象布·鲍威尔所说的），他也不予考虑，因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鉴于笼罩着柏林的那种气氛，在那里他必须接受反动的法学家施塔尔的考试，马克思认为还不如把考试转移到另一所大学而且是耶拿大学去进行更好些”³⁶。此外，1841年春马克思急于取得博士学位，因为他想迁居波恩，他的朋友、当地大学的非公聘教师鲍威尔作为盟友正热切盼望他到那里去。在这方面耶拿大学也合马克思的心意，因为正如授予博士学位的程序所表明的，在1848年三月革命以前，耶拿大学“授予博上学位比其他许多德国大学要容易和大方些”³⁷。这里还应指出，耶拿大学教授的薪金在德国是最差的，因此，由考试费所得的收入按大学教师的实际情况来说是一笔相当受欢迎的补充财源。因此，一辈子为挣钱养家操心奔波的德伯赖纳教授“对黄金般的三份报酬”³⁸表示自己由衷的感激。

马克思在耶拿通过博士学位这件事，是由耶拿日尔曼学名誉教授奥·路·伯·沃尔弗的推荐，据推测后者从柏林的“博士俱乐部”以来就认识马克思³⁹。在1841年4月7日给沃尔弗的信中，马克思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⁴⁰。这封属于与授予博士学位有关的档案的信有幸保存了下来。马克思同沃尔弗的这种关系说明，为什么他在所有非普鲁士辖下的大学中恰好选中了耶拿。沃尔弗属于当时耶拿教师队伍中的进步代表之一，当然，作为名誉教授，他不是“具有特殊权限者”，即非哲学系（主考的）系务委员。他在政治上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青年德意志的反对派代表有着联系，与亨·海涅过从甚密，后来在1849年，他曾帮助过因参加三月革命而遭驱逐流亡途经图林根的理·瓦格纳⁴¹。

有个问题尚有争议，就是怎样评价耶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

程序。它是一种纯粹的例行公事，就是说，教授们（除巴赫曼以外）几乎没有花费什么气力去比较认真地评阅一个素不相识的博士候选人呈送的论文。由于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中保留下来的评审意见极其有限，对这个问题难于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关于巴赫曼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督教保守派敌人，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看出了博士论文中的“黑格尔的”或者已经是“反黑格尔的”观点的问题，情况也是如此。比较早的文献大多倾向于是例行程序，并且在这方面首先可以有理由地指出，巴赫曼虽然对博士论文“作出了很有眼力的评价”⁴²，但是他所发表的见解仍然是肤浅和表面的，对论文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⁴³，而晚近的研究材料则试图更加肯定地强调这一点⁴⁴。

博士论文大概没有经过认真的审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事实首先就是引人注目的。除了巴赫曼在4月13日推荐书中所作的简短评语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评审性的证明材料。

博士论文作为授予博士学位的主要标准在耶拿和德国的大多数大学里重新获得特殊意义，看来只是19世纪中以后的事情，起码在哲学系是如此，就是说，当自1810年以来倡导的认为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而不只是教学机关的洪堡原则，在高等学校的实践中逐渐开始用专题讨论活动、“学校教育”等来加以贯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此以前，在19世纪上半叶，耶拿通常首先是把候选人作为个人全面地加以考察，而不是仅仅或首先根据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著作来衡量和评价候选人（只要他不想成为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拿马克思来看——顺便指出，他同作曲家罗·舒曼一年前在耶拿一个人员刚刚配好的系里通过博士学位的情况相似——他呈交的学业证明写得非常清楚，另外，候选人还有沃尔弗这样一个值得信赖、乐于助人⁴⁵的朋友为他说情。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位候选人的品格，而他的论文证明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巴赫曼对博士论文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基本士表示嘉许的鉴定，按其评语“实应授予学衔”——与当时耶拿常用的评语“符合规定”、“应授予

学衔”相比——来说，是罕见的和极高评价了：“巴赫曼肯定意识到，他以如此罕见的褒奖言词把马克思的论文推荐给本系的同事，是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步骤。这无论如何会使耶拿的教授们得出一种印象，显然是柏林大学的一位优秀毕业生向他们申请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他们以识别他的才能并毫无保留地同意授予他所希望得到的学衔而感到荣幸”⁴⁵。

关于1841年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的问题，保存有十二份耶拿档案文件。它们分别保存在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和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档案馆。这十二份文件第一次全部以真迹影印件的形式，连同有关的修改文本、译文和注释一起在本书发表。

从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的德文申请书⁴⁶和系主任致该系系务委员们的推荐信⁴⁷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还呈交了一份拉丁文申请书、自传以及首先是他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是马克思在申请书中的写法）。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三个文件——同系里给马克思的复信一样——在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中没有保存下来，迄今为止也未在别处发现。

马克思呈交给系里的博士论文原件不在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很难加以解释的。假如我们不原意认为后来别人有意从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中抽出了这篇论文（不过也缺少这方面的线索），那么最大的可能是，1841年系主任或系里的某位教授保存了马克思的论文，而没有注明或没有让人注明文件的性质，以致论文未收入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这在当时的耶拿大学是常有的事。

尽管由马克思呈交给耶拿大学的博士论文手写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人抄写并经马克思在1841年到至迟1842年3月2日亲笔修改的同一题目的文本却保存下来了。这个准备拿去付印的、经过加工整理的文本今天被研究者认为是正式文本，

同时可以肯定地证明马克思没有把付印文本的一些部分是交给耶拿大学⁴⁸。

博士论文，确切地说是保存下来的、今天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收藏的别人抄写的文本，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1902年，弗·梅林在《马克思遗著》一书中第一次部分地加以发表，1927年，在没有最后出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一版中，第一次全文发表了史料考证版的博士论文。本书是根据1975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发表的在史料考证方面经过修订的博士论文排印的。

自从1901年梅林首次竭力要找到博士论文的耶拿原件以来，调查博士论文和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下落的工作进行过多次。查找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活动，是耶拿学术史和档案史上饶有趣味的一页。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的发现，已成为德苏友谊和合作的一个美好例证，其开端在1933年以前在耶拿大学就已经有据可查了。

事情开始于1925年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之际。应苏方邀请，当时的耶拿大学校长、资产阶级法学家亨·格兰特也参加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庆祝活动⁴⁹。其间，谈到了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的事。根据格兰特所作的访苏见闻报告，耶拿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格·凯斯勒委托其研究班的一位成员调查耶拿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同年，尤·沙克谢尔教授——耶拿最知名的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的先驱者⁵⁰——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请求去见耶拿大学校长，得到了马克思文件的照相复印件，亲自查找过失落的博士论文⁵¹，并将照片资料交苏联驻柏林大使馆转寄给了莫斯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卡·格律恩贝尔格教授，也从耶拿大学得到了照相复印件，以便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上加以发表。⁵²

作为苏联共产党全面掌握和研究马克思遗著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为了找到耶拿博士论文原件，于

1927年悬赏一千帝国马克，沙克谢尔公开宣布了这一赏格。但是，由当时的大学官员海·洛伊滕贝格和海·默林在哲学系档案馆存档中组织进行的第三次调查，仍无结果。

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又重新查找耶拿的马克思文件。首先必须在1945年由于英、美空袭而遭破坏的耶拿大学档案馆中找到被认为失踪了的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特别是图林根州的苏联军管当局干预了这件事，它要求进行寻找工作并颁发表彰奖金加以酬劳⁵³。经过艰苦的寻找，重新找到了耶拿关于授博士学位的档案——这是当时耶拿大学图书馆顾问汉·弥勒博士的功绩，他得到了大学行政处(大学管理部门)处长伊·尤特根斯和若干助手的支持。为此，提议对合作者麦·阿道夫、麦·巴尔西科夫和阿·费尔德拉佩加以嘉奖，以表彰他们“抢救大学档案馆的工作，这一工作使得与授予卡尔·马克思博士学位有关的档案得到挽救”⁵⁴。1947年1月4日弥勒致耶拿大学校长弗·楚克尔教授的关于这一活动顺利结束的报告是一份珍贵的时代文献。报告清楚地描绘了档案馆在战后几个月中的严重情况，指出了当时最终丧失马克思文件的危险到底有多大。报告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9日，一颗重磅炸弹炸毁了大学楼北翼的一部分，也把存放在该处地下室的大学行政处档案和其他档案材料掩埋在瓦砾堆中。收藏哲学系关于授予博士学位档案的毗邻地下室受到很大的破坏，门窗脱落，不太坚固的隔墙部分坍塌，石块、房梁和大量的瓦砾灰土溅落四处，档案架倾倒，档案散落一地。这种劫后状态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如故，这地方没遮没挡，经受着风吹日晒和水管的侵蚀，收藏的文件不断遭到劫掠。我以前对这些档案中较古老的部分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深知这些档案在文化史和大学史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1945年夏季我试图说服有关部门去抢救这批受到严重威胁的档案收藏。由于有其他紧急的重要任务，又缺乏劳动力和材料，当时我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是到了

1946年夏季才实现了这一设想。当时我受大学校长的委托去抢救这批濒临危境的收藏品。在这段时间里,我克服了重重困难(首先是缺少劳动力,没有任何材料),除了挖掘最后一批被掩埋的档案以外,还对裸露的地下室采取防护措施。在此期间马克思的档案得以免遭毁坏的厄运,无疑首先要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们被存放在很难通行的,被放在前面、为预防空袭而搬到这里来的材料所堵塞并有一个压扁了的大档案架挡着的地方。当我听说人们几个月来一直在寻找这批档案并把查找的任务分配给我时,我在清除了最后一批堆放在上述地点前面的材料——大部分材料这时已经搬走——以后,终于使要查找的案卷显露了出来。”⁵⁵

尽管博士论文经过多次寻找,其中包括大学档案馆馆长奥·克勒尔从1947年到1975年重建耶拿大学档案馆期间的查找,一直没有找到,但是,马克思档案的重新发现确属特别值得一提的档案工作成绩,也是耶拿大学对遗产的保护。马克思档案的重新发现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在20年代为找到有关文件而作的努力,第一次可以被耶拿大学图书馆员和历史学家奥·法伊尔称誉为德苏友谊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显著例证,并且在1953年卡尔·马克思年通过各种出版物和展览会变得为公众所熟悉⁵⁶。这在耶拿大学教职学员的思想转变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现在,根据新发现的文件,有关1841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事件又得到了新的阐述。1958年,在为庆祝建校四百周年而出版的叙述耶拿大学全部历史的专著中⁵⁷,这一事件第一次获得了它应得的地位。1964年,耶拿大学作为该校丛书《耶拿的演讲和著作》之一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一版的文本之后第一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了由格奥尔格·门德教授主持、恩斯特-君特·施米特协助编辑的博士论文,它“为卡尔·马克思在我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⁵⁸。这本书很快就成了最畅销的耶拿出版物之一,并经多次再版。1976年,耶拿大学第一次把关于

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的档案中当时已发现的全部文件作为首先为收藏珍本图书要求服务的真迹影印版⁵⁹出版。

耶拿大学母校为研究和出版它所收藏的马克思文件而作的努力，由大学档案馆继续加以发扬。例如，科学工作者托·彼斯特尔⁶⁰和大学档案馆馆长福·瓦尔⁶¹博士发现了记载和批准颁发博士学位的耶拿大学官方登记簿。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博士学位论文连同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档案材料和1976年以后发现的“官方文件”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版本和真迹影印版奉献给读者。和出版1976年版时一样，在印制真迹影印件时，依据的是文件原本，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自1947年以来都存放在莫斯科。

为了对苏联在重新建设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方面所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为了表示友好情谊，为了从政治上表明耶拿大学是一所自觉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大学，根据1946年12月24日大学董事会的决议，1947年1月初，当时的大学校长楚克尔教授把关于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的档案的各项文件原本移交给了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⁶²。1947年1月10日的庄重的赠送证书上写道：“当耶拿大学放弃对这批证件原件的所有权的时候，这一行动意味着承认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由于它在传播马克思著作和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文件方面所建树的功绩也赢得了收藏耶拿证件的权利。”⁶³

移交仪式是1947年1月10日在耶拿为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耶拿大学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所建立所际关系而召开的庆祝会上举行的⁶⁴。这是战后耶拿大学同苏联的科学机构第一次建立正式联系。校长楚克尔教授在庆祝会的致词中，明确表示要抛弃旧的法西斯主义大学的传统，在政治上崇奉各国人民友好的精神。耶拿大学校长在致词中对负责接收文件的苏联教授彼·维辛斯基说：“但愿以赠送证书为标志的莫斯科和耶拿之间学术交流关系的建立，作为最先培植起来的关系也会对其他科学领域产生

卓有成效的影响。12年来,德国科学界同国外科学界的关系遇到了种种困难,我们同苏联干脆断绝了来往。毫不奇怪,我们是大大地落后了,因此,我们最近的任务就是把耽误了的东西补回来。……无知,不仅是缺乏知识,而且也是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祸害的根源。因此,要消除无知,同时也就要建立更深刻的理解。可见,将从值得我们今天庆祝的建立关系中获得好处不仅是科学,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⁶⁵

原载《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柏林版

(张念东译 刘暉星校)

注 释

- 29 见《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载于《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柏林版第204页。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98—899页。
- 31 《耶拿大学章程》1829年版第136—137页。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7、844—845、896—898页。
- 33 见《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第208页。
- 34 同上书第204页。
- 35 1839年12月11日鲍威尔致马克思的信,参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期第81页。
- 36 参见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215—216页。
- 37 奥·法伊尔:《1841年卡尔·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载于《1548—1558年至1958年耶拿大学史。耶拿大学创建400周年纪念》麦·施坦梅茨编1958年耶拿版第1卷第396页。
- 38 见《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第206页。
- 39 见奥·法伊尔:《1841年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福·瓦尔《1841年耶拿大学授予卡尔·马克思博士学位的有关文件,大学档案馆对1983年卡尔·马克思年和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创建425周年的一个贡献》,载于《档案馆通讯》1983年第1期第6—12页。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8页。
- 41 见迪·盖尔曼:《从档案材料看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日尔曼学

- 史》(哲学博士论文。1954年耶拿大学。打字稿)。
- 42 奥·法伊尔:《1841年卡尔·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第396页。
- 43 见格·门德《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1年)》,门德编,恩·君·施米特协助,[1964年]耶拿版第5页。
- 44 见恩·君·施米特:《卡尔·马克思博士论文新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1部分第1卷)和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文件》,载于《语文学家》1977年第121卷第273—284页。
- 45 同上,第284页。
-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7页。
- 47 同上书,第898—899页。
- 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1部分第1卷第882—883页。
- 49 见鲁·路德洛夫:《1925年在俄国科学院成立200周年暨改名苏联科学院之际德国大学教师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行》,载于《耶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类》1956年—1957年第6年卷第6期第709—721页。
- 50 见迪·弗里克:《尤利乌斯·沙克谢尔(1887—1943)。德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和大学教师的生平和斗争》,1964年耶拿—莱比锡—柏林版。
- 5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旧版《总序言》,载于该书192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部分第1卷上册XXV■—XXX页。
- 52 见《卡尔·马克思大学时代的证明材料》,由卡·格律恩贝尔格报道并作序,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第232—239页。
- 53 见1946年12月31日耶拿大学校长致苏联驻耶拿军管会司令的信。耶拿大学档案馆藏编码全宗BB.第247号[O.P]
- 54 同上。
- 55 《1947年1月4日汉斯·弥勒博士致大学校长的报告》,耶拿大学档案馆馆藏编码全宗BB.第247号[O.P]。
- 56 见奥·法伊尔:《卡尔·马克思和耶拿大学》,载于《耶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类》1952—53年第2年卷第3期第3—21页;[奥·]法伊尔博士《卡尔·马克思年(1953年)的耶拿大学图书馆》。载于《人民卫士》(格拉)1953年3月10日(耶拿版);[奥·]法伊尔博士《卡尔·马克思和耶拿大学》,载于《人民卫士》1953年3月14日(耶拿版)。
- 57 奥·法伊尔:《1841年卡尔·马克思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见《1548—1558年至1958年耶拿大学史》第1卷第396—399页和第2卷第562—563页

(第 397 页的插图说明弄错了,应为 1841 年 4 月 6 日马克思致巴赫曼的信,不是致沃尔弗的信)。

- 58 格·明德:《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1 年)》第 7 页。
- 59 《卡尔·马克思。1841 年耶拿。耶拿大学关于授予卡尔·马克思博士学位的文件》[1976 年耶拿版]。该书受耶拿大学校长和党委委托,由《学报》和《警戒》编辑部编(附埃·明格和君·施泰格尔撰写的德、俄和英文导言);《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中的文件一至七和文件九。
- 60 见《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第 210 页;君·施泰格尔:《一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件被发现》,载于《人民卫士》1981 年 8 月 8 日(耶拿市版)。
- 61 见《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第 211—218 页;福·瓦尔:《关于马克思博士学位的又一个文献证据》,载于《社会主义大学(耶拿)》1981—82 学年,1982 年 7 月 29 日第 20 期;福·瓦尔:《附言。关于授予卡尔·马克思博士学位日期之‘谜’》,1982 年 11 月 12 日第 4 期。
- 62 见耶拿大学档案馆馆藏编码全宗 BB.第 247 号[O.P];奥·科勒、君·施泰格尔《耶拿大学档案馆所藏关于 1945 年苏联对重新开办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和德苏友好的开端的文件(1945—1950 年)》,载于《耶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类》第 16 年卷 1964 年第 4 期第 399—410 页;《新的开端。苏联对重新开办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援助》1977 年耶拿版第 72 页(《耶拿的演讲和著作》丛书)。
- 63 耶拿大学档案馆馆藏编码全宗 BB.第 247 号[O.P.]。
- 64 见奥·科勒、君·施泰格尔:《耶拿大学档案馆所藏关于 1945 年苏联对重新开办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援助和德苏友好的开端的文件(1945—1950 年)》,载于《耶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类》第 16 年卷 1964 年第 4 期第 401 页。
- 65 耶拿大学档案馆馆藏编码全宗 BB.第 247 号[O.P];奥·科勒、君·施泰格尔:《耶拿大学档案馆所藏关于 1945 年苏联对重新开办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援助和德苏友好的开端的文件(1945—1950 年)》一书刊登了这个讲话。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困惑与思考(提纲)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到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张 奇 方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多年来象禁果一样诱惑着各国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又以同样强大的力量困搅着他们。在这一篇短文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穷尽它的各个方面。笔者自然不敢抱这种奢望，只想就接触到的层面，作一点力所能及的提纲式的寻踪觅迹。

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在国内外逐渐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热点之一的今天，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得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人类学笔记”提供了排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迷的可能性。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1859年。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时期。19世纪前半期，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类社会史，特别是对史前人类社会史，照恩格斯的说法是“几乎完全没有人知道”。因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推断，大都是以成文史为依据而提出的假设。虽然马克思反对带有“思辨的色彩”，然而经验材料的佐证仍很缺乏。这些论述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富于天才的思考。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合作撰写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发展的

不同阶段。在说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同时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时，依次排列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被称为“部落(Stamm)所有制”，在这里，“生产不发达”、“分工还很不发达”、“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但同时存在“隐蔽的奴隶制”。总而言之，财产(其实还算不上“财产”)归部落所有，生产落后，阶级关系很不发达，或处于萌芽状态。同第一种所有制不同，第二种所有制，即“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就包含了初期的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制。接下去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再就是正在经历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采用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说法。《宣言》没有开列依次更迭的社会形态，只是指出了“古罗马”、“中世纪”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年后，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提法也没有什么变化。那里提的是“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两处都没有说明更古的社会是否存在，如存在，又是什么社会。

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进一步加强在东方的殖民活动。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各种有关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次大陆的)各个方面的书籍、统计资料、调查报告等等。这些材料立即吸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了解到许多和西欧不同的情况。例如，法国医生贝尔尼埃在一本游记中谈到，“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把这一点比之为“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对此，恩格斯表示完全同意。到50年代末，他们对东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概念，一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把提法确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此以后，马克思还多次使用和阐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至少到1875年以前，都没有什么改变。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

我们追踪“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发展演变轨迹时，有两个变化显得很突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 1853 年注意亚洲，特别是印度次大陆（也有中国）的情况，同 1857 年—1858 年提出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及 1859 年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有很大的不同。50 年代初，他们提出问题时限于一个具体的地域，一个具体的国家。他们感到东方社会具有一个独特的、和他们原来所熟悉的西欧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后来发现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存在于亚洲，而且存在于俄罗斯（村社）、日耳曼（马尔克）以及南欧等地。其中亚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保持得比较完整，从时间上说，一直保留到殖民势力侵入之前。马克思在 50 年代末在认识这种生产方式方面，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升华，即认识到亚洲存在着的，是一种在亚洲以外许多地方都存在过和存在着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出的，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阶段性的概念。它构成了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中的最早的一环。

第二，50 年代初，他们从殖民者和旅行者的记载中了解到，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其实这是不确切的。50 年代末，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并且发现，亚洲的农业公社中既存在土地公社所有制，也存在部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异化、复归的发展设想出发，很自然地把以亚洲农业公社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列入自己原来设想的依次更迭的社会经济形态序列中。

从上文对这个概念发展过程的探讨中我们知道，马克思 1845 年提出的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有三种。在《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中，提到的只有两种。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形态。”在这段

话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恢复成了三种。从排列的顺序看，“亚细亚生产方式”取代的大体正是1845年的“部落所有制”。

马克思在15年中完成的这两个变化，是认识的变化，是一种质变或突破。两个变化既有必需的实证材料作依据，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促使马克思改变自己结论的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制形式。上文说过，50年代中晚期关于东方公社及俄国村社存在两种所有制，或者如后来所说的存在农业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这里且不谈国家或君主的最高所有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种所谓的所有制）。在这里，公有制的存在，说明农村公社的原始性，而部分（或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则说明公社中已经产生了破坏公有制的因素。可见，这种公社应该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原始社会的晚期。这样就顺理成章地确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序列中的地位。

这种古代类型的公社，不仅存在于亚洲，而且存在于上文提到的俄罗斯、日耳曼，还存在于墨西哥、秘鲁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过、而且直到现在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的（如不久前坦桑尼亚的“乌贾马”）形式。其典型比较完整地保留在亚洲。因此，定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决不是表示其地域意义，而是突出其典型性、代表性。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消失和 “人类学笔记”的析疑

从已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来看，至少他们直到1875年仍在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1875年以后，这个概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些学者，包括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后来虽然没有提到这个概念，但还是有类似的论述。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提不出符合事实的证据。还有的学者认为从1875

年到他们逝世，缺乏适当的场合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更充分的阐述。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在这段时间中，要作进一步的阐述，有很多机会。至少在1877—1878年的《反杜林论》第三编中列举各种生产方式时，可以很自然地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很明显，任何牵强的解释，都无助于澄清问题。

其实，马克思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原因在这个概念本身。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

首先，“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本身并不精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同“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等放在一起，作为同一层次的所有制形式之一，而不是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典型。一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同“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列。就是说，事隔一年，同一个概念被归入了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

其次，马克思在1857—1858年谈到“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指出，“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部落共同体”的成员。他在这里没有提到私有制，更没有提到阶级的存在。然而，他又说那里存在作为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存在“东方专制制度”，甚至还有“国家”、“政府”。根据这种在理论上矛盾的说法，既很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阶级社会，同样也很难纳入非阶级社会。

从以上两点看，“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本身，就存在矛盾。唯一可以解脱的办法，就是将它放在从非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过渡时期，作为一种中间形态，两栖的形态。这样，它就不能同其他如“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立，而只能是低一个层次的，即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最后一种具体形式，如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或“垄断阶段”的层次。

在上面所说的第二点中，还包含着一个矛盾的说法。我们知

道，马克思恩格斯从1848年2月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至少到1877—1878年写作《反杜林论》为止。这个观点的正式纠正，是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由恩格斯作出的。在此之前即1879—1880年左右，他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他们并没有改变《宣言》中的这一观点。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根本的矛盾，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而又有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利益最高代表者的“专制君主”，而且还有一套“东方专制制度”。显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在马克思生前，这个悖论已经有了正确的解决。作为解决基本依据的，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人类学著作提供的实证材料。马克思从1876年5—6月开始阅读毛勒在60年代发表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并作了详细摘要，接着读了格·汉森、弗·德默里奇、奥·乌提舍诺维奇、弗·卡尔德纳斯基关于农业公社的著作。到1879年开始又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拉伯克、梅恩、菲尔的著作并作了详细的笔记。这些著作提供的材料表明，在原始的社会中不存在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有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归个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兼作武器的劳动工具逐渐成为私有财产。直到这时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私有制，更没有阶级、国家等等。这些经验的材料有力地证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科学的，它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上世纪50年代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局限了马克思的结论；而70年代后期的实证材料，使马克思得以据此作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从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中了解到，即使在《摩奴法典》时代就存在着公社土地所有制，同时，私人土地所有制也已经产生，但专制君主的最高土地所有制则产生得较晚。它并不是因为公共工程的需要而产生的没有阶级内容的“专制制度”。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使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失去了任何基础。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不能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概括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

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使我们了解原始社会的实际和理论，更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永不保守的科学精神。

恩格斯晚年对传播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贡献^①

〔苏〕 鲍·塔尔塔科夫斯基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中的突出作用，绝不限于创作新的理论著作。他对重新出版马克思和自己以前的著作十分重视，因为到70年代中期，法国（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青年一代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这些著作。其中许多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等卓越的著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对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思想的影响，对于克服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他们的战友们所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数量很少，而且在德国国外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就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到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

因此，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一般来说出版阐述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成了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需要，成了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还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的领袖都已经懂得，必须解决这一任务。考茨基1882年向恩格斯写道：“现在对马克思和您的著作的需求量比任何时候都大，而所提供的却比任何时候都少。”^②

① 作者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本文摘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年鉴》1981年第4卷所载《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想胜利所作的贡献(1875—1895年)》一文的第2部分。——译者注

② 《恩格斯和考茨基通信集》1955年维也纳版第69页。

尽管恩格斯十分繁忙，他仍然设法抽出时间来准备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以及老战友们的一些著作的再版和翻译。他亲自选题，必要时写注释，在许多情况下还校订译文。恩格斯几乎为所有的新版本都写了序言，许多序言对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批驳，对歪曲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进行了反击。这样，恩格斯所出版的新版本立即就具有了现实的政治意义，成为思想斗争的重大武器。为此，恩格斯首先建议出版那些在各国当前具体情况下最有现实意义的著作。

当然，恩格斯特别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在 80 年代，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之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一般社会主义著作的德文版主要是由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版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由它出版。就是这个出版社在 80 年代上半期出了三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的论文《马尔克》的单行本（标题是：《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版《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85 年 11 月，这个出版社开始编辑《社会民主主义丛书》，在短短几年中就出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他从他在苏黎世的通信者（中央机关报编辑爱·伯恩斯坦和出版社领导人之一海·施留特尔）那里了解这一计划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情况。根据施留特尔的请求，恩格斯确定了他认为这套丛书首先应当出版的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时恩格斯认为，最好首先出版那些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策略和组织实际革命活动有帮助的著作。因此，列入这套丛书的第一批著作有《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附有 1849 年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材料）和《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对于这个处于地下状态、其代表常常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受到法律追究的党来说，这两部著作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两书讲到 30 多年

以前发生的事情，从而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了解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荣篇章，了解了他们的直接开路先锋的英勇业绩。恩格斯在为第二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当时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对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恩格斯写这篇光辉的序言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驳斥那些歪曲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的企图，同时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来源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

此外，在这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中，1887年出版了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第二版，作者写了一篇新序言；1890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恩格斯也写了一篇序言。根据他的提议，丛书中还选入了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威廉·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导言对普鲁士农民的命运作了历史的概述，这篇导言对于制定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尤其是对于确定对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态度具有特殊的意义。恩格斯还为西·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者》写了引言，这本小册子也是根据他的推荐重新出版的。这篇引言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军备竞赛对普遍和平的巨大危险。通过这种透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恩格斯在许多方面对四分之一世纪后导致世界大战的那些事件今后的发展以及全面的战争对欧洲各国统治阶级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了预言。列宁后来把恩格斯的这些话称作“天才的预言”^③。

仅仅在《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中就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四部著作，另有两部著作他们也参加了写作。恩格斯为五本小册子专门写了序言。这套丛书（出版到1890年）的其他选题，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的著作。

其他国家（丹麦、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也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463页。

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出版类似的丛书。这些丛书通常都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第一本，然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从1883年起，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了《现代社会主义丛书》。

除了《社会民主主义丛书》，恩格斯还在德国本国，在书报检查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再版马克思的著作。例如，1885年他亲自校订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第一个德译本。恩格斯在他写的序言中，驳斥了讲坛社会主义（党内也有一些改良主义分子附和它们）把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称为马克思的先驱、把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实质上是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措施的基础）说成是真正社会主义观点的企图。批判地分析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也是恩格斯为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的新版也是在恩格斯参与和领导之下出版的。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1885年），《法兰西内战》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个单行本（1895年）。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来说，所有这些版本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直接针对那些取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在德国越来越活跃的机会主义分子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恩格斯为在德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尽了多么大的力量。由于他的不懈的努力，到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各种主要著作都同读者见面了。这必然对德国工人运动思想水平的提高发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说在70年代后半期甚至80年代初期拉萨尔的著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国工人中有更大的影响，如果说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的著作还流传很广，那么现在，仅仅过了十年到十二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以及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的通俗读物已经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占了主要地位。

在由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著作中，《哥达纲领批判》占有特殊

的地位。这篇著作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表这篇著作的历史过程多次成为一些专论的对象。我们这里只需要强调如下几点。大家知道,《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是由恩格斯于1891年1月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当时正在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这篇著作的发表大大有助于通过这个纲领彻底清除拉萨尔主义的残余,使它整个说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由于这篇著作的发表,恩格斯就帮助克服了直到90年代初党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没有完全摆脱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意义当时就被人们理解了(也许还不够充分),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许多杰出的社会主义者都热烈祝贺它的发表,并高度赞扬恩格斯不顾党的一些领袖的反对而终于发表了这一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就在德国许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以及在丹麦、美国、瑞典、奥地利、法国等国转载了,从而变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财富。

恩格斯这方面的活动不仅仅限于德国。他也大力支持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在其他国家的出版。这主要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剧增。在短期内,而且常常是在恩格斯直接参与和帮助下,世界许多国家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重要的著作翻译出版了。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恩格斯没有直接参加准备的版本不算在内);恩格斯亲自校订译文的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意大利文版(1885年)、丹麦文版(1888年)、法文版(1893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文版(1888年),《共产党宣言》法文版(1885年)、英文版(1888年),英文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6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8年)。恩格斯为其中许多版写了专门的序言。除了个别例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其他译本也都是在他知道的情况下,而且常常是由他推荐出版的。恩格斯只有他确信译者具有足够的学术水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时候,才

同意翻译出版。

同时，恩格斯总是考虑到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思想水平和实际需要；他不同意翻译那些他认为大多数政治斗争的参加者所不能理解的著作，而赞成翻译那些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能够看懂的著作。例如，他没有同意法国社会主义者福尔坦要翻译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计划。^④

恩格斯十分注意译文的质量，因为他认为，质量低劣、错误百出的译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有害。正因为如此，他总是设法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校订译文，或者至少付印之前了解一下译文。但是，如果翻译没有事先取得他的同意并且译文质量不好，恩格斯总是对此进行最严厉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公开批评。例如，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亨利·海德门从《资本论》第一卷摘译了《商品》一章的一部分，于1885年10月用笔名约翰·布罗德豪斯发表在《今日》杂志上，恩格斯当时在《公益》周刊上对这个译文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分析。^⑤

恩格斯特别重视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由于他的俄文水平不能亲自校订译文，他非常关心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俄文版，大力帮助“劳动解放社”出版这些著作。他对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的译文质量给以高度评价。他收到查苏利奇寄来的《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后向拉甫罗夫写道：“日内瓦的几个俄译本……我很满意。”^⑥恩格斯为查苏利奇出版《哲学的贫困》俄文版（1886年）提供补充材料，把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报》的一封信的副本给她寄去发表，等等。直到去世，他始终同他的俄国学生们互通书信，支持他们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

在恩格斯参加和领导下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版本和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21卷第266—276页。

^⑥ 同上书，第36卷第97页。

译本对于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基本上是经作者同意的版本，文字经过仔细的审查，恩格斯还作为附录增加了补充材料，并且亲自写了序言。序言中通常都说明该著作的写作背景，指出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首先是注意它的思想内容同当前现实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联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序言都是与出书同时或者略早一些发表在德国的社会主义报刊上，然后又大都在其他国家的报刊上转载。于是这些序言就常常获得独立的意义，后来作为单独著作而闻名。例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曾以《美国工人运动》为篇名转载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丹麦的社会主义报刊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曾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篇名作为单独的著作发表，这篇导言曾经发表在德国、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刊物上。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这样，恩格斯就把他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个别问题的工作同他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每一篇新著都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同社会主义报刊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合作并不限于转载他的序言和他的新著的摘要。尽管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不多，但是每一篇文章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促进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因此，恩格斯每发表一篇言论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文章是因为必须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反驳说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而写的，另一些文章是为了解决策略问题或者研究个别理论问题。他写文章阐述国际工人运动史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并对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作出反应。

和上述序言一样，恩格斯的文章大多数也都译成外文刊登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上。他的每一篇文章，即使只是讲某个具体事件而没有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短文，都包含着具有深刻教

益的思想，引起读者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注意，都是用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具体对象的典范。恩格斯的政论活动在争取马克思主义思想胜利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无产阶级如何对待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无产阶级对国际关系问题应采取什么立场，如何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在这些政论文章中进行探讨的。这样的文章有：1889年底1890年初应维拉·查苏利奇请求为“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3年3月先在《前进报》上发表、然后由德国其他报纸转载、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的《欧洲能否裁军？》一组文章，上面已经提到的波克罕小册子的引言，《德国的社会主义》一组文章，等等。

还必须强调指出恩格斯这些年的政论文章的另一个特点。他是在许多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等）的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言论的。每次发表的言论，不管具体的因由是什么，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同样很重要。这特别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际意义。因此，恩格斯的文章的大量译本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财富，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籍维立译）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苏〕 A·齐普科^①

我个人有一个感觉：现在制造了一种非常时髦的神话，说什么斯大林的包括集体化在内的左倾跃进是从农民中产生出来的。这恰恰是为了抹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失败的学说上的原因，抹杀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的责任的问题。

当然，把斯大林连同他的政治实践、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一起，从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勾掉，是很诱人的。把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对反对派的胜利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看成是反革命政变，看成是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思想和理想的完全背离，是很诱人的。只要同意这种具有诱惑力的思想，所有问题刹那间就都解决了：谴责斯大林，继续保持对理想的信仰，恢复理论的“纯洁”等等。

人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难以调和的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与之相联系的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运动本身，在于运动本身的失误和错误。人们都愿意相信，所有的罪过都是敌人造成的，都是某种外部的、偶然的情况造成的。顺便说一下，这种心理上的自卫还在20年代就产生了，那时习惯于在各种场合寻找“破坏分子”、“怠工者”。我认为，正是我们政治思维的这种习惯，才给我们提供了“热月政变现象”。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恐怖的党的老战士济·尼·涅姆佐娃在对《星火》杂志记者谈话中要我们相信，1937—1938年的镇压是钻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白卫军分子和宪兵干的。记者A·拉泽布尼科夫提

^① 作者是哲学博士。——译者注

出一种思想：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是沙皇暗探局奸细和侦探。哲学博士A·布坚科教授写道：“个人迷信时期进行大规模镇压，实行反人道主义和运用技术治国的方法，很难断定这种政治体制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统治。如果说工人阶级政权一般说来本来就会干出这些事情，那是侮辱性的论断。正确的看法是：斯大林及其亲信篡夺了工人阶级政权，进行歪曲，使其变形。”

把斯大林主义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是很诱人的，但总应当考虑一下这种区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外还应当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出发。

不能不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说立刻而且急剧地降低了对其他一切可能的原因的兴趣，确切些说，降低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而首先是学说上的原因的兴趣。因为我们越对这个“革命事业叛徒”的罪行气愤，就越少思考革命本身、革命内在的客观的矛盾、左倾激进主义内部的矛盾性、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我们对1917年开创的事业的深层矛盾，一直都没有进行过深思熟虑的、认真的分析。

由此产生了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件怪事。缩小批评禁区没有导致哲学思想的自由领域的扩大。存在某种看不见的界线，绝大多数撰写关于30年代的文章的作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都不能越过这条界线。这条看不见的界线恰好又把这一时期的悲剧、我国革命遭到破坏的次要原因同主要原因划分开来。关于主要原因我们还没有开始认真地思考。

到目前为止，在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孤立的分析。例如，无论如何都不把1929年的选择、当时工业化规模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很少把集体农庄制度同与它有血肉关系的余粮收集制，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思想结合起来。

我们从实际上弄清了斯大林的全部失误和严重错误，揭露了他的全部罪行、他的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带来的重大危害。

但对他个人不能负任何责任的失误和错误，我们却没有作任何揭露。对革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失误，对时代的失误，我们没有作任何评论。

我们的评论家为什么忘记了斯大林不是简单地建立自己的王国，巩固自己个人的政权呢？要知道，他是按照理论的指示改造了社会的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进行如何加快1917年10月所开创的俄国建设共产主义的运动的试验。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为什么要把斯大林及其事业神化？无论斯大林，无论斯大林的活动都是在他执政以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的产物。

一个认真调查刚刚建成的新楼出现裂缝原因的委员会是怎样工作的呢？它从哪里着手调查呢？当然，首先是对大楼设计本身进行技术鉴定。只是在确认总的设计完全合适之后，再检查工作质量、材料质量、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列宁在分析1921年初政治和经济危机笼罩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原因时正是这样作的。他没有抨击农民想要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支配自己生产的产品。他没有谴责工人要求得到自己劳动的报酬。列宁只是思考使国家陷入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所采取的经济战略的根源，思考这一经济战略的哲学道理。列宁承认了单纯依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错误，承认了对生产和生活实行公社化的思想的错误。

而研究1929年灾难和30年代接踵而来的悲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是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呢？他们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尾开始。对于他们来说，一般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问题，而只存在似乎不想和不能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的不称职的工作人员问题。

例如，今天大家都普遍接受对30年代建立起来的变了形的、兵营式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竭力绕开造成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原因。而且还离开中心的问题：在

无商品无市场的基础上是否可能建立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这的确是一个中心的、主要的问题。无论对于想要思考未来的人，还是对于想要弄懂过去的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国家，反对市场、反对商品货币关系终究都导致独裁主义、损害个人权利和尊严、使行政部门即官僚机关拥有无限权力呢？

马克思没有遇见过这一难题，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经验使他能够提出这一难题。这一问题列宁在晚年感觉到了。我们为什么不想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思考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花在虽然重要但却是局部性的问题（例如，鞭挞官僚主义及其特权）上，实质上是不再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基础本身、社会主义的概念呢？

一些批评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的政论文章的特点也是缺乏这种概念性的思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的作者（Г·什梅列夫和B·巴什马奇尼科夫除外）不由自主地制造一种错觉，认为一切都归结为这样的选择：建立集体农庄是采用骑兵方式还是采用非骑兵方式？他们说：如果斯大林听恩格斯的话，让农民私有者有可能“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②，那么我国的命运可能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但现在，从我国（而且不仅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来看，这一选择不反映我们所碰到的和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后我们根据情况着手解决的问题的全部深度。不能自满自足地认为，只要回到恩格斯关于集体农业的论述就可以改变形势。

今天推动我们走向真理，走向生活真理的问题的实质完全在于别的方面：是否应当在所有情况下，在农业部门尽力发展生产合作社？把农民变成在统一的国家大工厂里按计划劳动的工人是否真正是一项最伟大的进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页。——译者注

把生活、生产和家庭联合成一个统一体的农民劳动组织真的成了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吗？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业生产的计划有多少科学根据？土地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是否真正有其必要性？

除了集体化问题以外，还存在许多其他“难题”，这些难题是在反思斯大林时代过程中出现的，但它们又同斯大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

我只提出其中几个问题，以便读者对那个禁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以至政论界，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这一禁区。

当社会的全体成员受雇于无产阶级国家，并且没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来源时，个人的自由民主是否能有可靠的保证？当坚信农村社会化劳动即集体化劳动是经济必然性时，能否避免对农民采用强迫手段？革命先锋队的思想是否会导致产生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纯洁的”直接结合形式是否总是比“肮脏的”间接结合形式带来更大的效益？20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是否为我们继续相信可以完全克服世界观多元论、宗教意识，可以克服多种成份提出了根据？从根本上说，是否值得去追求克服一切组织和推动人类生活的传统机制，包括我们称之为宗法制的传统机制？

当然，这都是一些不一般的问题。不可能立刻找到答案。但我们也没有权利把这些问题推到明天去讨论。我们也没有权利继续牺牲我们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们后代的利益，去保持如列·加米涅夫所断言的工人阶级“不会犯错误”的错觉。今天我们经常说，历史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时间极少，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鼓足勇气并尝试揭露主要方面的错误，向自己讲出主要真理呢？

我认为，要讲出主要真理，必须首先指出完全不是可怕的、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无论斯大林的思维，无论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体上是有代表性的。至

少应当鼓足 30 年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所具有的勇气，并认真地研究成为 20 年代和 30 年代政治和经济实践基础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思维的模式。

让我们大家一起继续思考一下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思维的缺陷。

今天，不知为什么甚至发表以下意见都很困难：斯大林作为个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成长起来的，他由于自己的能力和素养能够掌握经典作家的遗产，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大体上从来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形呢？是否它中间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变形的前提呢？

当然，谈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蜕化，谈他的意识中的宗法制根源，要比向自己提出并回答这些困难问题简单。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回避这些困难问题。只要广大读者一接触十月领袖们的著作，这些问题自然就会提出来。

这时，立即就会发现，斯大林理解的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目的，不仅与党的其他领袖如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波·加米涅夫，而且与他的死敌、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卡·考茨基都没有分歧。考茨基坚决反对斯大林用强迫手段实行集体化，但同时仍然相信无市场无商品的即如他自己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可能的。考茨基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书中写道：“社会化表明，企业的职能已不再象在资本家手中那样去谋求利润，而是尽可能地去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同时照顾到工人的福利。生产成果不再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要求，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和工人的要求。”^③

把上面引用的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 年）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 年）这样一些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一下，

^③ 参看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65 年三联书店版第 46 页。

你就会确信，这两位作者对关于未来制度的最终目的的认识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最重要问题上没有区别。

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几乎逐字逐句重复考茨基关于集体生产目的的观点。它的实质，正如我们的社会学家跟着斯大林经常重复的那样，在于“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④

顺便再说一句，考茨基推测，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可以满足于最低利润，或者从来不关心利润。斯大林把这一推测也看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之一。在社会化的农业的经济效益变得非常不好的集体化时期，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一规律。他在这一时期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担负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这就不能不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方面的权威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说过，社会主义可以长期满足于最低限度的利润。例如，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中写道，如果说资本主义没有和由于自己的结构本身的原因也不可能有“白干”工作即没有利润而有亏损（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时期，那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98 页。

^⑤ 同上书，第 204—205 页。

么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例如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这却是规则。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说：“尽管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素，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但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追求的是最高数量的产品，哪怕付出最大亏损的代价。”

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能够再版，大家就会发现，斯大林实质上在许多问题上重复了他的思想。甚至加快工业化的思想也属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写道：“要更快地跑过这一时期，要尽快地达到这一时刻：社会主义体制将发挥出自己所固有的全部胜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当前任务的認識，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想法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些认识的基础是同一社会和哲学思想。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期

（刘彦章摘译）

目前围绕《资本论》初稿 进行的争论

〔苏〕阿·切普连柯

马克思所完成的并以《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进行准备的。在这次革命的准备中，最后十年即1857—1867年是特别富有成果的时期。马克思创作了未来著作的三个稿本：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4—1865年手稿。毫无疑问，这些稿本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是《大纲》^①；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概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未来著作的理论部分分三部分的结构，他还发现了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科学的出发点——商品^②。这不仅使《资本论》的这个稿本成为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史方面最有意思的对象，而且使它成为最近二十年来激烈讨论的中心。

《大纲》是顶峰，还是中间阶段？

当《资本论》的初稿进入国际学术界的时候，西方正广泛地讨论马克思著作中人道主义、异化和自由个性的发展观念这些问题。

① 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两册）。1861—1863年手稿现收入第26、47、48卷。1864—1865年手稿一部分收入第49卷。

② 例如详见维·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资本论〉初稿（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198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说》，“马克思体系的发展”课题小组编写，1978年汉堡版。

在围绕上述问题的讨论中，这些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解释处于中心的地位。“新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利用这一非常粗略的著作的某些论点，力图把“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同《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并杜撰出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④。

《大纲》的发表表明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所阐述的经济理论之间的真正的相互关系，乍一看来使进一步伪造马克思学说的形成史成为不可能了。要知道，《大纲》是一座架设在19世纪40年代到60—70年代，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到《资本论》之上的桥梁^⑤。

然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尤其是修正主义“批评家”对这个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继承性因素，提出非常独特的看法。“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尼古拉斯、著名英国自由主义的马克思生平研究者戴·麦克莱兰等作者，一方面正确地把《大纲》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早期哲学上的批判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性的政治经济学上的系统研究之间一个必要中间环节，同时又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手稿是马克思创作的“顶峰”，它的发表向世界揭示了“不为人知的马克思”。^⑥ 而由此直接地或间接地得出

④ 对这类观点的批判分析可参看：B.B.克舍拉娃：《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1963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尼·拉宾：《青年马克思》1986年第3版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版（该书第2版有中译文，书名为《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82年三联书店版）；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86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第3版（该书第2版有中译文，1964年三联书店版）。

⑤ 参看安·布鲁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84年剑桥版第12页。

⑥ 参看马·尼古拉斯：《不为人知的马克思》，载于《新左派评论》1968年第48期；戴·麦克莱兰：《马克思的〈大纲〉》1971年伦敦贝辛斯托克版第2—3、8—9、14—15页。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E·霍布斯鲍姆作出了详细的评价：《大纲》是“最后赢得读者的成熟马克思的巨著”（《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序言》1984年纽约版第9页）。

结论，似乎只有《大纲》中的知识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规律性的学说，提供了真正的观点^⑦。

对1857—1859年手稿的这种解释，甚至在西方一部分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也有反映。这种解释流行的原因在于：第一，“失落了的联系环节”这个概念（由于尼古拉斯最先使用，它是西方对《大纲》的广为流行的评价）客观上既克服了大肆颂扬“青年马克思”的片面性，也克服了路·阿尔都塞学派的观点，这一学派在与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从另外的立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认为“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矛盾。^⑧这样，在一定阶段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顶峰、“综合”得最好的著作^⑨，这种解释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理论遗产的国际讨论中甚至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这种观点没有构想马克思观点中的臆造的“矛盾”。它虽然具有简单化的、机械的、非辩证的形式，但毕竟诉诸马克思社会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现实矛盾，也就是诉诸这样一些矛盾，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促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属于这些矛盾的，首先是研究和叙述之间即从理论上认识资产阶级生产的内部结构的两个相对独立阶段之间的矛盾。它表现在：《大纲》以外表上反常的方式在内容和理论方面比《资本论》既

⑦ 这种论点常常伴随着对这样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企图利用《大纲》来辩护对早就信誉扫地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新的、编得很糟的解释”（P·皮肯：《读《大纲》：“正统”马克思之外》，载于《理论和社会。社会理论中的新生》，1975年夏季第2卷第2期。

⑧ 参看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年巴黎版；路·阿尔都塞、埃·巴里巴：《读《资本论》》1968年巴黎版。

⑨ 戴·麦克莱兰写道：《大纲》“与任何著作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马克思创作的各个方面的综合……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一部是完成的，但是其中最大程度上完成的著作是《大纲》”（戴·麦克莱兰：《马克思的《大纲》》第14—15页）。

丰富、又贫乏^⑩。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学家们”当作特殊支柱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整整一批在《资本论》中没有或者只是简略提到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必要的、剩余的和自由的时间的辩证法；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机器生产转化为自动化工厂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前提；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形式的分析；等等^⑪。另一方面，同样正确的是，在《大纲》中，对商品二重性、从而对货币起源的专门分析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虽然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已经得出了利润的概念，但还没有提出生产价格问题^⑫，等等。指出这一点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研究者，而且有西方^⑬的某些研究者，他们反对过高地评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理论遗产中的作用和地位。

但是，仅仅把《大纲》和《资本论》表面上对立起来，并不能揭示上述矛盾的客观必然性质和内在内容。《资本论》的初稿和定本之间的差别就材料包含的广度和所作的分析、概括和结论的深度来

^⑩ E·霍布斯鲍姆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时，指出了这种情况（E·霍布斯鲍姆：《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序言第11页。

^⑪ 新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恩·曼德尔扩大了这类成分的“单子”，还指出马克思有关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问题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在四卷《资本论》的任何一卷中都没有得到反映（参看《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1843—1863）》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第96—97页。

^⑫ 诚然，根据加拿大教授M·C·霍华德和英国研究者J·E·金的意见，在《大纲》中，对转形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已经有了马克思研究的最初闪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伦敦、纽约版第115页）。但看来，两位作者过高估计了50年代末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成熟程度。

^⑬ 例如参看罗·罗兹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产生史。1857—1858年〈资本论〉初稿》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第28—29、432页；J·E·埃利奥特：《作为社会理论的〈大纲〉：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之间的联系》，载于《社会科学季刊》1978年奥斯汀版第59卷第2期第241页；A·奥克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智力来源和进化》第1卷1984年伦敦版第187、216页。

说,都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之所以有这些差别是由于:第一,这里正是涉及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规律性的理论认识过程的不同阶段;第二,随着马克思越来越深入到对象的特点,他关于自己的以经济范畴体系的形式表现的理论反映的方法的看法更明确了。

1857—1858 年手稿和《资本论》 在内容上的差别是由什么决定的?

《大纲》的特点在于,手稿是研究过程基本阶段的结束。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为过渡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体系,为过渡到反映对象本身的内部逻辑的叙述阶段提供了客观可能性。^⑭

当然,在这个阶段,未来的“大厦”还处于搭“脚手架”的时期;马克思虽然已经有了一步步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构造的一般看法,但还在更准确地说明细节,重新审查自己的前提和假设,有时由于分析个别范畴得出必须放弃对它们的研究的结论。例如,由于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而谈到生产过剩的某些原因时,他同时指出:“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⑮而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是属于关于竞争学说的范围。^⑯同样,马克思认为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⑰但他在《资本论》中实质上简单地概述了资产阶级以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这使他能在以后确切地规定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

⑭ 从研究过程的角度来看,解决资产阶级经济的主要矛盾(后来马克思把它规定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具有原则意义。向叙述的过渡要求分出未来的范畴体系的“经济细胞”这个出发点。《大纲》的特点和复杂性在于,这两个问题在《大纲》中是同时提出和解决的。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3页。

⑯ 参看上书第407页。

⑰ 同上书,第458页。

可见，整整一批在《大纲》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的而在《资本论》中没有提到的问题，马克思在写作初稿时就已经说明这是离开了基本题目的。这也是那些在最后叙述中应当加以拆除的“脚手架”。^⑮

根据这种看法，那种把“不完善的”《资本论》与似乎在对象包括方面比它更完善和更全面的《大纲》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考察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不管它们本身如何重要，它们与《资本论》的对象没有直接关系，不属于马克思所规定的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规律”^⑯这个研究范围。

如果把《大纲》与《资本论》割裂开来加以分析，就不可能完全弄清《大纲》的特点。然而《大纲》是马克思创作的顶峰这个论点的拥护者正是把孤立地“阅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更不用说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最起码的逻辑矛盾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承认这一或那一著作是创作的“顶峰”，只有把它同其他著作首先是《资本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而这些人正是反对作这种比较的），这种观点不能正确地评价手稿的全部理论财富。这是容易理解的：“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⑰

因此，英国研究者乔·科恩的如下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个原则也应当用来理解《大纲》：“了解《大纲》的最好办法就是事先阅读《资本论》。”^⑱

不过，这种办法本身如果不加批判地实施，也并不能避免一个

^⑮ M·C·霍华德和J·E·金不了解这种情况，把手稿说成是“极其松散的著作”（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第25页）。

^⑯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3页。

^⑱ 乔·A·科恩：《论《大纲》的思想》，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12月第373页。

广为流传的错误，即人们看到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个或那个范畴、这个或那个概念的萌芽，就认为它们在《大纲》中已经最终制定了。应当指出马克思在上述引文后说的话：虽然“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②当然，正是在《大纲》的基础上，马克思创作了《资本论》。可是，为了在这个基础上建造《资本论》这座大厦，即使象马克思那样的天才也还须要花许多年的劳动！^③

因此，与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差别相联系的，首先是而且很明显地是它们属于从理论上掌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不同阶段。低估这个情况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堵塞了通向正确理解《大纲》在马克思理论遗产中的意义和地位的道路。而企图对这种态度的正确性提出异议，这已经不是简单地表明是一种错误，而是表明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手稿作别有用心解释。^④

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紧跟着关于对象看法的深化，马克思关于叙述正在形成的经济理论的方法的看法也在改变、更加确切，那也就不能最终理解《大纲》与《资本论》的区别。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43 页。

③ 在这方面西德研究者弗·施拉德正确地指责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从《资本论》的立场出发评价《大纲》时，抛弃了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并与 1857 年以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的看法不一致的一切不成熟成分，并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看成笔直的上升路线（参看弗·施拉德，《复辟和革命：马克思《资本论》的准备著作，即 1850—1858 年笔记》1980 年希尔德斯海姆版第 12 页）。

④ 因此，那些把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提高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的作用”的“左派”理论家，不可能从《资本论》的立场出发，对《大纲》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所持的态度。

“六册书”的计划、1857—1858年 手稿的实际结构和《资本论》

在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弄清《大纲》的方法论特点主要是讨论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罗·罗兹道尔斯基——他是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第一部基本著作的作者，对国外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一直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公认的权威——认为，《大纲》中“理论方面最重要和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是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黑格尔、特别是他的《逻辑学》的关系^⑤。不过我想，对马克思学的分析来说，这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⑥，与把马克思在《大纲》中采用的方法和《资本论》中实现的方法相比这一点比较起来，是较为不重要的。把这个问题（我们不谈关于1857—1858年手稿中和《资本论》中的逻辑东西和历史东

⑤ 罗·罗兹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产生史。1857—1858年〈资本论〉初稿》1968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第7—8页。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详细评述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有名的信。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完全由于偶然的会”，他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不过，以色列有名的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史专家舒·阿维涅利以及美国新黑格尔派诺·费歇尔认为，《大纲》与黑格尔的《法哲学》非常接近，对《法哲学》的批判分析使马克思在1843年制定自己的世界观方面大大前进了（参看舒·阿维涅利：《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1968年剑桥版第41—64页；诺·费歇尔：《经济和本性。哲学和从重商主义到马克思的经济学》1979年韦斯特波特伦敦版第114—117页）。

⑥ 这个问题60—70年代在法国和意大利讨论得特别热烈，而且一开始讨论就带有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性质。修正主义者力图要么“洗净”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辩证法，要么相反地，把马克思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混为一谈。（详见J·P·波特：《1883—1933年意大利出版的马克思著作》1986年里昂版第4—6章）

西的相互关系的著作,这需要专门考察^⑲)与所谓六册书的计划的演化和它的中心概念“资本一般”的发展联系起来是正确的。事实上,《大纲》和《资本论》的结构,从抽象的一个高度过渡到另一个高度,是叙述方法的成熟表现、“物质化”。因此,《大纲》和《资本论》在结构上明显的不一致性,证明1857和1867年之间发生的在叙述方式的解释中的某些改变——关于这一点,所有马克思经济遗产的研究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⑳

“总《导言》和《序言》(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者)所说的六册书方案,显然不同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方案。卡·考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政治经济学’的计划,从此这成为公认的意见。很明显,这个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不管《大纲》多么有意思,它只有次要的意义:它只有助于理解《资本论》的产生,从而只有助于对《资本论》内容的解释。然而,如果马克思继续坚持最初计划,而《资本论》只是对六部分中第一部分的详细阐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著作仍是戏剧性地(!)没有完成,而且可以断言,既然《大纲》不只是第一部分的初稿,而是超过第一部分的初稿,它就是马克思曾经写过的著作中最基本的著作。”——这是麦克莱兰在明确地叙述关于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观点时所说的话。^㉑

⑲ 例如参看M·塞格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关于《大纲》中的历史和逻辑问题及其在苏联的研究)。J·塔克希耶:《马克思〈大纲〉中目前的认识论的优先地位和遗传因素的必然性。论〈资本论〉计划的改变》,载于《思想》1982年巴黎版第225期第40—52页。也可参看西德“新马克思主义者”Z·G·巴克豪斯的著作。

⑳ 例如参看W·施瓦尔茨:《从〈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主要著作的结构史》1978年西柏林版;M·塞格诺:《从〈大纲〉到〈资本论〉。论〈资本论〉计划的变化》,载于《思想》1982年巴黎版第228期第17—18页及以下各页。

㉑ 不过,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某些西德黑格尔主义者提出一种看法,企图说明马克思逐渐“脱离”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真正辩证考察(例如参看G·哥勒:《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简化》1980年斯图加特版)。

(1) 戴·麦克莱兰:《马克思的〈大纲〉》第9页。

看来，麦克莱兰本人^①持有的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逻辑错误的基础上的。根据正是在写作《大纲》的过程中形成了未来经济著作六部分（后来称六册书）的计划这个情况，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决不应得出结论，认为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已经阐述了计划中所有这六部分的问题。《大纲》只包括关于资本部分中解说“资本一般”的第一点的题目。至于马克思关于竞争、信用的个别看法，关于实现和危机问题的片断论述等等，它们通常带有简略而片断的性质的意见的性质，明显地脱离手稿的上下文（关于《大纲》中题目范围为什么这么宽的原因，上面已经谈到）。因此，麦克莱兰和许多接受他的论点的作者不是从手稿的**实际结构**和内容出发，而是从其中制定的未来著作的计划出发。

至于第一种说法，它本身乍一看来具有十分有力的论据，而且整个说来，很长时期以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中占着统治地位。

在罗兹道尔斯基的书中，关于“彻底打破了资本一书的旧的划分结构”这个论点^②得到了阐述和论证。他认为，在基本的研究任务完成以后，可以说为“自己弄清问题”服务的最初的著作计划就成为不必要了，“工作模式……因而在下一阶段可以抛弃，而且这不会导致对已经取得的结果作某些根本性的改变”。^③同时罗兹道尔斯基指出，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生着“不断缩小最初计划的过程，而与这种缩小相适应的，同时是扩大计划中保存下来的那个部分”（即靠缩小关于资本一书的其余部分来扩大《大纲》中内容丰富的部分，而《大纲》无非是《资本一般》篇）。“原定的六册……归结为一册，即关于资本的一册”。^④

① 法国“马克思学”的“族长”马·吕贝尔持类似的观点（参看《马克思选集》第2卷序言，1968年巴黎版第XCI—CXV页）。

② 罗·罗兹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产生史。1857—1858年〈资本论〉初稿》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④ 同上书，第24、25页。

可见,在罗兹道尔斯基看来,《资本论》一、二、三卷完全揭示了最初计划前三册的内容,而创作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专著的意图,马克思在后来也没有放弃。无论如何,这些题目在《资本论》中没有得到反映。总的说来,这种解释今天不论在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占着统治地位。

然而,罗兹道尔斯基的观点有机械论的缺点。从他的看法可以得出,《大纲》和《资本论》仿佛是马克思用可以随意换位的积木搭成的,而且改变材料挪动的方法并不影响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见解证明不理解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真正辩证体系中对象和方法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由此也就得出罗兹道尔斯基关于“彻底打破了资本一书的旧的划分结构”这个结论,实际上也就得出了马克思放弃了原来计划的结论。^⑤这里提到首位的是关于“资本一般”这个概念的作用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研究者阿·科甘^⑥却指出,在《资本论》中发生的不是“资本一般”^⑦这个概念的放弃,而是它的内容的发展和深入,这个概念不论对理解《资本论》的结构,还是对理解《资本论》与《大纲》和六册书的计划的相互关系,都完全保持了(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大改变)自己的意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他“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⑧他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而这一理论揭示了利润和由此派生的其他资本主义收入的内在基础。这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研究了“资本一般”,也就是说,研究了

⑤ 这种“放弃”通常是与1861—1863年手稿中未来《资本论》第三部分计划草稿的出现相联系的,这一草稿拟研究的已经不仅是“资本一般”,而且是个别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7—448页)。

⑥ 参看阿·莫·科甘:《在卡尔·马克思的创作活动室中》1983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版。

⑦ 虽然马克思在1863年以后放弃了“资本一般”这个术语(关于这方面的原因,详见曼·穆勒:《通向《资本论》之路》,1978年柏林版第138—14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资本主义关系的内部结构。在研究和叙述研究所获得的成果的这个阶段，提到首位的是“资本一般”概念所包含的理论上、认识上的要素：“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⑳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一般”不是黑格尔的“普遍的概念”。这个范畴不仅表现出任何资本固有的基本特征，而且表现出那种具有“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㉑现实存在的具体的普遍的关系。资本一般的现实形象是社会总资本。

因此，〈资本论〉以后的方案和最终稿本中的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利润、利息、地租），是在〈大纲〉中所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这是“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不只是假定现实存在的“资本一般”也是某个由同样现实存在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而是深化了对这个整体的研究，考察了（通过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平均利润形成的机制、利润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地租的形成等等）那些产生出资本各个部分的相互影响的“资本一般”的新规定。

同时——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情况是罗兹道尔斯基所没有估计到的——“资本一般”概念的范围的这种“扩大”，决不是意味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分析了那些按照原来计划应构成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各篇以及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各册的对象的问题。正如在阿·科甘的研究^㉒中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的，在〈资本论〉中，所有上述关系只有在它们的内容由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限度内才加以考察；用〈大纲〉中的话说，也就是在它们能够直接从“资本一般”的内在性质引伸出来的限度内才加以考察。上述关系的全部多样性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仍打算在相应的专门学说中加以考察。^㉓

^⑳ 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444页；也可参看第46卷下册第11、42等页。

^㉑ 同上书，第445页。

^㉒ 阿·莫·科甘：《在卡尔·马克思的创作活动室中》第4章。

^㉓ 例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9页及以下各页。

换句话说，问题不是“打破”“资本一般”的概念和六册书的整个计划，而是在于这样来扩大和深化这个概念的内容，这种扩大和深化是由马克思的方法论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而它们的前提已经包含在《大纲》中。

* * *

对由于“阅读”过去不为人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在“马克思学”的著作中形成的基本观点的分析，表明：某些解释者尽管力图克服关于“两个马克思”神话的片面性，也反常地重新受这种神话的支配。结果，有关马克思理论前进发展过程的想法遭到歪曲，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资本论》科学意义和方法论的错误观点广为流行。

对《大纲》的非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基本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形成和发展史采取非辩证的态度，对最初手稿个别表述的解释脱离了前后文，没有考虑到马克思理论观点的内部发展。其实，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就得了解这种理论本身针对资本主义关系所完成了的任务，所发现的这些关系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所指出的这些变化的客观逻辑和发展历史。^④ 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真正更加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即使今天在领会社会历史过程的趋向和极其重要特征方面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原载苏联《经济学问题》1987年第8期

（马兵译）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页。

马克思和约·列列韦尔

〔波〕 A·格拉布斯基^①

1848—1849年革命前夜，著名的波兰历史学家、民主主义者约·列列韦尔曾同一些受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影响的国际民主主义者一起工作过。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左翼和年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互接近的最早的证据。这种接近不是偶然的。它是波兰和国际首先是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间较早联系的结果。这种联系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并波及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组织。

马克思和列列韦尔的相互关系，无论波兰的专家还是苏联专家都不止一次地阐述过。本文的任务在于利用过去历史学家不曾利用过的新的事实材料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的一段时期，布鲁塞尔继巴黎和伦敦之后是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同德国激进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相互接近的第三个地方。波兰人在比利时首都组成人数较少的小组：1837年他们将近200人。他们的政治观点五花八门。在波兰侨民区，在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的影响下政治分歧加深了。不久前同盟和的波兰流亡者联合会有联系的那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加入了波兰民主协会。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人比波兰人多得多，1830—1848年他们从5000人增到15000人。与波兰侨民区不同，他们当中政治流亡者组成人数较少的小组（1848年占1—3%），但正是他们首先促进了德国流亡者政治积极性的高涨。

^① 作者是教授，波兰罗兹社会科学院高教所副所长。本文译成中文时作了部分删节。——译者注

马克思迁到布鲁塞尔后不久(1845年2月初),经常抱有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的德国流亡者开始聚集在这里。1846年初,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比利时首都诞生了。它与德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取得了联系。1847年8月底,在共产主义者倡议下于布鲁塞尔建立了德国工人联合会,印刷工卡·瓦劳任该会主席。11月底参加这个联合会的约有100人。同年7月底至8月初《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出版者阿·伯恩施太德和马克思签署了协议。结果共产主义者对该报的方针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随同丈夫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的燕妮·马克思的回忆中,我们得知,他们夫妇俩迁居比利时首都后,每个晚上都到一家咖啡馆去,在那里结识了“身着蓝色短上衣头发花白的列列韦尔”。^②这次偶然相遇之后,必定会很快发展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因为德国的活动家们使这位在德国和国际的民主人士中很有声望的波兰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先进政治观点发生了兴趣。这件事发生在1847年秋天,德国政治侨民利用沙·罗日埃自由派政府获得政权后形成的条件,在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提出了在比利时首都成立国际民主组织的计划。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一组织的成立是走向国际民主主义者联合的首要阶段;同时也是巩固共产主义者在民主主义者中的政治立场的新措施。

但是,共产主义者及其拥护者们不能不同在伯恩施太德周围形成的、企图把新的组织变成对抗紧密团结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盟”发生直接冲突^③。热烈争论一直延续到最后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列列韦尔对在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共产主义者影响下举行的会议(9月26日)情况非常清楚。这次会议对预定的第二天的庆祝会进行了辩论。9月27日在法院广场“利日瓦酒店”举行了国际民主主义者宴会,出席宴会的约有120名比利时人、德国人、法国

^② 《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6年莫斯科版第2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8—108页。

人、波兰人、瑞士人和一名俄国人。恩格斯、瓦劳和格·维尔特对伯恩施太德的“联盟”进行了反击。这次宴会通过了关于11月29日在布鲁塞尔组织1830年波兰起义庆祝会和成立国际民主协会的决议，还成立了协会筹委会。出席宴会的波兰人有波兰侨民联合会的老活动家、列列韦尔的多年战友克·扎累斯基(扎累夫斯基)。马克思当时不在比利时。恩格斯参加了联合会筹委会，但是9月30日已卸任，并提名马克思代替他。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之前，应由比利时人菲·日果代理。

为了响应组织委员会的号召，11月7日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甲亚捷特奥尔街一家磨坊里举行了筹建这个组织的“民主事业之友”第一次会议。会议记录有63人签名：33名比利时人，19名德国人，4名法国人，4名波兰人，1名荷兰人，另外两名国籍不明。会议参加者有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抱有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不同的信仰。德国籍的创始人中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共产主义者，也有伯恩施太德的“联盟”会员和独立的民主主义者。在记录上签名的波兰人有列列韦尔及其当时最亲近的合作者、转入波兰民主协会的波兰流亡者联合会活动家Я·О·留勃林涅尔、扎累斯基和刚从波兰来的Я·М·科尔达舍夫斯基。11月7日会议上通过了重新建立的组织的章程。决定该组织名叫“民主联合会，其宗旨是各民族的联合和合作”。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活动家经常又称它为国际民主协会(列列韦尔也是这样称呼)。

在后来的11月15日会议上选举了委员会——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法国将军、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老战士弗·梅利奈被一致选为名誉主席。布鲁塞尔律师律·列·若特兰是主席，法国激进主义者瓦·埃姆贝尔和马克思是副主席，阿·皮卡尔律师是秘书，而司库也是律师，即比利时人Г·丰克。此外，还选举了所谓的翻译——列列韦尔，德国独立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卡·古·迈因茨，来自根特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沙·路·斯皮特霍恩

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维尔特。维尔特 1847 年 11 月 28 日在布鲁塞尔写给母亲的信中告知说，他是理事会的成员，梅利奈和 1830 年在克拉柯夫领导过波兰起义的波兰人列列韦尔，还有拉·埃姆贝尔也是，他还是马克思和迈因茨的同志。列列韦尔 1847 年 11 月 18 日由布鲁塞尔写信给 B·兹韦尔科夫斯基说：“国际民主协会成立了，除我之外，加入协会的有扎累斯基、留勃林奈尔、科尔达舍夫斯基，我把（III·B·——作者）达罗夫斯基带到那里，可是（弗朗齐舍克？——作者）赫扎诺夫斯基想要躲开，不愿意同德国人在一起。”不过，除了上述 4 个活动家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参加这个组织。

民主协会的建立为先前分散在比利时的国际民主力量采取共同行动，也为通过它同国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创立了条件。新组织使列列韦尔周围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小组和以马克思为中心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直接合作成为可能。这种合作很快就超出了协会的范围。

旅居比利时的波兰流亡者每年都纪念 11 月 29 日—1830 年起义开始的日子。从 1838 年起通常举行两个庆祝会，前半天是为波兰人举行的，后半天是用法语为外国人举行的。自然，根据 1847 年 9 月 27 日提出的计划，下一个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转交给民主协会。这必定会因为无理干预波兰流亡者事务而引起他们的不满。然而，这件事以妥协而结束。因此既有民主协会活动家又有波兰流亡者代表参加的 11 月 29 日国际庆祝会才得以举行。

预先防止日益激化的冲突，要归功于列列韦尔。他使协会会员相信，他们的方案不是建设性的，并要求由他去帮助扎累斯基准备庆祝活动。后者同团结在 B·特施凯维奇周围的和没有参加布鲁塞尔国际组织的波兰人小组保持良好关系。列列韦尔说，他打算消除普遍的“不安和气愤、平息波兰人对德国人干涉，以及对共产主义空想”、对在波兰侨民区大喊大叫的某些“比利时煽动者的愤怒和不满”。他终于使敌对方面代表加入了波兰人成立的庆祝活动筹

委会。《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宣布 11 月 21 日举行波兰人的庆祝会，而几星期后通知说，预定有 11 个发言人，其中有列列韦尔。报纸补充说，受邀在 11 月 29 日发言的马克思，在 11 月 27 日经奥斯坦德到达伦敦，斯·波尔恩将代替他发言。德国工人联合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派他为报告人。

冲突仍未能避免。在布鲁塞尔市政厅的赫利斯特礼堂举行的会议期间，11 月 29 日它突然爆发了。尽管会议主席 A·然杰比延预先提出了警告，但是同民主协会有联系的活动家的发言突出表现了社会和政治的激进主义，他们利用纪念日来宣传立即发动民族战争来反对妨碍恢复波兰独立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秩序。伯恩施太德不再作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一般地谴责那些压迫波兰的大国，而且严厉批判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人民基础上的制度，把实现波兰人的解放愿望同未来整个欧洲革命联系在一起。波尔恩在发言中的社会批判的调子更为强烈，他号召推翻资产阶级并预言革命即将开始。列列韦尔在自己的发言中也相信：整个欧洲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步步逼近，它将消灭神圣同盟的秩序，并使各国人民获得解放；这一革命会支援波兰解放运动，是在波兰已经开始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的支柱。

在对欧洲革命的性质理解不同的情况下，把波兰问题同欧洲革命前景联系在一起，这在布鲁塞尔 11 月纪念活动的历史上是无先例的。斯皮特霍恩的声明内容也是新的。他指出，欧洲民主派支持波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因为这一斗争的目的是要在这个获得解放的国家中实行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欧洲民主派的左翼不再从人道主义的温情的动机出发同情波兰人及其事业。在场的思想保守的波兰流亡者对一位根特民主主义者的发言表示不满。

11 月 29 日庆祝会上的激进的发言推动比利时报刊开展原则性争论。这次争论使得政治流亡者右翼和左翼发生两极分化。流亡者中的保守分子把外国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把共产主义者看作是对统治制度的严重威胁，不仅同他们进行公开的斗争，而且还企

图从政府那里寻求对付他们的坚决措施。^④ 团结在民主协会周围的激进派打退了右翼的袭击，并公开宣传革命思想。在这场斗争中，波兰问题被推到次要地位；当双方在论述自己的立场时感到有必要的时候，它们才想到波兰和波兰人的问题。

波兰民主协会机关报《波兰民主主义者》为辩论开了个头。它硬说《白鹰报》没有真实地阐述11月庆祝会的进程，不重视民主派的发言。《白鹰报》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注明1848年11月17日的一份《抗议书》在比利时报刊上的发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这份“抗议书”是由当时确实已经离开协会的特什凯维奇、扎累斯基、B·特施克和Я·Н·姆洛杰茨基等人署名的。这个文件谴责“一伙人”——民主主义者“把波兰问题当作极端学说和个人观点的支点”。《抗议书》的作者们断言，波兰的存在不取决于研究西方社会的学说；根据他们的意见，复兴波兰国家的事业将由对祖国的爱和兄弟情谊以及欧洲的真诚无私援助加以保障的。

这一声明受到比利时和国际的民主人士的批判。《社会辩论》、《解放》、《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民主波兰》批驳了它。《解放》发表了卢布林纳的公开信，指出签署《抗议书》的人无权代表整个波兰流亡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非常重视这一问题，2月3日发表了《答布鲁塞尔的波兰贵族集团的某些攻击》一文，文中附有列列韦尔的政治声明。

列列韦尔的政治立场当时不仅受到民主派的敌人，而且受到某些著名波兰和外国的民主派的批判。我们从列列韦尔1847年12月24日在布鲁塞尔寄给兹维尔科夫斯基的信中得知，由于同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保持联系，他的收信人波兰民主协会大活动家也象该组织其他成员Ю·维索茨基、斯·沃尔策尔和K·施托尔茨曼一样，受到责难。列列韦尔向扎累斯基解释说，他认为协会是有益的组织，它“甚至能成为许多会见、发言和运动的支点”。他写道：

^④ 马克思等人同在《北极星报》上攻击国外的民主主义者的阿·巴泰尔斯进行了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6—417页）。

“因为我们的寄信人（马克思——作者）在伦敦会见了沃尔策尔总是称赞的那些激进主义者沃尔策尔、约瑟夫（维索茨基——作者）和卡尔（施托尔茨曼——作者）与之断决关系的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受到约瑟夫的斥责；他说这些激进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要知道正是他们一些人在伦敦尖锐地提出了波兰问题。”

总之，上述的波兰民主主义者谴责了列列韦尔，因为他同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一些人有接触。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点使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沃尔策尔和施托尔茨曼感到气愤，后者不久前还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通讯员。可能是在同布鲁塞尔协会竞争的朱·马志尼创立的国际民族同盟中这两个人的发言对他们当时的立场会产生影响？尽管所提到的对列列韦尔的政治方针的全部批判是来自波兰民主协会，但认为它们反映了它的领导的正式观点，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国外的民主派也指责了列列韦尔。马志尼在1847年12月13日寄自伦敦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大家也都知道，米·巴枯宁具有类似的意见。

列列韦尔驳斥了自己批评者的指责，指出对于波兰事业的重要声明正是出自国际激进主义人士。在1848年1月1—2日从布鲁塞尔寄给兹维尔科夫斯基的信中，他惋惜不能公开答复对自己信件的责难。列列韦尔的协会的德国同事使他能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进行答复。编辑部不仅用法文原文和德译文发表他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针对《抗议书》的作者所作的辩论性说明。

列列韦尔反驳《抗议书》的作者，断然声明：“未来的波兰紧密地同震动西方的先进学说联系在一起，希望把波兰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隔离开来——意味着用真正的万里长城把波兰包围起来。”^⑤不知什么原因，文件的德文译文中“社会主义的”一词被译成“社会的”，从而歪曲了列列韦尔的思想。与自己营垒和其他政治营垒的批评者相对立，他强调指出，波兰获得独立的前景应该不仅同民主主义运动而且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计划联系

^⑤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号，1848年11月3日。

在一起。正是这种看法使得列列韦尔在1848年革命前夜同少数政治上志同道合者一起站在马克思和其他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方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当时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

列列韦尔作为民主协会理事会成员参加了该协会出版文件的筹备工作。他签署了协会1847年11月29日《告瑞士人民书》,马克思也签了名。^⑥列列韦尔11月26日同理事会其他成员一起在协会杂志上签名。该期杂志报道了委派协会副主席马克思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以便建立两个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

列列韦尔看了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之后,了解了11月29日伦敦的庆祝会情况并深表满意。12月5日《北极星报》上刊登的群众大会的消息以及12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纲领性文章也都报道了这一点。12月2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协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伦敦之行的详细报告。所以,列列韦尔在年底已经很熟悉伦敦群众大会的进程。他12月24日给兹维科夫斯基寄了信,他不仅知道那里讨论了波兰问题,而且还提到那些在伦敦同马克思有过接触的激进主义者提议来年9月“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

列列韦尔受民主协会委托,参加同共产主义者有紧密联系的德国工人联合会1847年1月31日组织的新年庆祝会,就是他同德国共产主义者接近的最好证明。在庆祝会上,马克思和列列韦尔同其他人一起发表了祝词。列列韦尔表示要同德国激进民主派团结一致,支持德国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统一,他告诉听众,本国的美好未来的希望也是与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新年庆祝会,正如《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是各国民民主人士向兄弟般的团结迈进的一步”。^⑦

列列韦尔和马克思都在1848年1月17日被选入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在一星期后到达根特出席当地联合会分会的庆祝会开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7—469页。

^⑦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8年1月6日第2号。

幕式。诚然，他们未能参加代表团。卢布林纳以列列韦尔的名义在那里出席了宴会。在根特庆祝会上人们为列列韦尔的健康举杯祝酒。

根据列列韦尔、卢布林纳和科尔达舍夫斯的倡议，在德国流亡者的积极促进下，协会组织了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紀念会。2月22日在斯皮尔霍恩主持下举行了这个紀念会，约有一千人参加。这是列列韦尔及其战友同聚集在协会周围的国际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特别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合作的高潮时刻。

马克思在这个紀念会上的演说是1847年11月29日就波兰问题公开发言的伦敦演说之后的第二个演说。他在演说中首先回忆了18世纪末列强瓜分了波兰的情况。他认为这次瓜分是以1791年宪法雅各宾原则造成的，虽然这部宪法实际上是温和的，适合当时的自由主义概念。1846年列强把先前断定为雅各宾主义的东西称之为共产主义，尽管克拉柯夫起义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没有提出关于消灭阶级的问题。马克思强调指出，反动派在反对甚至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改变所有制关系的任何企图时用共产主义恐惧物来保护自己。他强调说：“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榜样”。而尽管反动派胜利了，但是革命在其他国家“现在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⑧马克思发表演说之后，列列韦尔走近他，并同他亲切地拥抱。

恩格斯在自己的演说中表达了对1846年的英雄们的敬意，把克拉柯夫起义和1830年11月起义进行了对比，同时赞同欧洲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后者所持的批判观点，因为后者拒绝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错过了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恩格斯相信，当时波兰已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页。

存在力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力量，同时提到列列韦尔。接着，恩格斯谈到，1846年运动并不是要恢复旧波兰，而是提出在其废墟上建设新波兰，它“可能是捍卫文明的先进战士”。他强调指出，波兰的民族问题，“已变成一切民主主义者关心的问题”。在演说结束时，他谈了关于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波兰解放运动的态度思考。^①

列列韦尔在自己的演说中捍卫了斯皮尔霍恩所叙述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对待波兰事业的观点。他同意马克思的意见，把1830—1831年波兰起义同克拉柯夫起义进行对比，认为前者不能发展为革命，后者“是从程度很高的革命活动、从社会活动开始的。它号召人民起义，通过激进的革命恢复自己的权利，完全改变社会秩序”。列列韦尔把1846年运动评价为“波兰的第一个社会革命”，并确信从那时起“任何提出对立口号的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位历史学家表示：“从那时起，波兰的任何起义没有人民参加是不能实现的；人民本身首创的东西，正是人民给予第一次推动和确定方向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成效的东西”。

列列韦尔现在把自己未来的政治希望同欧洲革命所支持的人民起义联系起来。他的演说是他的观点激进化的又一个证明。他摆脱了关于由小贵族来领导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先前的幻想，这证明他对革命的人民力量的信赖。

2月22日的群众大会受到布鲁塞尔的绝大多数的波兰政治流亡者的抵制。这一点证明他们不赞成列列韦尔及其少数亲密战友同国际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巴黎革命胜利的消息使民主协会的活动活跃起来。2月27日，民主协会开会期间温和派同激进主义决定的拥护者，即主要是这个组织的德国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第一个文件——这就是第二天发出的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信，协会在信中热烈欢迎塞纳河畔革命的胜利。这封信中被比利

^① 同上书，第537—541页。

时当局评价为败坏名声的一些话正是：确信“法国的邻国人民首先将沿着法国踩出来的道路走下去”；其中也表达了在比利时实现共和主义变革的愿望。第二个文件——寄给“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朱·哈尼的信。信中通知说，协会为了响应巴黎革命的消息开展了“和平的、但是有力的宣传，以便利用在比利时政治制度下可能的各种条件来取得法国人民刚刚争到的幸福。”^⑩第三个文件是给布鲁塞尔市政会议的信，号召对比利时自由立法进行自由主义改革，把手工业者和工人编入市近卫军，发给他们武器。

寄给新法国政府的信是由协会理事会及其两名成员签名的，他们就是马克思和列列韦尔。后者积极参加致法国政府的信的起草工作。2月29日他为前去巴黎转交这封信的斯皮特霍恩亲自写了给他的朋友临时政府主席雅·沙·杜邦·德·累尔、宗教和文化事务部长伊·卡诺和民主主义记者A·吉奈尔的介绍信。当协会的使者把它的信交给临时政府的消息在报刊上出现时，列列韦尔感到满意。

当时，乌云笼罩着民主协会。当局早已向它“寻衅”，认为，正如比利时警察局长A·奥迪所写的那样：“它是用全部力量来推翻君主制”。2月27日布鲁塞尔市长通知当局说，协会成员将要用武力攻打市政厅。晚上在市政厅前驱散共和党人的示威游行之后，在协会的比利时成员和外国成员中间，也在德国工人中间实行第一次逮捕。在后来一些日子里对协会成员继续实行逮捕并驱逐出比利时。

3月3—4日夜，马克思在自己的家里被捕，但过了几天被释放，他前往巴黎。3月5日列列韦尔从比利时首都写信给兹维尔科夫斯基说：“星期天，狂欢，吹吹打打，蹦蹦跳跳，晚上国际民主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喧闹，跳舞；我没去，因为我老了，怕出丑。为什么要参加呢？办公室空了，因为艾姆贝尔移居巴黎；马克思被驱逐，等等。你的地址给了马克思，而他的妻子将会把她和日果的情

^⑩ 同上书，第582页。

况告诉沃尔策尔”。3月25日列列韦尔对兹维尔科夫斯基说：“关于外国人那里发生过的某些离奇故事，有的你会从报纸上知道的，也可能是从波尔恩的讲述中知道的。德国人而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的好妻子在替大家受累。人们想把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布赖埃尔医生撵走，但是罗日埃首相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从列列韦尔的信中看出，他不仅知道对马克思及其妻子的迫害，而且他们在布鲁塞尔居住的最后时刻还与其保持联系。他的信也证实，不久前还在对待国外共产主义者的态度问题上向列列韦尔提出意见的兹维科夫斯基和沃尔策尔都不再回避他们，哪怕是他们同马克思及其夫人和波尔恩有所接触。

马克思和多数德国共产主义者离开布鲁塞尔后，列列韦尔及其政治上志同道合者同他们保持的直接联系中断了，列列韦尔和马克思在关系最好的时候断绝了来往。在1848年那年，列列韦尔交给去科隆的一个波兰人（可能是弗·科斯策尔斯基）一封给马克思的介绍信，马克思收到了此信。后来，1849年2月23日，列列韦尔同卢布林纳一起从布鲁塞尔寄给担任《新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一封信（“周年纪念日前夕”正如信的日期落款下边所写的那样，为的是提醒共同庆祝上一年的克拉柯夫起义周年纪念日的场景），请他在该报上刊载揭露政治密探波兰流亡者汎·维涅尔的警告。列列韦尔在亲笔写的附言中提出向燕妮·马克思转达问候。同年2月28日在《新莱茵报》发表了这篇警告。

后来，列列韦尔同马克思的联系就很少了，所以后者相信了德国报刊散布的传闻，似乎是这位波兰历史家1852年到伦敦是为了以波兰民主协会领导的名义同拉·科苏特以及朱·马志尼讨论指靠拿破仑第三支持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起义计划。但是，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列韦尔都未忘记他们曾经在布鲁塞尔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马克思由于卡·福格特对他进行谴责而在1860年2月3日寄自伦敦的信中提到先前的联系，请列列韦尔给他寄信，“证实自己的友谊”，“证实他在布鲁塞尔对波兰组织的尊敬”。燕妮·马克思整

洁地抄写了丈夫的信并在信上署了名。列列韦尔满足了这种愿望，并在同年2月10日从布鲁塞尔写了回信，信中热烈地问候马克思及其妻子。马克思在他同福格特的辩论中使用了这封信。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前委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在致1880年11月27日于伦敦召开的1830年11月起义50周年纪念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1848年革命前夕列列韦尔及其战友们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合作。在这个文件中写道：“1847年，在伦敦秘密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①也许正是这封信为所谓列列韦尔在《共产党宣言》上“签了名”的说明提供了根据。这封信也为文献中重复的关于波兰人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尽管还没有明显的证据。

1848年2月22日布鲁塞尔的庆祝会可能是信中所说的列列韦尔及其拥护者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的群众大会。《共产党宣言》当时还没有发表，但是它可能已经开始付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涉及到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没有提到代表大会，而列列韦尔在自己的演说中阐发了波兰土地革命的思想，同意了他们的演说。他当众拥抱马克思，表达了对马克思演说内容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也能够作为列列韦尔“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决议的证明，铭记在1880年这封信的作者们心里。

在《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支持曾经发动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的那个政党”。^②如果把上述一

^① 同上书，第19卷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503页。

这段话同列列韦尔 1848 年 2 月 22 日所说的关于波兰土地革命的未来的话加以对照,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宣言》的作者支持的正是列列韦尔当时叙述的那个纲领,他们能够把他的话理解为支持他们的立场的表现。所以,《宣言》中出现的这段话是和它的作者以及德国革命派的其他活动家同列列韦尔及其周围的人在 1847 年底所建立的关系有联系的。

以列列韦尔为首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小组同国际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 1848—1849 年革命前夜的合作,是波兰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史以及他们参加这一运动的历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短暂的,接触的次數也比较少。合作的结果是:波兰民主主义者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理解波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接触也对波兰民主主义者观点的激进化产生了影响。列列韦尔的例子是最清楚不过了。另外一件事是,这种进化是不彻底的:列列韦尔本人很快放弃了 1848 年革命前夜和头几个星期他的世界观所固有的激进主义。

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 年第 5 期

(华明译 孙魁校)

论 策 略^①

〔俄〕 格·普列汉诺夫

策略一词是政治活动家从战争艺术理论家那里借用来的。大家知道，战争艺术就在于使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于他追求的目的。至于策略一词的本义，人们把它理解为调遣部队来作战并在会战时指挥部队的艺术。这个概念较之同政治策略一词相联系的那个概念要狭窄得多。政治活动家常常把军事理论家称之为战略的东西叫做策略。但是不论怎样，任何人都不难承认：政党或军事长官所追求的目的是一回事，使这个党或者这个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这一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对目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手段的巧妙运用。谁出发去作战时以为他只要知道为什么打仗便足够了，他就有遭受惨重失败的危险。

对这个公理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文献中表现为党的原则和它的策略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彼此一致的人们可能在这个或那个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试问：是否可以把策略分歧算作其存在会使某些政治活动家可能不再属于同一政党的那

① 本文的原标题为《总论策略，部分地论尼古拉的列阿德将军的策略，特别是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发表在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号上。文章论述了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策略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原则分歧，从而必然使原属一个政党的同志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它还在列宁之前首次批判了经济派的“过程策略”。旧《火星报》共出版了45号。列宁说：“45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16页）拿这篇文章同在此以前《火星报》上发表的列宁著作比较，也可以证明列宁上述论断的正确性。——译者注

些意见分歧呢？

如果用粗心大意的态度看问题，也许觉得这个问题除了否定之外不能有其他回答。策略问题不应该导致分裂；如果人们原则上彼此一致，如果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么他们就是同志，而且应该始终如此；由于次要的局部问题而分裂对他们就是有罪过的……

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人通常都这样说。而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一知半解使他们看问题粗心大意。他们以为，策略问题同原则问题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这种鸿沟不存在，这就说明为什么策略分歧越过某种界限会变为原则分歧。

要证明是不难的，只须举出法国就够了。饶勒斯过去和现在都确信，他只是在策略问题上同盖得、瓦扬和其他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有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是正确的。如果把原则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例如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应当消灭、为了消灭剥削必须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等原理，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饶勒斯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些原则。然而，任何人现在都明白，盖得和瓦扬不可能同饶勒斯走在一起。在这些老战士和冯·米勒兰男爵阁下^②能说善辩的朋友之间存在的策略分歧，无疑现在达到了已开始成为原则分歧的程度。

问题在于，除了上边列举的表述和论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那些原则之外，还有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策略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对后边这些原则彼此看法有分歧的人，不管他们在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上有多大的一致意见，也不可能走在一起。譬如就拿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最大的灾难，硬说完全停止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解放首要的实际条件。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当自己在确定最终目的上同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时也不会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前边我们说过，对目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善于运用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我们补充说，正因为如

^② 大家知道，米勒兰不久前被奥地利皇帝授予男爵头衔。

此不能把最终目的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看成是将实践的战士团结在一个政党的旗帜下的充分条件。

诚然，饶勒斯及其同伙宣布自己同盖得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始终不渝的和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的例子比任何别的例子都更好地表明，不是任何承认某种原则的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都遵循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所以不能认为那些把不仅不会提高这种觉悟、而且直接使这种觉悟变得模糊的策略强加给工人政党的人是阶级斗争的真正拥护者。在这里，为什么正是这些人坚持这种有害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在欺骗自己，还是因为他们想欺骗别人，几乎都一样。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企图把无产阶级运动拉向后退。革命社会民主党同这些人——饶勒斯主义者无疑也在其中——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为了使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或组织，或派别，或政党）能够联合起来有利于事业，因此，除在对待最终目的方面意见一致之外，必须使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坚持可能会使另一个团体（或组织，等等）觉得不利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的那种策略。这是不可以也不应该越过的界限。两个团体之间的策略分歧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分歧便具有原则性的意义，那时分裂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阻止分裂意味着危害事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观点未必可以承认是正确的。大家知道，我们是沾染了“教条主义”、被盲目信仰弄昏了头脑、而且还犯了一大堆滔天大罪的宗派主义者。因此，听听一个由于造物主没有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他而有充分权利感谢造物主的人的话，对我们将是有益的。此人就是波·克里切夫斯基。

他在第10期《工人事业》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原则、策略和斗争》。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同《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意

见分歧。在阐明过程中，被他提到首位的是这样的问题：“原则和策略之间的正确的和正常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如何理解策略的本来意义”（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着重点）。这恰恰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且听听克里切夫斯基的话。

他说：“正确的策略是指明运动的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此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5页，着重点是克里切夫斯基加的）。

克里切夫斯基给了我们这个定义之后，补充说，他所谓的策略这里是指“活动的总的指导精神，活动的哲学，可以说，它不同于活动本身，不同于实践活动的一般性质意义下的策略，因而更不同于作为技术的策略，不同于活动的一些个别的方式和手段”。

就是说，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策略：（1）哲学策略；（2）活动策略；（3）技术策略。且把“技术”放在一边不予考虑，我们仔细看看前两类策略。

从“哲学策略”开始。根据克里切夫斯基给它下的定义的意思可以得出，（党的）活动哲学，它的指导精神是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以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既然完全有权可以把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称为指导原则，又既然这些原则显然无非是指导党的活动，因而也就成为这种活动的指导精神，那么我们就得到以下意义深刻的论题：

（党的）活动的指导精神，这种活动的哲学，是活动的指导精神和这种活动得以进行的那些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什么是A？A是A和B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不知道读者您怎么样，不过我们不是这种“哲学”的爱好者，我们以为，如果波·克里切夫斯基不妄谈“哲学”，而是简单地表达它想表达的那个简单的思想，即如果他说，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应该不仅决定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而且也决定于周围现实的特定条件，那他就会做得好得多。这种表达方式会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优点，即它完全不会有……“哲学的”胡言乱语“成分”。当然，它也会有巨大的

缺陷,即它会导致“活动策略”同“哲学策略”完全融合,那时我们就只会有两种策略。然而波·克里切夫斯基能容忍这种尴尬局面,令人宽慰的是他还备有两种类型的策略,计划策略和过程策略。

我们的作者宣称:“计划策略自然只能建立在诸原则的基础上,还建立在活动的最一般条件的基础上,例如在俄国就建立在专制制度存在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策略是不适合的,它归根到底会导致有害的动摇。波·克里切夫斯基确信,当李卜克内西拿计划策略同当年维也纳的参谋会议主席(Ober-Kriegsrat)为正在同法国人打仗制定的那些计划相比较时,他很中肯地评价了这种策略。李卜克内西说:“这些计划从某种意义看是无可指责的,但它们不适合于这个场合,法国的将军们没有可爱到根据维也纳参谋会议主席的设想行事,于是战争就按照艺术的全部规则失败了。”

波·克里切夫斯基根据这一切最坚决地谴责“计划策略”。他声称:“总之,看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倾向于把策略看成是预先制定的和不变的活动计划。我们就在策略中看到同党一起增长的党的任务的生长过程”(第11页)。

同党一起增长的任务的生长过程!波·克里切夫斯基这里说的是怎样的任务呢?显然是策略任务。由此可见,按照他的观点,策略是同党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生长过程。策略就在于策略任务的生长。这真是无与伦比!简单的头脑永世也想不出来!

我们这位策略家——看来他并非命中注定同党一起增长——拿李卜克内西做挡箭牌完全是白费气力。为了给这种策略找到根据,他本应首先指明,这位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按其实践观点是同他接近的。然而要使我们相信这一点是困难的,我们清楚地记得,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德国报刊上所说的关于法国社会党人策略的某些见解如何激怒了李卜克内西。因此我们就不去管李卜克内西,而来讨论我们的作者。

李卜克内西的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他以为同奥地利将军作战的法国将军轻视计划,而且也象他一样局限于这样一种深

思的见解：策略是与战役进程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增长过程。然而克里切夫斯基不妨看一看例如拿破仑一世著名的回忆录（Commentaires）：他会从中看到，那位使奥地利（而且不止一个奥地利）遭到最惨重失败的法国统帅如何细心思考以及如何认真制定自己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计划。拿破仑不仅不敌视“计划策略”，而且坚决主张在认真制定计划时应该事先采取防止各种各样偶然事件的措施^③。如果当年有某一个深思熟虑的克里切夫斯基忽然想使他相信，“计划”是小事，成功的主要保证在于策略是如何如何发展的策略任务的生长过程，那么这位专制的科西嘉人大概会迅速地用他那通常的士兵式的无礼态度粗暴地打断他。

从战争历史上的所有英雄中，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人多少接近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理想。这就是尼古拉的阿列德将军，即被认为是列·托尔斯泰伯爵写的著名诗歌中的利普兰季所说的那个列阿德：

不需要聪明人到那里去，
您派个列阿德吧，
我看……
看来列阿德完全鄙视“计划策略”；
列阿德突然无缘无故地
带领我们直奔桥头，
喊着乌拉冲锋！
正当我们“乌拉”声在喧哗，
后备队却没有跟上……等等。

一句话，胜利不愿意向玛尔斯^④的天真无邪的儿子发出微笑。假如波·克里切夫斯基记得他的不光彩的历史，他也许不会写出从此以后有名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就是真正的列阿德式的“喊

③ 请波·克里切夫斯基注意，拿破仑事先制定的不仅有策略计划，而且有战略计划，也就是说不仅有个别战斗的计划，而且有整个战役的计划。

④ 玛尔斯——战神，是和朱庇特等并列的罗马最重要的神祇之一。——译者注

着乌拉冲锋！”

为什么波·克里切夫斯基认为，“计划策略”只能以诸原则以及最一般的现实条件为根据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我们根本不理解由于什么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当考虑的只是“专制制度的存在”，而不是俄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发展的程度，不是自身的组织性（或者无组织性），以及最后，不是它们钱柜里“富裕现金”的数量。根据我们肤浅的看法，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切——十分“具体的”——条件，更可能被读过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著作因而轻视“计划”并且硬说“策略是如何如何发展的任务增长的过程”的那种人所忽略。我们确信——而且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更加巩固了我们的信念——如果谁注定要不断“动摇”，那正是这号才智水平的聪明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断言，《曙光》杂志和《火星报》迷恋着不变的行动计划。他想引用第4号《火星报》社论来证实这种看法。社论说，只有系统地 and 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活动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然而坚定不移地实行通常的计划完全不意味着决心在任何时候也不改变计划。这一点从波·克里切夫斯基引证的社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它的作者直率地说，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不过他不无挖苦地同时补充说，只有讲究策略的人才能改变策略，没有坚强组织因而没有统一行动的政党是谈不上策略的。他的这些看法也是对波·克里切夫斯基的嘲笑。因为克里切夫斯基暴露出可以“在24小时内”仓卒改变策略的轻率意见和企图掩饰自己对待李卜克内西的幼稚的轻率态度。上述社论的作者指出，“《工人事业》杂志之借用李卜克内西的名义自然是徒劳的。24小时可以改变关于某个专门问题的鼓动策略……然而不仅在24小时内，甚至那怕在24个月之内，要改变自己对于整个说来是否始终和绝对需要战斗组织与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看法，只有没有任何原则的人才有可能。”这个意见击中了克里切夫斯基的要害，他看到自己可笑的失误之后，马上开始关于策略的“不宜说出口的”议论，以便想个什么

办法向广大读者掩盖自己论点的难处。

《工人事业》杂志的策略家接着说：“**过程策略——这是根据原则永远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象任何人类探索一样，都会有错误，然而它是运动向前增长的唯一保障。人们早就知道，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不要说漂亮话！”永远探索新道路，而且还是在原则的光照下探索，不用说是好事情。但是只有当“探索者”找到某种真正新的东西时，它才是好事情。当他“永远”发现着早已发现、可他却由于自己极其无知而怀疑其存在的那些美洲的时候，那么他的“永远的探索”只是意味着同样“永远”没有能力弄明白较有经验的人向他所说的话。那时这种“永远的探索”决不是什么“高尚的作风”。那时它应该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严厉的谴责。

根据以上所述，读者自己已经能够对波·克里切夫斯基所介绍的几种类型的策略的优点做出应有的理解。不过为了印象完整起见，他应当再读一读下面的几行话：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通过自己的自觉工作来**加速**客观的发展，而不是取消这种发展，或者代之以主观的计划。《火星报》理论上知道这一切。然而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赋予自觉的革命工作的巨大意义，由于《火星报》对待策略的教条主义观点，使得该报在实践中低估了发展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因此不足为怪，《火星报》由于接受了计划策略，也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接近于阴谋家对待革命‘准备’的观点，也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最后行动中把客观的或自发的过程放在次要地位上。”

很好。波·克里切夫斯基“指明”（我们已经知道他怎样指明的），“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只好着手分析著名的“过程策略”或同样著名的“活动策略”。而当我们发现认清这种策略的内容是不无裨益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家就

“拿起自己的章程”傲慢地对我们重复说，这种策略在于同党的增长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生长过程。如果我们不满意这种回答，那么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中了教条主义策略观点的流毒。这真是妙哉论证！

该放弃“计划策略”了，何况我们本应给予“客观过程”以较之我们迄今都很重视的“主观计划”更多得多的地位。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又是极端深刻的见解。只可惜我们的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叙述自己的思想，因此那里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试用别林斯基的说法，擎着诗的火炬进入问题的黑暗处。我们以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哲学用科济马·普鲁特科夫^⑤的诗《面向尘世》可以很好的说明：

我常常站在岩石上；——
让我投身大海吧……
命运会送给我什么；
欢乐还是悲愁？

也许他困惑，
也许他不怨恼……
瞧，鸟禽在跳跃，
而往何处去——他却不知道。

这首诗很久以来之所以受到我们的喜爱，因为它对“自发的客观过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而对“计划策略”根本不予重视。

àla^⑥卡列耶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把人们的主观计划同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过

⑤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俄国诗人A·K·托尔斯泰(1817—1875)、A·M·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合署的笔名。19世纪50—60年代，他们用该笔名在《现代人》杂志和《火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个笔名的讽刺形象寓意思想上的停滞不前、政治上的安分守己、文字上的陈陈相因。——译者注

⑥ àla, 法文, “象……之流”的意思。——译者注

程对立起来，并且谴责这些计划 *ad majorem gloriam*^⑦ 客观过程。根据这一点，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者鼓吹无为主义。人们揭穿了“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人们曾向他们指出，从《资本论》作者的观点看来，上述对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的主观计划是客观发展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期望，“主观主义者”所臆想的对立至少在那里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的著作中不会出现。现在，这个期望原来是没有根据的。波·克里切夫斯基出现了，并且在修正和补充了“主观主义者”陈旧的臆造以后又重新使这种臆造振奋了精神。如果卡列耶夫先生有幸拜读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大作，他会满意地发现，“主观主义者们”的错误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尊重人们的主观计划；而根据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言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那些力图预见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方向并且据以制定自己计划的革命者是自己哲学上的同志。C'est tout comme（这完全一样），可以不无根据地大声说：“一个老讲废话的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深信，他的策略观点是“把马克思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之一运用于党派斗争”。我们打赌，读者您猜不着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原理”。听我说出来您会惊讶的。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谓著名原理就是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象人类一样，——克里切夫斯基说，——在我们的时代代表前进运动的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一个接一个的策略任务是以产生完成这种任务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第26页）

这句话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竟然站在人类的范围之外。的确它代表人类的前进运动；然而从它模仿人类，“象人类一样”行动中可以看出，它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位“人类的”策略家只是忘了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站在人类

⑦ “以便以更大的光荣赋予”。拉丁成语：*ad majorem Dei gloriam*，意思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最后这句话应译成：并且为了客观过程的更大光荣而谴责这些计划。——译者注

的哪一方面；它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

最后要指出，波·克里切夫斯基还遗漏了一种类型的策略，即**废话策略**。这种非常重要的类型的策略照样也可以看成：1)计划废话，2)过程废话和3)技术废话。我们可以同意，如果我们从计划废话和过程废话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波·克里切夫斯基的文章，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篇文章具有全新的面貌。

原载《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26—136页

（高敬增译 王荫庭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全国代表会议记录(续)^①

第五次会议

1912年1月20(7)日

5日会议继续召开

列宁对季诺维也夫的报告²¹作补充。后来，我在苏黎世见到了普列汉诺夫并同他谈过话。他说，他将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我声明，普列汉诺夫分子方面并没有否决一行字，一个注释。有人指责我们搞派别活动。但是马尔托夫书面承认了我的文章是得体的，而对他的[文章]我不能够说这种话²²。只有一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没有发表过一个书面声明。这是我们处于多数的时候。马尔托夫写了一些没有署名的社论，大家承认它[《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机关报²³。

马特维。提一个问题：呼声派什么时候退出来了，以前他们退出过吗？

阿尔伯特。俄国同志们不能[谈谈]，俄国工人是怎样理解和欢迎中央机关报的吗？

列宁。这涉及出版物。

接着宣读社会党国际局²⁴的报告。

列宁(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人)。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工作：书信往来、委员分工、发……^②等

① 布拉格代表会议共有十次，第一至第四次代表会议记录载于本刊89年第3辑，因限于篇幅，本辑只选译了第五、十次代表会议记录。为便于读者查阅原文，篇末注码仍保持原来顺序。——译者注

② 接着有一个字看不清楚。

等，另一部分是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²⁵。自伦敦代表大会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一名[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全会还选出了普列汉诺夫，但是他表示拒绝，说那里的工作有一个人就足够了。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我同他的关系变得密切了，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当时我已无法同呼声派分子谈话，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的意见，特别是在信的问题上²⁶。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我们俩人共同拥有一票表决权。直到最近我同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哥本哈根[我]参加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最有趣的是，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极端紧张，表面上是一致的，而内部有两个尖锐对立的派别。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有一半是代表党的，一半是代表工会的。这里可以看出，德国代表团的人数越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就越下降。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们因投票赞成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而名声扫地²⁷。例如，代表之一[福尔马尔]说，剥夺资本家是作不到的。²⁸原来他们的纲领对此只字不提剥夺。比如说，实际上他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在这方面不能抱有幻想，越往后，斗争就越激烈，尖锐；当然，无产阶级群众是不会动摇的。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他们退出了会场²⁹，然而这吓不倒任何社会民主党人。

捷克人发生了分裂。我们曾反对这种分裂，认为社会民主党不能听信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在奥地利大量纠纷都是由于用哪种文字书写文件等问题引起的。普列汉诺夫曾就这种分裂问题作过报告，他的决议案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³⁰。托洛茨基当时也开始进行调解，说这是最“温和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过错³¹。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正面临着新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经济危机、军事危机、世界性的麻烦——这一切也促使新时代的征兆提早到来。在此以前进行了准备工作。而现在是同资产阶级搏斗的时代。于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之间的区别暴露出来了。

就摩洛哥问题在苏黎世召开了[社会党国际局会议]。那里还发生了一个事件。莫尔肯布尔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不要开会。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发表了，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在最近这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倍倍尔说，他要求罗·卢森堡作出回答³²。

法国人曾企图把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手段写入决议。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指出不能向政府说明，我们将使用什么武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武器更合适。提案被否决了³³。倍倍尔提出了不发表文件的问题，暗指罗·卢森堡，要求作出决议。我为卢森堡作了辩护。我引了奎尔奇的话³⁴，这使倍倍尔大为恼怒。当时倍倍尔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卢森堡发表的那个文件同那些文件毫不相干^③。最多也只能在党内批评他，而且确实批评了她；把问题提交社会党国际局是没有道理的。瓦扬提议，为了不使卢森堡生气，“将来”向编辑们发表决议^④。这件事情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派别，现在这些派别暴露出来了，[这]说明，党内闹开了。那里迫切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④。

波里斯(主席)。是否有什么问题？我自己提一个问题。东方革命对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

阿尔伯特。能否打听一下，德国和法国政府是否确实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了为和平而进行鼓动的建议？在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消息。资产阶级报纸应当很了解情况。

列宁。波里斯的问题同我的报告没有多少关系，更多的是涉及当前局势。在亚洲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而在欧洲已经结束，应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

③ 原文如此。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35—137页。

至于阿尔伯特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在荷兰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特鲁尔斯特拉³⁵在议会中说，当资产阶级需要过和平日子的时候，它就向社会党国际局呼吁。这里没有其他事实。其次，王德威尔得说：“各界”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呼吁，战争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社会党国际局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那就好了。但是这一点不值得重视。王德威尔得想当部长，他正在“各界”中周旋。而特鲁尔斯特拉却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夸耀自己的力量。当德国政府看到股票下跌而本国有四百万社会民主党人时……这里另一方面是色当³⁶。总之，这完全是由于改良主义者同“各界”紧密交往而产生的谣言。

季诺维也夫。按程序办事。我提议把关于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的那些城市的情况记录在案。

列宁。现在最好让那些亲自去过或者[有]实际资料的人来作报告。

瓦连廷。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代表^⑤去过敖德萨，但是什么人也没有找到。

维克多。有个基辅人，俄国组织委员会委员^⑥到哈尔科夫去了。也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叶列马（卢甘斯克）。我可以报告如下情况（不要发表）。从1910—1911年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通过个人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他们没有正式联系，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办了一个合作社，办了一家公开的报纸，他们在信贷储蓄银行工作，其中有2000名成员。有一个五金工会有200个成员左右，什么也不干。有人摘录《明星报》³⁷。8月他们正式宣称他们是卢甘斯克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不久来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一个代理人，做了报告。他们拥护召开代表会议并且决定选出[一名代表]，但是自己的人他们选不出来，他们又不想[委托]别人。他们收不到出版物，不出

⑤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

⑥ Я·索科林(见注20)。

版小报，各小组都阅读《明星报》，准备进行选举，考虑推举自己的复选人，选举党的杜马议员候选人。他们力量微薄。他们更多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

萨马拉。5月份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后来人们流放回来了，开始谈论组织问题。为了迈出第一步，创办了一个有100个成员的合作社。人们在各个小组里学习，在合作社发表演说，8月份正式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发起小组。当我去参加代表会议的时候，我到过他们那里，作了一个报告。他们请我代致问候并委托我转告，有个萨拉托夫人可能也代表萨马拉³⁸。他们在一起工作：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前进派。

奥伦堡。5月份我到过那里。铁路工人小组是正式的“发起小组”。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小组。他们在合作社中工作。他们希望成立工会，但是人们把他们赶出来了。于是他们成立了铁路工人互助储金会。可以收到《真理报》³⁹，30至40份，他们摘录《明星报》[并]加以散发。小组由17人组成，一部分是知识分子(5人)。

图拉。有一个由感到寂寞的人，正在探索的人和抱着期望的人组成的小组。他们的全部活动就是发行《明星报》。他们阅读各种杂志。他们曾经力图同工会建立联系，但是未能成功。现在他们正在设法同国外联系，那怕是为了发行秘密出版物。

福马。乌拉尔。据一个俄国组织委员会现在已经被捕的代表和委员⁴⁰说，兹拉托乌斯特工人小组早就有30—35人在活动，可以收到出版物。在乌法也有一个小组。

波里斯。我同在乌拉尔工作的一个同志交谈过，他似乎已经被捕了。他说，整个乌拉尔都参加了选举出席代表会议代表的工作；叶卡捷堡、乌法和乌拉尔省。叶卡捷琳堡，乌法和乌拉尔省选出了3名代表⁴¹。在彼尔姆他们故意把人们哄骗了，因为在那里有两个人不可靠。

萨瓦。提出把一个声明列入议程。我要求修改规程并且马上就加以宣读。

波里斯。反对修改规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声明是重要的，而规程是为此而写的^⑦……不能妨碍代表会议的工作。而且很明显，声明不是从讨论中产生的，因为还没有进行讨论。

3人赞成，多数人反对。

列宁。继续作报告，谢尔戈发言。

谢尔戈。乌拉尔。从一开始就被派去了。叶卡捷琳堡的一个代表^⑧出席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准备工作。各个城市都有小组，最大的乌法小组（有知识分子13人：5个孟什维克、7个布尔什维克）准备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他们甚至想出版一家报纸，他们有一个旧的印刷厂。有两个代表被捕了，一个代表并不是由于原则考虑而没有出席。在卡斯利^⑨有一个10人小组（不能发表）。叶卡捷琳堡小组着手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代表叶戈罗夫⁴²遍访了所有工厂，去作报告。出版物很少。有《工人报》⁴³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明星报》和《思想》杂志⁴⁴。没有取消派，孟什维克很少，他们工作得很融洽。有一个代表被捕了，他们选出了另一个人。

科尔皮诺。早在[1911年]8月份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波里斯同志⁴⁵召开了一次有15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参加的会议，他作了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作出了一个决议。波里斯同志没有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因为他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就失踪了。

顿河畔罗斯托夫。见俄国组织委员会主席谢尔戈^⑩的报告。

⑦ 原文如此。

⑧ 伊·伊·施瓦尔茨（见注40）。

⑨ 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卡斯利工厂。

⑩ 指的是列宁作报告的简单记录（见《无产阶级革命》1941年第1期第151页）。

列宁。报告都作完了。决议送到了国际局(宣读决议)^①。就这些报告开展一般辩论合适吗?

阿尔伯特。我认为,我们只能就各地的报告通过一个决议,而关于中央机关报和社会党国际局要另外单独谈。

谢尔戈。我提议开始研究关于各地报告的决议。

投票表决:多数[赞成]。

决议的第一项。

阿尔伯特。凡是有代表来参加会议的地方,可以进行[工作],其他地方是进行试验,必须区分开来。

列宁。到处都要进行加强的工作,不必区分。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一点:“加强的”工作包括已经进行工作的地方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地方。

谢尔戈。不要加“发起”一词,以免引起纠纷;托洛茨基和呼声派分子都在谈论要发起把党取消。

波里斯。后面在决议中是否有说明工人渴望集中、渴望党的意愿的段落?如果没有,那就加在这个地方。

① 决议草案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各地的报告》决议的最后文本如下:“代表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确认:(1)在各地,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秘密组织和小组大力进行工作;(2)各地都认为必须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的秘密党组织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但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合作社和俱乐部等等中进行实际工作来看,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利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发表的讲话等等来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无疑必须加强社会民主党秘密小组的活动;(3)在各地(毫无例外)同心协力进行护党工作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还有国内的前进派(在有前进派的地方)和其他所有认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必要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整个工作是本着捍卫党和反对取消主义的精神进行的。

代表会议相信,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始活跃,将要继续大力巩固旧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相当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环境下为实现旧有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而进行的斗争。”(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14—145页)。

季诺维也夫。在我们[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的决议]中已经有这个,而现在纯粹是重复。

波里斯。修正案:我提议加上“并通过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把地方工作联合起来”。

2票赞成,2票反对。修正案被否决。

第2项。

波里斯。删去“不够”一词。

谢尔戈。相反,要着重指出。

马特维。谢尔戈是对的,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不够,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方面。对工会和教育协会,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波里斯。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那么我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是对秘密党的指责。为了支持党团,我们为彼得堡已经作得够多了。我只是曾在两个中心工作……

谢尔戈(即席发言)。够多了吗?

[波里斯]……我要说,如果说有谁曾使群众感到兴趣,那么只有秘密的党。如果考虑到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说要做更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作了努力,但是如果没力量呢?在工会现在和过去都完全是秘密的党在工作。可以说做得很少,但是我提议删去“不够”一词。我提议去掉“不够”一词,而说“加强”。

2票赞成,2票弃权。多数(6票)反对,提议被否决。

列宁。[我宣布]会议闭幕。宣读收到的萨瓦的声明:“如果可能,我要求在会上宣读我的下列声明:昨天,我在《关于各地的报告》^②中指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组织就全党代表会议和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的代表会议作出了决议,该组织委员会派了一名代表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在作了报告以后,我发现对我参加本次代表会议的问题发生了误会。为了避免进一步发生误会,我声明:根

^② 萨瓦报告的记录稿没有保存下来。——见列宁所作的报告记录(《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41年第1期第152页)。

据派我的组织所作的上述决议，我虽然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但是对代表会议的行动和决定不承担责任，因为它不是全党的代表会议，而只是一部分党的代表会议，因为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证明，它不愿意努力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力量真正联合起来，而所有这些力量都认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存在和加强，即必须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统一起来。”⁴⁶

萨 瓦^⑬

第十次会议

1912年1月23(10)日

第十次会议

波里斯。我宣布会议开幕。

阿尔伯特。紧急声明。所有的国外组织，例如——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等等^⑭。我认为，中央机关报本来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祝贺。代表会议为了保密现在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致贺。俄国组织委员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写信。他们应当知道存在着俄国组织委员会。我们很快将要同他们打交道。

季诺维也夫。可以写信，但是请他们不要发表。

维克多。我提议，或者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或者以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写信。

阿尔伯特。我反对由代表会议写信。他们不了解俄国的情况，会把一切都在报纸上发表，而这将会引起事端，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因报刊而受牵连。

^⑬ 列宁在声明的背面写道：在1912年1月20日早晨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803号，手稿。见《列宁年谱》中文版第2卷第840页）。

^⑭ 接着在记录中省略了。这里说的是这些组织写信祝贺，德国社会民主党1912年1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成就。

季诺维也夫。我撤回自己的建议。

波里斯。我支持维克多的建议。可以由代表会议写信，但可以过三四天以后再寄去。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也可以写信。重要的是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正在举行代表会议。

阿尔伯特。现在以代表会议的名义起草，以后再寄出。

波里斯。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责成列宁同志起草一封信^⑤，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然后再说什么时候发出。

投票表决。一致通过。

波里斯(主席)。现在我们转过来听取关于保险法案的报告。

亚历山德罗夫(报告人)。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向你们对这个法案作经济分析，但是在合法的报刊上，在杜马中已作了许多分析。报告的目的是对决议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应当集中注意的几个问题加以说明。每个人都要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工人保险的思想从哪里产生的。这是来源于工人目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被看成是商品，因此工人得到的只是在正常条件下即在他工作的时候为维持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因此，一旦工人处于不正常的条件下即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完全丧失任何生活资料。由于疾病、伤残、年老、残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未到老年以前就丧失工作能力的也属于这种情况。女工怀孕、生育，以及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相联的失业，即工人尽管愿意并有工作能力，但是找不到工作。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工人们不能养活自己，为了社会的利益，为工人不致灭绝。从前慈善事业对此提供帮助，但这是很狭小的范围，具有偶然性质，取决于资本家的大方，主要是沧海一粟，用这点残羹剩饭是喂不饱肚子的。其次，自然就产生了丧失劳动能

^⑤ 发出了如下贺电：“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在竞选中击败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而取得辉煌胜利的兄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致以热烈祝贺。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64页）。

力是谁的罪过的问题。是国家和资本家的罪过。在许多国家还保留了个人保险,但它有许多不便,例如,如果企业倒闭、破产了,他[工人]应当到哪里去?甚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出发,也需要防止工人灭绝。在工人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保障工人的生活。在德国由国家保险,这是一个实行保险的典范国家。在奥地利、法国,在英国,甚至进行失业保险。首先保险应该是国家的保险。其次,保险应包括所有雇佣工人。既然是雇佣工人,自然他就应当参加保险。第三个原则是,保险应当包括所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对疾病就保险而对年老就不保险,是荒唐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改革者所特有的资产阶级阶级政策是狭隘的。甚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也要求这样做。其次,财政责任由谁来承担?工人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这就是说,补偿的义务应由责任人即社会来承担。最后,关于被保险人的组织问题。这里应该实行工人的完全独立,组织自主。这是国家保险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这种保险想要满足工人阶级利益的话。请原谅,我还忘了提一下义务问题:在实行自愿保险的情况下,对企业主可能有很大的压力,关于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也不再详细地谈了。

现在,如果谈到杜马法案的话,那么第一点,不是整个工人阶级都参加保险:只有工人的1/6,而按另一种统计方法——连妇女和小孩在内只有工人阶级的1/20,其次,把一些特别需要参加保险的工人阶层排除在外了。农业工人的状况比哪里都糟糕。象马尔柯夫所说的那样,这甚至比无耻的嘲弄还严重。此外还把建筑工人排除在外,在那里对工人采取极端敷衍马虎的态度,在彼得堡、基辅,建筑事故夺去了几十个工人的生命。店员也被排除在外。1905年表现最积极,以威胁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要求,说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处境的那些工人阶层遭到了不幸。其次,保险只包括疾病和伤残。有一段时间,在1905年对年老也曾实行保险。沙皇一度谈过农业工人的保险。所以没有任何关于这是新的事业的保

留声明,象政府代表所说的那样^⑥。显然,他们正在利用反革命势力进行安抚和占统治地位的时机,抛出这个杂种,以便转移注意力。

从财政方面看:疾病[保险]完全由工人[负担],伤残保险虽然由企业主负担,但是他们的情况比从前恶化了:例如,休息13周以内的轻伤保险费由伤病救济基金会支付,这种基金会主要是靠工人的资金设立的。轻伤事故次数最多。这是对工人的羞涩钱袋的卑鄙的嘲弄。至于自主和自行管理,在伤病救济基金会中完全是企业主控制。在德国邀请一些有发言权的人参加,而在我们这里,他们说:既然由我们支付,那么也就我们说了算,于是从这些协会就源源不断地传出黑名单等等。伤病救济基金会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在这里也偷偷地保证了企业主的影响。首先他们有权派去参加管理委员会的人不少于工人。在全体会议上他们有权利让他们的一个人担任主席。政府说,你们没文化,雇主有文化。政府把工人赶出了伤病救济基金会,其理由是费用是雇主支付的。那好吧,而在伤病救济基金会是什么情况呢?在那里也灌输文化吗?但除此之外,还有政府机关,其次是大臣会议,还邀请基金会的两名代表去参加那种会议。在德国是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但是在我们这里能够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吗?现在正在选举首都基金会,即彼得堡。其次是召开苏维埃会议,薪俸优厚,而工人每次参加会议是按钟点计酬。各地方自行管理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文化的”雇主、警察、官僚、地方的省政府机关,其次在苏维埃是显贵的官僚和正教院的检察官。所以,这是最恶毒的嘲弄,在西欧你们看不到这种嘲弄。这是偶然现象呢,还是同反革命势力猖獗时代中目前正在经历的时刻紧密联系的[一种现象]呢?沙皇曾经讲过关于农业工人实行年老保险的问题。后来,当革命浪潮迅速消退的时候,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科学界的代表协商,仔细审查这个法案,然后转交季津高津委员会⁷⁶,在那里这个法案被束之高阁达三年之久,

^⑥ 接着正文省略了。

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强硬的发言，才迫使人们把它拿出来。后来法案被提交国务会议，克列斯托夫尼科夫⁷⁷也参加了会议，接着还要经最高当局批准。

这个法案的经历着重说明，工人改革是同革命运动齐头并进的。革命一高涨，改革也就兴起；革命浪潮一退却，改革也就被束之高阁。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其次[鼓动工作]应当具有彻底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在决议中不便写上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来进行鼓动工作，但是问题的实质不会改变。要把它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状况联系起来，同社会改良主义者相反，要说明改革不是防止革命，而是准备革命。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改革]不是取消革命，而是准备革命，为革命扫清道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应当向工人证明，如果他想使某种工人改革取得成功，他就应当成为强者，并且争取获得这种条件。在这里党团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代表会议应当对党团的行动作出评价。在西方由于实行工人改革，党内和党团内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分歧。在法国，在党团内甚至发生了分裂，少数人投票赞成白里安的改革，理由是第一次实行国家保险的原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说，不能把原则同条件分割开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称赞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⁷⁸。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党团投票反对法案是正确的，这对未来是重要的。在杜马的发言中有许多有代表性的事例。就以政府的代表为例子吧。第一次他大加赞扬，说这是立法的杰作。而第二次，当科科夫佐夫⁷⁹刚刚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并在杜马第一次作关于这个法案的发言时，为了更好地炫耀自己，他责备了资产阶级，说什么在政府的文本中一切伤残费用均由雇主支付，而杜马委员会作了修改，把一部分费用转嫁到工人头上。于是科科夫佐夫就证明他同情工人，季津高津却指责他站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方面去了。其次是右派的代表们。在一读时他们照例谩骂革命，骂犹太人，在二读时马什克维奇神父⁸⁰就提出了关于扩大被保险人的

范围的修正案。有一次提出修正案以后，季津高津甚至提醒他说，库兹涅佐夫⁸¹现在正提出这个意见。这显然是蛊惑煽动。落后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的发言也颇为有趣。季津高津说，利用这个法案来激发政治欲望等等是犯罪行为，作为落后资本的代表他使法案变坏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适应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在他们那里一切都象他们的全部政策一样，正在破产。开明资本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比十月党人眼光看得远些，懂得多些。他们知道，如果象十月党人那样蛮干，就会发生1905年革命。斯捷潘诺夫⁸²建议，虽然法律当然不好，但是要逐步慎重地加以实施。舍普金⁸³说：“你们实行这种政策会导致灾变”。关于自行管理，他们说，草案已经走得太远了，但是所有〔基金会〕毕竟应当受一般国家机关的监督。立宪民主党人在所有发言中都声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反对者，十月党默不作声，希望简单地用举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思想斗争，而战斗总是在库兹涅佐夫和普列德卡林⁸⁴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发生的。而库兹涅佐夫由于并不想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并揭露他们党团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在这里禁不住不顾一切地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斗争。每当社会民主党人发言时他们都高声叫喊，这是群众大会式的讲话，等等。

我忘了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按工厂来组织；按工厂，而不是按地区。按工厂的办法使工人受到束缚。随时都可以影响自己的工人，这已经是对伤病救济基金会的非法影响。在德国有两种办法，我们看到，按工厂的办法情况不好，补偿费数额低些。把工人看成是冒充者等等。工厂救济基金会越来越不景气，而地方救济基金会却日益发展。工厂基金会被谴责成西方的经验，而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按工厂保险的办法，他们援引了德国的例子。立宪民主党人作了这样的发言，辩论提供了有关对改革和工人阶级的态度的大量材料。在鼓动中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波里斯。您的时间已经过了。

投票表决，多数人同意他继续发言。

[波里斯]请您继续。

[亚历山德罗夫。]还必须提防取消派的鼓动，他们歪曲并削弱这种鼓动工作。我们已经看到，不能把这个法案同当前形势分割开来。而希赞嘲弄说，还必须不是从一般观点，而是从纲领的观点出发（见《复兴》杂志第6期）。这里我们看到，甚至从他的观点来看，鼓动工作也被削弱了。他说必须不是从蔚蓝色的未来理想出发，而是从不幸的必然性的观点出发，即必须适应6月3日的制度。因为你们采取消极态度，即进行否决。他提议积极地拒绝国家的财政救济。即使我们[偶然也会使人们的眼界由于]热爱劳动[而受到限制]，那么我们会适应，就会实行季津高津的改革。奥列尼奇说，必须自觉地以合法的方式指导整个运动。没有必要把要求进行广泛的、公开的讨论的事情加以保密^①。至于这一切，可以在合法的杂志上写文章。合法的语言并不那么可怕。其次，应当在根据3月4日法律⁸⁵召开的历次合法的会议上竭力加以执行。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还将留下一条尾巴。最后，我们应当尽力阻止这个法案通过。在法国工人们阻止了白里安的改革，拉法格⁸⁶曾经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鼓动：首先他建议那些应当支付费用的人举起手来——结果手臂林立。然后他建议可能获得[退休金]的人举起手来，结果举手的就一两个人，于是政府撤回改革，以便进行修改。这种阻止办法在我们这里未必能行。在我们这里将干脆从工资中扣款，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的话，那就将为利用合法可能性提供广阔天地，将有一个完整的工人组织网。一切工人组织，甚至体操组织，都必须加以利用。而这种“与个人利益攸关的”问题将把大批工人卷进来，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利用所有这一切并且在决议和鼓动工作中着重指出这一点。

波里斯。紧急声明。巴库组织和梯弗利斯组织的一名代表^②抵达我们这里了。请允许他出席代表会议，并享有表决权。

^① 见注75。

^② 苏·斯·斯潘达良。

谢尔戈。当然，不可能有别的回答。

瓦连廷。我提议向报告人提问题。我自己提一个问题。

波里斯。也许先宣读决议再提问题更好些吧？

瓦连廷。我不[反对]。

宣读决议。^①

瓦连廷。我想知道，怎样建立伤病救济基金会，人员如何选举产生，等等。

波里斯。在按工厂建立基金会的情况下工人由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有什么条件？征收保险费吗？

亚历山德罗夫。人员选举和成立基金会都按一定的工人人数，我不记得是多少人成立一个基金会。如果工人超过这个数目，就成立两个甚至三个基金会，如果人数不够，就联合起来，立法者是全体大会。在全体大会上选举理事会，而且资本家有权派出的代表不少于工人。其次，参加政府机关的代表由各地方基金会在全体大会上选出，而参加苏维埃的代表不是由所有伤病救济基金会选出，而只由首都的基金会选出。在那里代表大会选出两个代表。其次，雇主有权委派一个代表。他[工人]如果转到另一个工厂去，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因为他不享有任何长久的权利。这只取决于是否交纳保险费。他交了保险费，那就有权得到。在西方，在各种计划中都要求统一的基金会，保险代表大会也要求一个统一的基金会，有一位大臣甚至声称，按工厂成立的基金会过时了。

萨瓦。我想建议报告人同志提出右派和科科夫佐夫的基督教改革意图。例如我们的亚历山德罗夫的工人派去了马什克维奇神父……^②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⁸⁷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们在鼓动中必须指出这种情况。

维克多。我想问一下，在谈到推翻专制制度的地方能改为“推

^① 决议正文前面已经按项分别刊载了，最后的文本见《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396—398页。

^② 马什克维奇神父在这里用了俄文第三格，似应为第四格。——译者注

翻沙皇制度”。

亚历山德罗夫。实质上萨瓦夸大了，但是在决议中未必需要指出这一点，而且那也是不对的。右派的立场是对工人采取宗法式态度。马什克维奇的立场对右派来说没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是他们为了依靠群众只好采取蛊惑宣传。如果我们在决议中指出这一点的话，那么[结果]好象马尔柯夫倒真的是工人的维护者了。这完全不是他们的特点。不如保留，象在原来行文中那样。

萨瓦。我认为，我们正在制定一条路线。是否必须让人们注意右派呢？他们耍弄我们，说什么一般政治是一回事，而你们工人是另一回事。我们也反对资本，赞成保险，甚至赞成罢工。必须揭穿他们的伪善面目。

波里斯。我反对萨瓦的修正案，因为右派的立场与其说不象在西方那样同基督教社会主义立场相一致，不如说同旧的专制制度的立场相一致，即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并且维护一切阶级。专制制度甚至在工人改革中也比十月党人还左。他们是政府的维护者，而不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是不对的。

瓦连廷。我提议停止辩论。

8人赞成。

[萨瓦]我提出一个修正案：在谈到由于杜马有关保险的活动而进行的鼓动的地方，指出右派进行基督教改革蛊惑宣传的意图。

[投票表决萨瓦的修正案]。

没有人赞成，多数人反对。修正案被否决。

亚历山德罗夫。主张保留“专制制度”的提法。请允许我为旧的口号辩护。这里谈的是彻底推翻专制制度；社会内容同“沙皇制度”有点联不起来，“专制制度”包括整个政治体制。沙皇只是最高当局的代表人物。

季诺维也夫。我不认为，作为关于体制的概念同“沙皇制度”一词就没有联系起来。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说要推翻专制制度。我认为，如果改用“沙皇制度”一词，决议将会得到改善。

[维克多。]我提议修改“彻底推翻专制制度”，用“沙皇制度”一词代替“专制制度”。

投票表决维克多的修正案。

[9人赞成，没有人反对]。修正案被通过。

季莫费。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民主制度”。

季诺维也夫。既不用“制度”也不用“共和国”。

季莫费。我提议讨论两个修正案。展开辩论。

5人赞成，3人反对。

季诺维也夫。在德国俾斯麦实行了多少能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普遍选举制⁸⁸，关于9小时工作日的改革在他们那里也快要实行了，而这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我们这里都不进行争取实现共和国的鼓动。在另一个地方我准备讲20次。有人将对我们说：“你们等着民主共和国吧”。你们想取消在任何制度下实行多少能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改革的可能性。

维克多。不能说，民主共和国能确保阶级斗争的充分自由。我主张保留“民主共和国”，但作一点修改：把“多少能符合”改为“真正符合”。

亚历山德罗夫。反对格里戈里的立场。他的立场更多是以误解为基础的。我们应当指出一般情况。德国的例子并不是金科玉律。那里俾斯麦自己就说，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实行改革。在英国由于大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而实行了改革⁸⁹。专制制度如波拿巴主义⁹⁰往往也实行改革。应当指出，任何改革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才可能是充分的。现在，如果通过季莫费的修正案，正好符合格里戈里的论据。在建立民主制度以前，这是正确的。

萨瓦。不幸的是格里戈里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考虑问题。我是不拥护俾斯麦的，如果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俾斯麦的话，那将怎么办呢。但是这个事实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这里不可能有俾斯麦，只是由于阶级斗争才将进行改革。而我们希望怎样去赢得这

场阶级斗争呢？亚历山德罗夫对问题的提法是取消主义的或者是空想主义的。我应当指出，在我们这里，不进行斗争就不可能实行改革。

季莫费。在一个地方我们已经用“沙皇制度”代替了“专制制度”，因为已经同当代的内容不相符合了。亚历山德罗夫提议的“民主制度”听起来太模糊而不明确。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承认这一点。必须向工人指出，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只有通过起义才能推翻，既然如此结果却突然说某种民主制度。应当明确地说，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格里戈里援引了历史事实，他的不同意见证明了他的“多少能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想法，但是我国的专制制度也这样做了，这是奇怪的。而“真正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我们知道，在法国社会改革已经结束了，在俄国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这种改革。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点，而近来人们已经开始完全忽略这一点。例如，取消派主张自己的联合，“请愿”等等运动。

[季莫费。修正案]：把“民主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国”。

3人赞成，7人反对。修正案被否决。

季诺维也夫。我是拥护民主共和国并反对取消派的。但是这里不必故意挖苦取消派并说出一些不正确的话来。在阿根廷，一提共和国就把所有工人印刷厂都捣毁了，干脆烧光了。在美国，一提共和国，宁肯为罢工而死；说工人改革同一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是不正确的。在共和国也可能不实行改革，而在其他国家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却可能实行改革。俾斯麦并不是出于儿戏，而是出于需要才实行了改革。在那里最迫切的任务曾经是搞武装起义。我提出三点修改方案：第一，讲一种改革，而不讲所有改革；其次删去“阶级斗争的充分自由”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个东西。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比较自由。再次，摒弃季莫费的修正案，他的修正案更加无法接受。说德国有[更加]民主的制度，是对的。只有谈到专制制度时才能说，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专制制度还没有

垮台以前,我们就可以科学地证明它不可能实行稍微重大的改革。我们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争取为工人实行稍微重大的改革。德国没有共和国,[但是]那里有重要的保险法。您会使鼓动更加困难。

维克多。我们面前有两种情况: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民主制度。在沙皇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改革。我们应当指出,什么时候改革真的能符合工人阶级利益,这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有的真理,每天讲是有好处的。

季莫费。修正案:在阶级斗争多少有点自由的条件下。

3人赞成,6人反对。修正案被否决。^②

对整个[决议]投票表决,1人弃权。

(王士云译)

注 释

- 22 指的是下面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上的列宁的文章《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201页)和发表在1910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在正确的道路上》,马尔托夫的文章的宗旨是要反对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 23 列宁谈到马尔托夫参加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显然是指1909年编辑部的工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引者)之后召开的全会上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新编辑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马尔托夫、马尔赫列夫斯基。一年之内出版了9号。马尔托夫在新编辑部中是孤立的,他常常忘掉自己的孟什维主义。我记得有一次伊里奇满意地说,同

^② 对决议确定部分第4项第2段,考虑到所提的各种修正案,列宁最后是这样审定的:“彻底推翻〈专制制度〉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以保证无产阶级有充分自由去进行阶级斗争〉,争得〈革命阶级〉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是实现〈多少能〉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的必要条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806号,修正案。——列宁手稿)。

马尔托夫在一起工作得很好,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新闻记者。但这是在唐恩没有来到之前”(《回忆列宁》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21页)。

- 24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情报机关。从它成立的时候(1900年)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列宁为自己驻国际局的代表。普列汉诺夫仍留在社会党国际局,但是代表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拒绝继续在社会党国际局工作,根据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列宁一个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1月(1910年)全会建议普列汉诺夫重新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但是他起初拒绝了,而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8月)以后接受了这个建议。
- 25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从1910年8月28日到9月24日举行;也指由于所谓阿加迪尔危机(见注32)于1911年9月23—24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 26 指的是反映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状况取消派观点的托洛茨基的文章。这篇文章匿名发表在1910年8月28(15)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弗·伊·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为此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关于这一点,见列宁的文章《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347页)。
- 27 说的是1907年8月第二国际斯图加特(第七次)代表大会主讨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由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机会主义多数派提出的决议草案拒绝对殖民主义作原则性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主要成员不顾代表大会多数代表团的意见,支持这个草案。
- 28 格·福尔马尔(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列宁提的是福尔马尔的哪一次发言,没有查明。
- 29 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1910年9月18—24日)。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列宁的文章《两个世界》(《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0页)。
- 30 指的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在关于工会团结

问题上的分歧。在奥匈帝国工会非常代表大会(1905年12月)上,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成立本民族工会的问题,捷克族的工人,不管其工作和居住地点,一律参加这种工会。捷克人的提议被压倒多数票所否决。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拒绝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191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次代表大会否决了捷克人的分立主义提案,一致赞成工会组织的国际团结。

- 31 纪·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列宁提的是托洛茨基的哪一次发言,没有查明。
- 32 由于一艘德国军舰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而发生的阿加迪尔危机,1911年9月23日在苏黎世召开了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这使德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的边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由于担心在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中出现麻烦,不愿意发动反对本国政府帝国主义挑衅的抗议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书记赫·莫尔肯布尔写信表示反对召开社会党国际局的专门会议。罗·卢森堡表示坚决不同意执行委员会的看法并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莫尔肯布尔的这封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不仅在党内,而且在社会党国际局内开展了反对卢森堡的运动。在苏黎世的会议上,列宁发言为卢森堡辩护。
- 33 指的是对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关于国际仲裁和裁军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补充,这一补充由持机会主义立场的法国社会党领袖爱·瓦扬和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者乔·哈迪提出的。这一补充把总罢工,特别是军事工业各个部门和运输业中的总罢工评价为防止新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从而就缩小并限制了群众性反军事发动的可能形式的多样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表示反对这一补充。
- 34 哈·奎尔奇(1858—1913)——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援引了奎尔奇的什么样的言论,没有查明。
- 35 彼·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持极端机会主义的立场。
- 36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的色当战役,这次战役以法国军队投降而告终。在德国内部政治斗争中,在侵略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中,色当的胜利被利用来煽动沙文主义情绪。
- 37 《明星报》——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1912年在彼得堡出版。
- 38 在代表会议上应当代表萨马拉的是彼·伊·沃耶沃金(1884—1964),

他从1899年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但是当时他被捕了。

- 39 《真理报》(维也纳)——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性报纸(1908—1912年)。
- 40 指的是伊·伊·施瓦尔茨(1879—1951)，他从1899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是代表叶卡捷琳堡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委员。1911年10月被捕并押送到叶尼塞斯克省。
- 41 叶卡捷琳堡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是伊·伊·施瓦尔茨(见注40)。原来预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也将是代表，但是他由于从流放地逃跑未成而被捕，被关进了托木斯克监狱。被选为参加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秋明代表是尼·尼·纳科里亚科夫(1881—1970)，他从1901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1年底他流亡美国，因此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乌法代表的姓名没有查明。
- 42 尼·尼·叶戈罗夫(1871年生)——工人，孟什维克，彼尔姆省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党团。
- 43 《工人报》——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通俗机关报；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到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出了9号。关于《工人报》的问题是代表会议议程之一。列宁作了报告。报告和讨论的记录以及决议草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根据莫斯科保安处的间谍札记来判断，列宁的报告非常注意揭露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列宁把《工人报》的创办看作同维也纳《真理报》进行斗争的手段之一。间谍札记中说：“列宁证明花钱去办一家同《工人报》类似的机关报是没有好处的，他明确指出托洛茨基偏向于鼓励甚至直接促进孟什维克呼声派提出取消派倡议，从而得以使代表会议作出了赞同《工人报》的独一无二的活动，并使《真理报》失去早在1910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一月全会开会期间确定的资助的决定”(见《布尔什维克》第96—97页)。在关于《工人报》的决议中，代表会议指出该报坚决而彻底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声明该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正式机关报(见《苏共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01页)。
- 44 《思想》杂志——布尔什维克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从1910年12月至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出了5期。列宁从国外领导了这家杂志。
- 45 大概指波·阿·布列斯拉夫(1882—1938)，他从1899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他是隆瑞莫党校的旁听生；1911年6月他作为国外组织委员会筹备召开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和伊·伊·施瓦尔茨一起回到俄国。他在彼得堡，后来在莫斯科工作，1911

年10月底在莫斯科被捕。

- 46 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收到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工作并否认代表会议具有全党性质的信以后,捷文提出了这个声明。
- 76 叶·叶·季津高津(1860年生)——十月党人,谢尔普霍夫纺织厂厂长,莫斯科省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曾任工人问题委员会主席,维护大企业主的利益,阻挠讨论工人和职员保险法案。
- 77 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1855年生)——十月党人,大企业主和交易所经纪人,莫斯科商业银行和莫斯科交易所协会董事长。1906年起任国务会议成员。
- 78 指的是工人养老金法案,对这个法案法国舆论界讨论了10年左右,1910年4月阿·白里安总理把这个法案提交国民议会通过。这项法律规定对所有低薪工人实行强制保险,保险基金的1/3由工人交纳(要交30年),2/3由企业主拨付。退休年龄定为65岁。法国社会党的革命派(盖得派)和劳动总联合会反对这个法案。1400万工人当中只有260万工人同意愿意接受退休金。
- 尼·亚·谢马什柯在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看来依据的是《工人年老保险和法国社会党人的策略》(发表在1910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上)一文,该文赞同支持这个法案的机会主义者的路线,谴责了反对法案的人。
- 79 弗·尼·科科夫佐夫(1853—1943)——沙皇俄国的国务活动家。从1904年到1914年(1905—1906年除外)任财政大臣,从1911年起同时任大臣会议主席。
- 80 德·Ф·马什克维奇(1871年生)——神父,黑帮分子,赫尔松省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杜马预算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委员。
- 81 格·谢·库兹涅佐夫(1881年生)——工人,孟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工人问题委员会成员。这里说的是他1911年10月17日在杜马所作的关于工人保险草案问题的发言(关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9—22页)。
- 82 B·A·斯捷潘诺夫(1872年生)——工程师,立宪民主党人,彼尔姆省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他在工人问题委员会和杜马的几次会议上讨论保险法案时一再发言批评其细节,但是总的说来却支持政府的法案。
- 83 尼·尼·舍普金(1854—1919)——俄国地方自治人士,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莫斯科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的几个会议

上一再发言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论战。

- 84 安·亚·普列德卡林(1873—1923)——医生、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党团，附和布尔什维克。
- 85 指1906年3月4日颁布的关于结社、集会的临时规则。
- 86 保·拉法格(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同茹·盖得一起创建了法国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尼·亚·谢马什柯这里提到的那件事，看来是发生在一次工人集会上。
- 87 20世纪初在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有所加强，这首先是同作为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在工人运动中制造分裂的一种斗争手段而建立的各基督教工会的活动相联系的。雅·达·捷文虽然正确地看出了俄国和西方的右翼政党和教徒们在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的方法上，在进行社会蛊惑宣传的性质上有某种一致，但是他认为俄国右翼政党和僧侣们在工人问题上的思想和政策同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是相近的，或者甚至直接把它们等同起来，却是错误的。
- 88 奥·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他由于利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年)未能达到扼杀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提出了蛊惑人心的社会立法纲领。
- 89 尼·亚·谢马什柯大概是指19世纪30—40年代英国争取实行社会立法的斗争史上的一些事件，当时力图破坏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大地主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就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劳动保护法。
- 90 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第三的所谓“改革”。法国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51年他发动了政变。列宁写道：“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249页)。

葛兰西思想的主要特点

张 本

安·葛兰西是当代西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他吸收了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哲学和政治斗争三者统一,历史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社会心理学”等思想中包含的积极因素,在领导意大利革命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主要著作被陆续翻译成多种文字,他的《狱中札记》也从俄译本译成中文。各国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分析 and 评价尽管众说纷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肯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创造性贡献。那么,葛兰西思想究竟有什么特点?是否统一?有何现实意义?弄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正确理解葛兰西思想。

一、实践哲学

葛兰西从他参加革命斗争的早期开始,就具有突出的反“决定论”的倾向。1917年12月,他以《反〈资本论〉的革命》为题,撰文评论俄国十月革命。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虽然放弃了《资本论》中的某些说法,却没有放弃它的振奋人心的固有的思想。”^①俄国没有必要重复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历史。战争激发了人民的意志,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觉悟。“革命者自己将要创造全面实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他们创造条件的速度将比

^① 《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10—1920)》英文版第34页。

资本主义迄今所能做到的快。”^② 在葛兰西看来，不能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理解为脱离人的主观方面，象自然规律那样自发地支配人类社会的进程，而应当理解为与物质生产的现实状况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平衡的破坏和新的平衡的建立，这种破坏与建立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支配集体行动的集体意志来实现的。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只有存在某种有效的和积极的前提，而人们对这种前提的意识已经在思想上起作用，给集体意志提供具体目标，并且构成一种以‘公众信念’的形式起强有力作用的信心和信仰的综合，才存在必然性。在这种前提里面，必定包括已经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把集体意志的冲力变成现实所必不可少的和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可以计量的‘物质的’前提与一定水平的文化分割开，就文化来说，这里指的是一种智力行为的综合以及（作为这些智力行为的产物和后果）一定的占优势的激情和情感的综合，占优势的意思是激情和情感具有促使人们‘以任何代价’行动下去的力量。”^③ 因此，“问题不在于‘发现’某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规律，甚至不在于证实因果关系的‘普遍的’规律。问题在于揭示，在历史的演变中怎样形成按一定的规律性和自动性起作用的各种相对稳定的力量。”^④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不存在纯粹“客观的”预见。“毫无疑问，预见只能意味着把现在和过去明确地看成运动。明确看待现在和过去，换句话说，就是准确判明过程的基本因素和持久因素。”^⑤ 葛兰西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强烈反对“经济主义”和“宿命论”，也可以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选用“实践哲学”这个代用词决非偶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狱中札记选》英文版第 412—413 页。

④ 同上书，第 412 页。

⑤ 同上书，第 170—171 页。

实践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⑥葛兰西领会和贯彻的就是立足于**实践的人类社会或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他指出，“人与物质（自然界——物质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产生统一”，“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⑦从这种实践观出发，他强调，“人是什么？”“这是哲学要求回答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他认为，“每个人的个性中反映的人类共性是由几个要素构成的：1. 单个的人；2. 他人；3. 自然界。”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社会上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有机体”的成员之间的“有机”关系（“有机”是葛兰西的常用词，含有相互作用的、协调一致的和变化发展的意思，且与人及其活动相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不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以劳动和技术为中介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关系。这些关系同人的认识相适应。人作为这些关系的中心改造自己，其程度相当于他对这些关系的改造。^⑧他因而强调，“‘人的本性’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这个答案最为圆满，因为它包含生成的概念（人‘生成着’，他不断地随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否定‘一般的人’”。^⑨但是“人也是他的生活条件的总和”。^⑩因此，完整的提法，“应当把人表述为由纯粹个人的和主观的种种因素，以及与个人保持积极关系的群众的和客观的或物质的种种因素构成的历史结合体”。^⑪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他极其敏锐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实质，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只是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⑦ 《狱中札记选》英文版第402—403页。

⑧ 参看上书，第351—352页。

⑨ 同上书，第355页。

⑩ 同上书，第359页。

⑪ 同上书，第360页。

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实践去理解，所以他说，“事实上，实践哲学研究一台机器，不是为了了解和确定其材料的原子结构或其自然成分的物理特性、化学特性、力学特性（那是精密科学和技术的事），而仅限于它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特定社会势力所属财产的一个物体，它表示一种依次符合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⑫ 他强调：“人们忘了，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说，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放在第一个词——“历史的”——而不是第二个词”。^⑬ 可见，他已经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而把唯物主义思想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贯彻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他提出的许多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他为意大利开拓的革命道路，都是基于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二，他特别注意世界的整体性，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看成统一的有机体，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在整体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保持动态的平衡，矛盾、对立、斗争都不是导致分离、分裂、隔绝，而是导致新的动态平衡。他的重要概念“历史的结合体”，（另有“历史的联盟”、“历史集团”、“历史联合体”、“历史的凝结块”等不同译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作为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相对稳定和暂时性。正因为这样，才有理由肯定上层建筑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冲突的反映。它们所反映的当然不是唯心主义的“精神”，也不是实证主义的“物质”，而是人的社会实践，是生产实践中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这个术语的含意是什么呢？它当然不是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动中对立面的统一性，也就是同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同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具体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面的统一性。”^⑭ 这样的整体观点，是他分析现实生活、制订战略

⑫ 同上书，第 456 页。

⑬ 同上书，第 465 页。

⑭ 同上书，第 372 页。

方针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他反对各种片面、极端的思想,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第三,他把“人是什么?”提到哲学问题的核心位置,并且把“人”作为在客观世界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从而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说过,“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⑮马克思把大部分研究的精力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规律,而且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说的,“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⑯葛兰西特别注意这个“形式方面”,并且做了大量理论分析,因为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对引导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通过分析,他对诸如群众集体意志形成的机制,社会的精神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上层建筑的组成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等等社会实践的主观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论点;他也因而更加强调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而不是它的逻辑发展,但决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种“历史相对主义”、“历史目的论”、“历史循环论”等等。

总之,在葛兰西看来,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辩证地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统一于具体的历史活动。他着重分析并作为理论思维指针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这种客观存在的表现形式;不是构成世界整体的局部矛盾和矛盾的斗争,而是世界整体的动态平衡和新的动态平衡的形成;不是物质世界对人类活动的决定作用,而是人类活动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作用,一句话,不是怎样解释世界,而是怎样改造世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结束了唯心主义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

^⑯ 同上书,第39卷第94页。

也结束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他在哲学思考方面不仅反对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着重批判布哈林在《通俗手册》中表现的庸俗唯物主义。

有些同志认为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含有唯心主义，有的甚至说他“不仅不赞成唯物主义，而且还批驳唯物主义，”指责他“把物质看成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从属因素。”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种看法显然是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误解，实质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

二、领导权思想

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思想，不仅涉及意大利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涉及与此相关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国家学说和过渡时期理论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个思想已经先后被一部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葛兰西特别重视恩格斯晚年解释唯物史观的几封著名信件，是因为恩格斯对经济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作的限制，正好从历史观的高度击中了第二国际后期流行的经济决定论的要害。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葛兰西结合这一思想，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他还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在经济发达的西欧反而停滞不前的经验。另一方面，他面临的的是一个法西斯独裁的意大利现实，墨索里尼政权

^① 同上书，第37卷第460页。

不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发达的标志,也不是它的必然产物,这个政权的产生,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参加武装干涉苏联和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主要还是意大利经济状况特别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他着重分析上层建筑的功能和群众革命意识的形成,并把领导权问题提到革命战略问题的首位。

按照葛兰西的分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典型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建立起许多私人的组织(“私人有机体”、“资本家团体”、“参谋总部”)。它们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道德观念和政治谋略等等影响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把一部分“社会集团”吸引到自己这一边,起了领导者的作用。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就已实行‘领导’(这的确是赢得政治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它行使政权以后才成为统治集团,但是即使它牢固掌握了政权,也还必须继续进行‘领导’”。^⑩这样,他就把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集团实行对社会的领导看成它赢得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肯定在旧政权的统治下,新的社会集团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限度以内取得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如此,他还把领导作用和统治作用加以区分,即使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也还必须进行领导,从而形成他对“国家”概念独特的理解。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比封建社会先进而开放,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进步改变了或者说扩展了国家的功能。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机体,在持续的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它达到类似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国家的整个功能因而改变了,它成了‘教育者’等等”。^⑪所谓“教育者”,主要是指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在葛兰西看来,这不是统治

^⑩ 《狱中札记选》英文版第 57—58 页。

^⑪ 同上书,第 260 页。

的功能,而是领导的功能。新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不能靠统治而要靠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和文化、道德等等的力量来推动,但是为了保证资本的权益和社会秩序,统治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的两个层次:“可以叫做‘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有机体’的总和的层次和‘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层次。这两个层次一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向社会实行的‘领导权’的功能,另一方面符合于‘直接的统治’或通过国家和‘法律上的’政府发布命令的功能。”^{②①}这两个层次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是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因为应当看到,国家的总体概念含有需要应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即受到强制的武装保护的领导权。)才能解释的成分。”^{②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括号中“受到强制的武装保护的领导权”这句话,它揭示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个层次或统治和领导这两种功能的关系。在强制的武装的保护下,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充分发展,但是随同“市民社会”的发展,国家的领导功能逐渐增强,统治功能相应减弱。葛兰西没有明确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否兼具统治和领导两种功能,但他确实提到“一种国家学说”,(很可能指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按照这种学说,“可以想象,由于出现日益突出的属于协调的社会(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种种要素,国家的强制要素逐渐消亡。”^{②③}

按照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一般认为阶级社会中的国家只体现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体现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国家对统治阶级实行民主,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导致简单化地对待夺取政权的问题,并且终于形成一种武装夺取政权的僵硬公式。另一方面,这种理解向社会主义社会的

^{②①} 同上书,第12页。

^{②②} 同上书,第263页。

^{②③} 同上书,第263页。

延伸,表现为理论上截然划分两种关系,不承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以及互相渗透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导致实践上的种种失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可以概述为:1.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实际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利益集团,尽管只有其中的一个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这就为分析它们的现实状况和相互关系,为分析领导权的概念,提供了方法论的客观依据。2.各种经济成分的代表或利益集团都要求无限扩大自身利益,通过同其它利益集团的结盟来争取社会生活首先是经济生活的领导权,但是只有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或利益集团最有可能赢得并保持领导权。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从而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生活情景,构成大小不一的历史事件。3.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水平上不可能依靠暴力的强制组织社会生产,而要依靠经济手段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手段等等,因此领导权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等方面;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主要表现为党派斗争和议会立法斗争。4.领导权受政权的保护,同时又是政权的支柱和依托,政治斗争始于领导权的斗争,首先体现为领导权的斗争。领导权和政权是两种权力系统,它们拥有各自的机构或组织,前者包括种种民间的社团(政党、工会、学校、各种协会、新闻媒介等),葛兰西常把它们称做“私人团体”、“私人机构”、“私人有机体”等等,教会有时也发挥领导权作用;后者指政府机构,就是国家机器。领导权的斗争可以发生在政权机构内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这个术语。由于通常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基础,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葛兰西根本颠倒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早期大量使用的这个术语,是沿袭了黑格尔的用法,批判黑格尔颠倒了法的关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黑格尔的头脑里根本没有“经济基础”这个概念,就更不用说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了。马克思即使在这篇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序言中也没有把“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而只是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里,则更加明确地把这个术语用来指“自由竞争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加了引号。^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⑤这里同样清楚地表明,市民社会指的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力和交换关系,而且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葛兰西借用了这个术语,但是第一,可以说,他把市民社会定义为“通常叫做‘私人的’有机体的总和,”^⑥所以是不同经济利益或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的总和,它们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或“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层次,也可以理解为“中介”、“过渡”、“环节”或诸如此类的什么。第二,市民社会不具备强制的、“法律的”力量,只具备领导的、“协议的”力量,起领导的作用,属于“领导权”的范畴;而领导权和政权一样,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便具有明显的上层建筑性质。第三,民间组织或“私人有机体”是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的,构成社会的一个层面。“市民社会”这个术语和“政治社会”一样,反映这个社会层面的实践性、现实性、综合性和历史性;它与政治社会可以发生种种交叉、重叠、渗透的关系。根据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现实而具体地反映了上层建筑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④ 同上书,第12卷第733页。

^⑤ 同上书,第21卷第345—346页。

^⑥ 《狱中札记选》英文版第12页。

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因而有助于分析和描述社会的动态平衡和深层结构,有助于克服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所造成的种种弊病。

基于上述思想,葛兰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略方针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透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结构立即显露出来。国家只是前沿堑壕,它的后面屹立着强有力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②⑦} 西方国家的战略方针应当是首先赢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形成一种新的“民族—民众的集体意志”。

三、集体意志的形成

葛兰西所谈的“集体意志”既不同于个人意志也不同于阶级意志,而是一种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反映社会运动的朝向的“民族—民众的集体意志。”这样的集体意志必定是肯定的和建设的意志,与此相应的否定的和破坏的意志只能以前者为前提并蕴含着这一前提;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分不开的,同时又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按照葛兰西的典型提法,现代意义上的集体意志,“就是切实有效地意识到历史的必然性的意志,就是真实而实在的历史剧的主角的意志。”^{②⑧} 因此,它与通常理解的革命意志不尽相同,它的具体内容是对历史必然性切实有效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历史的主角在富于“戏剧性”的历史活动中形成并体现为历史活动本身。它与卢卡奇早期谈论的“阶级意识”有根本区别,卢卡奇谈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全不涉及无产阶级以外的群众,葛兰西把无产阶级以外的大部分群众也包括进去了;卢

^{②⑦} 同上书,第 238 页。

^{②⑧} 同上书,第 130 页。

卡奇所谓的“阶级意识”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自我意识，带有很大的抽象性，葛兰西谈的“集体意志”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是领导权在“市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卢卡奇的辩证法排除了自然界，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近似黑格尔的“逻辑发展”，葛兰西的“集体意志”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文化思想活动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起来的。二者不可混淆。

按照葛兰西的分析，形成集体意志的复杂性和困难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权属于“市民社会”范畴，主要通过群众的“同意”和“合作”来实现，当然只有同意才能真正合作。他指出，“市民社会在没有‘制裁’或强迫性‘义务’的情况下运转，但还是以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道德等的逐渐变化的形式施加集体的压力，并获得客观效果。”^②这里所谓的“集体的压力”就是大家都这样想和这样做，谁不这样做就有别人代替他做；所谓的“客观效果”就是在行动上承认或“同意”现实生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形成和发展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大家之所以会“同意”，又是同他们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例如可以用提高工作报酬、改善物质生产条件、发展社会福利等经济手段来取得某种程度的“自愿合作”。因此，这种同意，这种以习惯等形式施加的集体的压力，具有相对牢固的物质基础，具有复杂的结构，并造成思想上的惰性。其次，葛兰西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制订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作出什么许诺，它只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原理，“历史的方法论”。他说，“实践哲学由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奠基人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其它问题特别是经济学（对此做了系统的论述），才以格言和行动准则的形式产生；但是在这些格言和行动准则中含有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一种哲学”。^③十分明显，如果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大多数人都能自觉掌握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形成集体意志，就是一种空想。第三

^② 同上书，第212页。

^③ 同上书，第426页。

一个方面，葛兰西认为，“群众的思想意识因素总是落后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因而在某些时刻，经济因素引起的冲力，由于传统的思想意识成分的作用而缓和下来，中止了，甚至顿时瓦解了”。^①也可以说，在群众的头脑中，感性的直观往往多于理性的认识，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往往超过对政治利益的关心，而且传统的旧观念还会经常支配他们的行动。因此，“无论如何，力量平衡的破坏，并非作为直接的机械的原因，即热衷于破坏这种平衡并且确实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社会集团贫困化的结果出现的。力量平衡的破坏是在高于经济领域的层面上冲突的前前后后中发生的；这种冲突涉及阶级的‘声威’（未来的经济利益）和渴望独立、自主和权力的炽热感情。”^② 第四个方面，集体意志的形成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葛兰西认为，“意志”和“热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他有时在使用上并未加以严格区分。热情与直接的经济利益有更多的联系，通常具有个人和暂时的性质，“持续的热情会造成机能亢奋和机体痉挛，这种状态意味着不能行动”；^③ 意志是理智的表现，集体意志通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与政治意识和政治愿望密切相关。但是政治和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可以分别谈论经济和政治，同时可以象谈论对行动的直接刺激那样来谈论‘政治热情’，这种直接刺激是在经济生活‘持续的和有机的’领域中产生的，但又超越这个领域，使激情和渴望甚至把单个的人的生活所服从的法则和个人利益的法则二者的区别也算进去，而在炽热的气氛中起作用。”^④ 因此他把集体意志的形成视为“从纯粹经济的（或利己主义的——热情的）要素到伦理——政治的要素的进展，也就是对基础的超然推敲深入到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上层建筑的进展。”他借用希腊语“净化”（“克撒色思”）来描述

^① 同上书，第 168 页。

^② 同上书，第 184 页。

^③ 同上书，第 138 页。

^④ 同上书，第 140 页。

这个进展,而且强调,“因此,在我看来,形成‘净化的’要素成了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而净化的进展是和辩证的演变所造成的综合链条相符合的”。^⑤所谓“净化的”要素,就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热情的伦理—政治的要素,它们的形成有个辩证发展的复杂过程。

由于上述原因,葛兰西认为集体意志是在社会的文化改革中实现的;但决不是西方某些学者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革命”或“上层建筑革命”。按照葛兰西的哲学思想,这种文化革命必然离不开经济改革,他指出,“理智改革和道德改革不得不紧密结合经济改革的纲领——实际上,经济改革的纲领恰好是每一项理智改革和道德改革用以展示自己的具体形式。”这种改革贯穿于千百万群众的日常生活,体现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因此,他强调,“1.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还不存在,或者最低限度还没有出现和发展,都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2. 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各种内部关系所蕴含的全部生活形式没有首先得到发展之前,都不会瓦解,并且不可能被取代。”^⑥这里,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提法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提法的差别。马克思说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强调“生产力”和“物质条件”;葛兰西说的是社会整体的内部矛盾,把上层建筑作为“历史的结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包括进去了,强调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全部生活形式”。这种差别,正好可以说明葛兰西贯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把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意大利革命的实践;实际斗争要求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分析生活形式的变化,分析领导权的现实状况。认清这种差别,实际上有助于理解文化改革的实质。

葛兰西所说的“文化”,包括兴趣、爱好、知识水平、价值观念、道德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等极为广泛的内容,通常表现为“习惯”、“常识”或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葛兰西认为,“常识”

^⑤ 同上书,第366—367页。

^⑥ 同上书,第177页。

包含一定的世界观,可以设想一个昆虫学专家,一个三角学专家,而不需要人人都懂昆虫学,都从事三角学,“但是无法设想同时不是哲学家的人,不思考的人,其所以无法设想,正因为思维能力是人本身所固有的,除非他是个病理学上的白痴。”^⑳他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声称“人人都是哲学家”。他说,马克思主义“把思想历史地看成一种世界观,流行于多数人中间的‘常识’(如果这种‘常识’不是合理的和历史的,这种流行恰恰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流行到已经变成积极的行为准则”。^㉑但是世界观不等于哲学,“哲学是理智的规则,宗教和常识都不可能是这种规则”。“宗教和常识不能构成理智的规则,因为它们即使在个人意识中也不能转换成统一性和一贯性,在集体意识中就更谈不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不能这样‘自由地’转换——因为可以运用‘强权主义’的种种手段达到统一性和一贯性,而过去也的确在各种有限范围以内这样做过”。^㉒因此,他把哲学区分为哲学家的哲学和内含于常识或宗教中的哲学,前者是构成哲学史的哲学理论,也可以说是用哲学语言系统论述的世界观;后者体现为常识(或宗教),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未经提炼的、不自觉的、缺少理智上的统一性和一贯性的世界观。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流行到成为常识,成为行为准则的世界观,正是领导集团的世界观,正是领导权在世界观上的体现。哲学家可以用不同的哲学观点和语言来表达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只有符合或者至少不触犯领导集团根本利益的世界观才取得合法性,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主导哲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以存在不同的哲学,还可以出现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个人身上或社会集团中表现为思想和行为或理智和常识之间的矛盾,葛兰西指出,“在这些情况下,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不能不是社会历史制度比较深刻的矛盾表现。这表明一个未成熟的社会集

^⑳ 同上书,第 347 页。

^㉑ 同上书,第 325—326 页。

^㉒ 同上书,第 325—326 页。

团可能实际上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即使仅仅是萌芽,这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世界观,只不过是不时而昙花一现般地表现出来——在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活动的情况下。”^⑩ 文化改革就是改变行动中的世界观,从而也是改变常识,改变行动的准则,改变行动本身,使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在社会实践的变革中逐渐成熟起来,形成和发展新的集体意志,形成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党“应当是而且不能不是理智和道德的改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这就意味着为民族—民众的意志向现代文明的更高的总体形式继续发展创造广阔的领域”。^⑪ 这就清楚地表明,葛兰西关于集体意志的论述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存在差别,葛兰西强调的是行动中的世界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现实意义

葛兰西思想涉及面很广,他的关于农民问题、意大利南方问题,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关于意大利历史,关于宗教、法律、文学、语言学,关于知识分子,尤其关于党的建设等的论述也都有独特、深刻而富于建设性的见解,它们有的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评价。当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和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变化,他的思想也必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有的甚至留下历史的印记。但是仅就上文所谈的思想和涉及的理论观点来说,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他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领会、贯彻和发挥。世界的当代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事物、现实、社会进步的主观方面的重要性。科学不仅已经直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已经改变了组织生产的方式,改变了社会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阶

^⑩ 同上书,第 327 页。

^⑪ 同上。

级结构乃至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这些变化,如果不充分估计它们的主观方面,便是难以理解的,而且也难以认识和驾驭,把社会和世界更加有力地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做的庸俗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理解,世界上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经验主义的思想倾向,葛兰西的哲学论述有助于启发人们认识和克服这些倾向。

其次,葛兰西把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具体性、整体性和动态平衡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这就是被称为葛兰西的“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质。他创造的特殊术语“历史的结合体”突出表明了这种观点和分析方法,使用“集团”这个术语也不是忽视或不承认“阶级”,“集团”、“结合体”、“复合体”、“有机体”、“综合”、“总和”、“总体”、“整体”是他进行理论思维大量使用的常用词。现代生活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社会、阶级、政党、事物、现象等等都不是截然划分的,清一色的,它们互相“流动”,构成某一总体或某个局部的动态平衡;即使自然科学也在大量互相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日趋紧密。这种“历史主义”为综合地分析现实生活的动态平衡,创造新的动态平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揭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深层结构,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清楚表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全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组织生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巩固经济制度来巩固政治制度;国家领导经济生活的职能越来越重要,甚至掩盖了政治统治的职能,“同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强制,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不是行不通,而是客观上不存在。

第四、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的“集体意志”思想。葛兰西坚决反对经济主义,但是他的理论基点仍然在于经济改革。集体意志不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斗出来的,更不是理论宣传“教育”出来的,而是通过经济改革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赋予经济改革明确的政治

方向,或者说经济改革体现社会发展的朝向,因而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行动中的世界观,改变“常识”,改变行动的准则;经济改革也是文化改革,只不过文化改革把它扩大到经济范围以外,扩大到整个“市民社会”,乃至深入到政权机构的内部。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新的物质前提,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精神——文化条件;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需求增长了,个人生活个性化的要求与社会生活单一化的矛盾日趋尖锐,吸毒、凶杀、性关系混乱、少年犯罪率上升和各种变态心理(精神病学家甚至断言大多数正常人都患有精神病)标志着价值观念动摇和精神危机的普遍化,这就突出了文化改革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第五、葛兰西的上述思想实际上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民主观念。事物的主观方面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实践性,“历史主义”为这种实践性的具体表现做了理论概括,“领导权”体现“集体意志”,“集体意志”是在“文化改革”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民主观念反映了现代民主的实质、民主斗争的要求和民主发展的道路。

葛兰西的基本思想已经在一部分西方国家的革命实践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并且得到新的发展。

阿尔贝斯论鲍威尔和葛兰西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

殷叙彝编译

联邦德国不来梅大学政治学教授德·阿尔贝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写了不少关于奥·鲍威尔和安·葛兰西的论文和著作，试图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一种“革命社会主义战略”和“欧洲左翼”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现根据他的《试论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1983年西柏林德文版）和《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载于《奥托·鲍威尔的理论和实践》论文集，1985年维也纳德文版）介绍他对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的比较研究如下。

阿尔贝斯认为，鲍威尔和葛兰西进行政治斗争和理论写作的决定性时期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鲍威尔虽然写了一些专著（如《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但他的理论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日常政治斗争的评论，各种会议上的演说和报刊文章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他起草的1926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纲领中。葛兰西发表那些使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思想的媒介则是自我反思，即著名的《狱中札记》。他们二人在国际工人运动阵营中所属派别不同，二人所受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一方面是20世纪以来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创立时期的意大利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文化。两人的政治经历和日常生活方式也不同。尽管如此，两人的思想中的卓有成效的内容却是共同的，可以互相比较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工作的相同的“内在轴心”，也就是说，他

们比同一代的所有其他人物都更加自觉地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的特殊条件、要求和机制当作思考的中心点。他们从理论上解答了“西方革命”的一些核心问题，尽管还不十分明确。这些问题包括：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理论，对国家的分析，“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战略，领导权观点，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对“东方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反复发现他们对本国革命斗争前景的反思，并且可以从这里出发来确定他们二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再进一步，就必须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才能找到解释他们的理论见解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的线索。

在鲍威尔和葛兰西生活的那一时代，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在欧洲大陆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葛兰西认为这一学说已经“在一个有限的地域”成了支配社会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①他们二人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科学到行动”的过渡（葛兰西语）。鲍威尔在纪念马克思逝世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形象地概述了这一过程：“1917年以来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恐怕比在那以前的70年间还多。马克思的名字直截了当地成为革命的象征，马克思的话成为革命的口号，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文化圈的范围。在土耳其斯坦和阿塞尔拜疆，马克思的纪念碑树立在清真寺的对面；伊朗的毛拉为号召人们进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圣战而念诵可兰经文时夹杂了马克思的引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无与伦比的扩展。马克思毕生反对资本主义，但只是在他死后40年，资本主义才真正感到他是可怕的。”^②

但是在1923年即鲍威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以后的15年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巨大突进却面临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样令人震惊的倒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欧和西欧的革命努

^① 克·里谢尔斯基编译：《实践的哲学》1967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81页以下。

^② 《鲍威尔全集》1976—1980年维也纳德文版第9卷第49页。

力迅速失败,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无能为力,从而暴露了左派的弱点。鲍威尔和葛兰西都不可能不把这些弱点也当成对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程度的现实批评来加以研究。而且二人都不得不认为,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分别归属互相对立的国际这一现象,特别是国际的分裂,是同马克思主义本身(至少是人们对它的解释方式)的某种危机现象的扩展相联系的。对共产党人葛兰西来说,旧的国际包括“它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是使他加入新的国际的决定性条件,只是到很晚以后他才承认,他在新的阵营里仍旧面对持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社会民主党人鲍威尔从1917年以来就一方面同第三国际通行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三国际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唯一代表的态度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另一方面对社会民主党阵营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忽视任何有条理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倾向也不满意。正是这些情况促使他们二人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并且力图澄清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考察。

鲍威尔分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财富的各个阶段。他一方面强调,为了“把马克思思想的金条铸成通用的金币”并从而使它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必须依靠“通俗化”的工作。除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外,他还提到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不可避免地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歪曲的危险,因为“任何一种科学在为了照顾外行而被通俗化时都不可能不因此丧失它的一些最优秀的部分。”因此在工人群众和公众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一些公式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这就为工人运动内部和外部对马克思的批评提供了廉价的靶子。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是一种对抗运动,它无非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它严肃地进入广大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民阶层中间时必

然要经受的萎缩所造成的同样必然的结果^③”。与此相反,真正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把自己归入这一类)应当针对内部的简单化和外部的批评者而完整无缺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将它继续发展,使之与新的要求相适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首先是它发现社会规律的方法。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也一再为这一矛盾现象感到不安:马克思主义尽管表现出具有巨大地动员群众的力量,却又倾向于“成为一种最坏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一种绝对的和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体系”。^④他在关于《实践的哲学和现代文化》的一节中写道:“实践的哲学(葛兰西根据安·拉布里奥拉的提法,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哲学”——编译者)有两个任务:同现代意识形态的精巧形式作斗争,培养出自己的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教育还处于中世纪文化阶段的人民大众。考虑到新的哲学的性质,这第二项任务是基本的,它占用了所有的力量,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说都是如此。出于‘教育的’原因,新的文化同一种文化形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形式比民众文化的(最低的)平均水平略高,但它绝不足以同有教养的人的意识形态作斗争。”^⑤他接着又说,这样的“文化格局”可能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对群众发生影响的改革运动中也可以见到,例如宗教改革长期以来就是以某种形式的对科学和文化的敌视为代价而获得其大众性的。但是葛兰西并不因此丝毫削弱他对一切形式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缺陷的批评。恰恰相反,与这种倒退的发展作斗争,发现和克服它们在上层建筑的一切部门中造成的消极后果,这是促使葛兰西批评布哈林,同克罗齐争论以及写作《狱中札记》的最重要的“火车头”之一。

鲍威尔认为,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误解,即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经过运用而得到的个别成果等同起来,而不是去掌

^③ 同上书,第7卷第928—930页。

^④ 见《实践的哲学》第199页。

^⑤ 同上刊,第187页。

握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方面的思考的核心，并由此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以后的现代的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在工人运动内部，由于这种误解而产生了两种广泛传播的思想方式：其一是，把一些原理脱离背景而机械地运用于其他历史的和社会的情况；其二是，对于探讨由现实提出的或者甚至由阶级敌人提出的新问题表示不信任。1923年鲍威尔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的一些原理脱离了它们的历史的和制度的背景就成了僵死的公式，成了刻板的口号，而有人却要在与马克思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在与马克思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用这些原理来解决党与党之间的斗争……关于马克思引文的含义的争论成了20世纪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意识形态外衣，正象关于圣经引文的含义的争论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阶级斗争以及党派斗争的意识形态外衣一样”。^⑥ 尽管如此，鲍威尔并不是要否定某些由马克思首次掌握的历史规律性的现实意义和持久效用。他在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曾一再援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书的有关内容。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似乎根深蒂固的倾向，凭空设想普遍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却不是在了了解这些观点产生时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把它们运用于经过自己独立研究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新形势。

葛兰西则认为，不应当把一种一开始就被宣称为普遍适用的观点套用于新的情况，而是应当对两种在性质上同等重要的情况进行比较的考察。在考察时，从一种情况获得的经验成为推动人们更好地理解另一种情况的“环境”的“刺激”，这时这种考察才导致人们确定这一扩延性见解的普遍适用性。某些理论见解的正确性是通过历史过程的整体、它的矛盾和它的“无终结性”得到证实的，而不是象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在事先就已确定的。^⑦

他们两人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

^⑥ 《鲍威尔全集》第9卷第49页。

^⑦ 参看《实践的哲学》第63页。

态的态度。1937年鲍威尔在悼念麦·阿德勒的文章中说，阿德勒和列宁不同，尤其和同时代的苏联哲学界不同，他不满足于准确无误地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学院哲学对它的批评和冲淡，而是认真对待马克思以后的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认识进步，用这些认识进步本身提供的武器去回击往往与它们混合在一起的对马克思的批评，从而在哲学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鲍威尔说：“列宁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代资产阶级学院哲学；他不仅驳斥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而且不屑于从中接受在马克思去世后使科学的哲学得到发展的那些问题和思想方法，把它们挽救进马克思的思想建筑中来。……与此相反，阿德勒接受了当代的康德主义学院哲学，没有把它颠倒过来，这是他的弱点。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运用了当代的认识批判论（这是他的长处），把这种哲学中包含的新的问题和思想方法挽救进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对马克思行为方式的批判性检验的辩护”。^⑤毫无疑问，鲍威尔的这一评价也包含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鲍威尔认为，如果人们把自己的阵地同资产阶级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隔绝开来，根本否认它具有任何发展的能力，那就错了。必须象马克思恩格斯模范地对待黑格尔哲学所作的那样，一再重新进行把资产阶级科学中出现的新的见解“颠倒过来”的工作，同时尤其不能忽视把这些见解中的创造性因素“挽救进”本身并未终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来。在这样做时，当然可能犯轻率地牺牲自己的特性而接受外来思想财富的错误。鲍威尔就曾明确地批评阿德勒身上从未割断的“康德主义脐带”。他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可能有必要集中一切力量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它不致被各种类型的理论冲淡。但是他显然只把这看作权宜之计，而且这种做法还经常有倒退到形成教条主义学说的危险。

^⑤ 《鲍威尔全集》第9卷第75页以下。

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不但存在庸俗化现象,而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本来与它不相容的世界观相融合。以经济主义为例,他和鲍威尔一样,认为这是工人运动队伍中庸俗马克思主义最流行的形式。经济主义遵循一些错误的结论,而那种被错误地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一切上层建筑直接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偏见,在知识分子高层集团中已丧失影响,但是还能在人民大众以及那些不愿意艰苦地动脑筋的中层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正象恩格斯所说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以很小的代价并且不费多大气力就把全部历史、全部政治和哲学知识压缩成某一个短短的公式装在口袋里,是十分惬意的”。^⑨要克服经济主义偏见,主要不能靠说明马克思主义真面目的启蒙工作,而是首先要反对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经济主义。特别是要反对所谓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错误看法:“他们把实践的哲学在原则上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就自以为是正统派。”^⑩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是要创立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它的前提、动力和目标)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科学哲学理论。正统派却有意无意地使它丧失这一核心本质,从而使它变形,解除了它的武装。第二国际时期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听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因素萎缩,只把这一因素看成一种已由它的创立者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哲学史上的事实,或者只能从实证主义角度把它当作一种分析历史的方法论工具来理解。甚至阿德勒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同随便哪一种世界观相结合,这正是上述情况的最极端的后果。^⑪

但是即使在俄国,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事实上已上升为基本哲学的地方,从普列汉诺夫直到布哈林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把历史的、在任何时候都属于人的主观的因素纳入唯物主义,并认为这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核心,因此他们也

⑨ 《实践的哲学》第 315 页以下。

⑩ 同上书,第 184 页。

⑪ 参看麦·阿德勒:《马克思主义问题》1974 年柏林和波恩德文新版第 62 页。

同样是大幅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关于《术语和内容的问题》一节中写道：“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从来没有把他的观点称为‘唯物主义的’，他在说到法国唯物主义时对它作了批判，并且坚持认为，必须使这种批判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因此他从来不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用语，而是用‘理性的’来同‘神秘主义的’相对立，从而赋予‘理性的’这一术语以非常精确的意义。”^⑫ 葛兰西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在这一“建筑”中，再也没有一块石头可以不经检查而继续使用了”。^⑬

总之，鲍威尔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决定性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的必要性、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指引方向的任务的认识。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效用由于它的信徒的严重误解而受到危害，并且由于它的敌人的被人信以为真的反驳而遭到损失。这两个因素都要求人们不仅限于揭示它的变形，而且还尽可能地指出避免变形的途径。

鲍威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宗旨在于强调两个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实践的指南而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一是它对于工人运动在思想上以及最终也在政治上统一所起的作用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鲍威尔的政治思想的关键性概念（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也自称如此），它同时标志了鲍威尔和葛兰西二人的观点的相同之处以及它们同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鲍威尔在纪念马克思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对他的这一立场作了规范性的论述，它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葛兰西进行反思的方向：

“要克服这一危机（指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编者）只有一条道路：用马克思的思维手段和研究方法武装我们，并且要以大量的新经验为依据。我们不能依靠固守马克思的词句，而只能通过

^⑫ 《实践的哲学》第237页以下。

^⑬ 参看上书，第212、218、227、241页。

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来理解新的世界,使新的时代意识到它自己,才能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如果我们——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少方面使这一工作远远超出了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补充或纠正了马克思的不少设想,那么这恰恰才表现出马克思的精神的创造能力:是马克思的方法导致人们超越马克思的命题而向前发展,是马克思克服了马克思”。^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部分、哲学部分,或者用鲍威尔的话来说,它的方法论部分,对于鲍威尔来说,完全象对于例如考茨基一样,是既定的;只要依据马克思的开创性见解(象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模范地加以概括的那样)就足够了;或者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和它的狭义的哲学史立场来说,只要继续完成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克服就足够了。鲍威尔在原则上是坚持这种两分法的:方法已经完成,只不过结果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改变。鲍威尔不是仅仅原封不动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早在1914年以前,在一次同考茨基的争论中,鲍威尔把他所见到的那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作了一次概述。他分析了在各个时期的各个人的主观行动及其动机和意图与“客观的”社会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不取决于各个人的意志而得到贯彻的,而这些规律性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过渡或“中间环节”。鲍威尔在这里对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学”作了概述,当然他只能为揭开其中的仅仅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中间环节”即“民族”的秘密作出贡献,但是这一揭示的解释价值又一次表明,它同葛兰西关于历史中的“人类学——政治的因素”的思考和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集团”的考虑的相同之处远不止是表面上的。鲍威尔寻找一条建设性的、向前的、指向继续发展的出路,来对付各科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和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

在20世纪20年代,从《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开始到“林茨纲领”和伴随它出现的著作,鲍威尔制定了适合他本

^① 《鲍威尔全集》第9卷第50页以下。

国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的轮廓。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党内来自左面的和右面的批评者，尤其是反对共产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主张，论证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是在奥地利以及西方的条件下，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为出发点，适应这一设想并与之融为一体的，并未放弃这一设想的源泉或者冲淡它，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它。1936年，鲍威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新的、符合当代现实的任务，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理论前景。

改良主义的、陷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捍卫日常利益的工人运动与抱有抽象的革命思想或乌托邦式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之间是存在对立的。鲍威尔从这一对立及其变化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为民主的斗争的遗产、民主社会主义的遗产转交给革命社会主义。这些遗产是：高度重视个人权利保障的不可代替的文化价值，精神自由，集体自决，人道；还有关于这一文化责任感的遗产即意识到应当维持、恢复或挽救这些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受到威胁或已被破坏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遗产转交给改良主义。这些遗产是：认识到不能依靠对资本主义社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只有通过彻底改造这一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从它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失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⑯当然，这样只不过是笼统的形式描绘了这两种最重要的进行论证和说服的派别（在阴暗的30年代，正如同今天一样，一种得到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都是这两个派别）。鲍威尔从他的“整体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得出的组织政策上的结论也同样是暂时的和可以商榷的。尽管如此，鲍威尔在一生最后所作的把二者联系起来下定义的尝试证明，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应当在本地的工人运动中接受它们的决定性考验的地方，这一

^⑮ 同上书，第4卷第306页。

^⑯ 同上。

尝试的现实意义仍旧存在。

正如我们认为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鲍威尔的理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样,对于葛兰西来说,也可以把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主体因素之思考和恰当评价看作他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反对它的变形而作的努力的一个关键点。葛兰西所说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集中于探讨主体因素,这就必然与鲍威尔不同,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葛兰西从拉布里奥拉对理论冲动的再发现和理解中得到了决定性的帮助。葛兰西认为,拉布里奥拉主张“实践的哲学是不依赖任何其他哲学思潮而自我满足的”,“实际上他是唯一试图科学地建立实践的哲学的人”。^{①⑦}葛兰西的如下基本思想是来自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独立的、或从其他一切世界观解放出来的哲学,但是这一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达到完成的、终结的形态(鲍威尔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和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或者用拉布里奥拉自己的话来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资本论》第一卷和《反杜林论》中以外,从来没有按照“写书艺术的规律”以完善的形态表述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始终是专题著作或即兴著作,它们是一个处在不断的形成过程中的科学和政策的片断,是必须而且能够由别人来继续进行的,但我这样说时并不认为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从事这项任务”。^{①⑧}

葛兰西发现,在他以前,拉布里奥拉已经比第二国际任何其他理论家都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贡献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开放性和过程性这一思想,但是那时还缺少历史实践本身提供的材料来促使葛兰西进一步接近这一问题。他在十月革命中,在思考十月革命对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认识批判和哲学的领域)造成的后果时获得了材料。由于无产阶级第

^{①⑦} 《实践的哲学》第 182 页。

^{①⑧} 《论历史唯物主义》1974 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 283 页。

一次“在一块有限的土地上”成为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从而“从科学转化为行动”，因此这时这一科学的行动方面或者说正是它的主体因素也必须经受得起崭新的考验。葛兰西起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理论应用于他本国的斗争条件。他在实践方面受惠于列宁的著作，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也要归功于列宁。但至迟在20年代，由于一切平庸的照搬十月革命经验的尝试失败了，人们发现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实践与他们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并发展出与这种思想完全不同的适合自己国家的斗争的理论，葛兰西也对布哈林的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唯物主义的那种导致灾难的结合进行了谴责，但是他认为列宁是“现代最伟大的实践哲学理论家，始终回避了列宁思想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结合的问题。这是《狱中札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局限性。

正如鲍威尔在他所说的“新的社会形态学”中试图最科学地探讨从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升”到个人的行动、感觉和意图之间的“中间环节”一样，葛兰西用“净化”这一术语来描绘从纯粹经济的动因向伦理—政治的动因的过渡。他说：“这就是说，使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而这一过程将在人的意识中完成。这也意味着‘从客观到主观’和‘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基础是从一种使人受到压抑、使人被它同化、使人处于被动状态的外在力量转变成自由的一种媒介，一种创造新的伦理—政治形式的工具，新的首创精神的源泉。在我看来，‘净化’动因的固定化将成为整个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净化过程同由辩证的发展产生的综合的系列过程是相吻合的”。^①但是这里仍旧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鲍威尔从外部接近个人的行动，从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总和与组合（个人的个性是由这种总和与组合构成的）来解释个人的行动。葛兰西却相反，他敢于从内部去思考个人的行动，却不致陷入主观主义。“净化”，即通过克服纯粹经济的、自发的、或“从感情出发的”关心而达到对社会相互关系的“伦理—政治的”明确意识，从被动地接受外

^① 《实践的哲学》第164页。

在力量和“客观”社会规律的同化到采取主动，掌握并投身于首创精神，而这归根到底是能够使基础的最僵化的因素即生产关系革命化的。葛兰西力求从主体的自身规律性来把握主体的向度，但始终是同实践的哲学联系起来，或者是同形成一个善于全盘吸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潜力的“新的历史集团”联系起来这样做的。葛兰西一旦掌握了“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就能开始着手解决一大批争论问题和矛盾，这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决定论的解释都没有能力做到的。

阿尔贝斯教授在最后总结说：当然，葛兰西所勾划的关于一种得到更新的、充分展开自己的主体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图象始终是一个轮廓，仅限于自我反思的层次。它是促进实践的，但是还没有经受超出批判性检验以外的考验。这一说法也适用于葛兰西在相同的思想基础上论述的大量关于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与党的问题，也即关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试图把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放在一起思考，利用它们的长处，把它们的弱点转化为激励进一步努力的动力。我们按照与鲍威尔原来的设想不同的意义走上通往一种“整体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们无需为已经如此频繁地被人宣布死亡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能力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 著作方面的比较(二)

[美]劳·克拉德

社会通过各种阶段和亚阶段的演进(二)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领域的著作进行比较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人类社会向文明时代或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过渡中的发展阶段。摩尔根谈到了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随后在民族的瓦解中形成军事民主制，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紧紧追随摩尔根。这里涉及到荷马时代希腊的军事指挥官 basileus (巴塞勒斯，有时译作“王”)。摩尔根援引易洛魁、阿兹忒克和希腊的领导人作例子，认为在野蛮时期有民政首领和军事首领之分。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在他的分析中一方面有军事指挥官，另一方面除了军事的、司法的和僧侣的权力以外有管理权。摩尔根把这种统治形式看作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的一个特殊的亚阶段，恩格斯在这一点上追随他。

马克思认为荷马时代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是这样的。每一个氏族都起源于某一个神，部落酋长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和牧牛人菲洛修斯也都是出身于神，在《奥德赛》中，也就是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候是这样。在《奥德赛》中把“英雄”的称号也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等等。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拉诺斯”这一词和“巴塞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的巴塞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酋长会议和人

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一种军事民主制而已。”^①

这种提法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不一樣。摩尔根和恩格斯把“军事民主制”作为一种正式的范畴。然而马克思把军事民主制当作一种比喻,而不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明确的亚时期或阶段。军事领袖、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加在一起,构成一种类似军事民主制的东西。这种比较松散的表述,意味着马克思对他所看到的那种形式的分期法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表示怀疑。

四、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民族学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六条提纲中,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社会关系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鲁宾逊·克鲁梭形象中包含的孤立个人的对立面。马克思不断反对鲁宾逊形象,反对类似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孤立的个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的虚构,而且也是社会契约论的前提。社会契约论提出,个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和平、不再担惊受怕、改进物质生活和更加长寿——而彼此间订立契约,组成一个社会。在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直至斯宾塞的理论中,个人存在于社会之先,个人的存在是社会成立的先决条件。马克思的思想是,人只存在于社会中,社会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条件,正象人是社会的条件一样(没有个人就不存在社会)。马克思用“人的本质”这个说法来表示这一点。他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在它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上,它是人类关系的总和,一种抽象的内在本质的对立面。从这当中能够做的文章太多了,因为马克思避开了人的东西的本体论。他只说到人存在于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1—5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会中为止,至于人只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个人身上的社会的东西是他作为人的存在的要素,他留给别人去论证。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人身上存在着社会的东
西的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等。人是而且只可能是社会中的存在物,19世纪早期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把这作为口号来反对当时在欧洲当
权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后来恩格斯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地说
明了他们的学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并不是严格分开
的,恩格斯断言,马克思和他当时决定用这个或那个词,是由于实
际的原因而不是理论的原因,即为了与罗·欧文、沙·傅立叶等的
追随者区分开来。^③然而,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者,没有把社会主
义者这个词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

斐·滕尼斯虽然不接近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然而他在自己的
书中有六、七处提到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以表示他的敬意。滕尼
斯的《公社和社会》表达对政治运动中的个人主义的极度反对,因
为他和他的老师亨·梅恩一样,是从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前提出发
的。不过,梅恩从断定人是社会存在物开始,然后从作为身分的生
活形式进到契约形式。滕尼斯的“公社”是在身分形式中产生的,
在这种形式中,个人是社会的实体,而在梅恩那里,家庭是这种实
体。滕尼斯从个人主义者的学说中借用了意志的概念,断言在“公
社”中有意志。滕尼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放在一
起,但是不是以说明“公社”和“共产主义”(Gemeinschaft和Com-
munism),“社会”和“社会主义”(Gesellschaft和Socialism)有
共同辞源基础的方式。而马克思通常是把“公社”(Gemeind, Ge-
meinwesen)与“社会”(Gesellschaft)截然分开的;他也把亚里士
多德关于人的定义从“社会动物”改成“国家公民”。在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对公社(Gemeinwesen)赋予

^③ 参看上书,第244页。

很大的注意。对摩尔根、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为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思想补充了很多材料。

1. 原始公社和农民公社

马克思对农民公社、原始社会的集体公社制度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有关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对亚细亚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公社，农民公社内部又包含有许多集体制度。马克思认为这种制度属于共产主义的低级形式，研究这种低级形式，可以发现未来的高级形式的某种东西，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中，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和在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中，就是这样说的。摩尔根的观点是，人追求财产的生涯对人的精神有歪曲的作用，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开始了对古代氏族、东方公社和欧洲农民制度的研究。此外，由于这些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它们表明人类发展除了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以外还有另一个方向。这是对人的现在和未来问题的多元态度，一种反决定论的态度。

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古代的公社形式，而且补充了农民公社的资料，他的最重要的来源是G·L·毛勒，他从毛勒的著作中采用了大量关于日耳曼古代的材料。此外，他还研究了许多关于斯拉夫农民制度和东方公社的著作，其中包括梅恩和菲尔的著作。我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的前言中已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对农民公社的研究情况，这里只谈几个附带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社和集体性之间的差别。这种公社可能是农村的或城市的；的确，在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民族、社会、文明中，城市制度都受到农村制度的强烈影响。例如，我曾描写过19世纪俄国的起源于农民的生产集体（劳动组合）。在直至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东欧，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古代的东方和其他地方，都有过生产或消费的集体制度。

在关于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日耳曼的“马尔克”、俄国的“米尔”、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和东方的公社的讨论中，提出了公社集体性的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摩尔根笔记结尾处补充了一系列他从凯撒、塔西佗和塔西佗的解释者利普西乌斯的著作中作的摘记，它们是摩尔根的著作中没有的，大部分谈的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集体制度。至于他当时脑子里考虑的是印度的公社问题，可从他把菲尔的《雅利安人村庄》（《The Aryan Village》）误写成“雅利安人公社”（《The Aryan Commune》）看出来；^④他研究雅利安人的村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研究印度的公社。摩尔根著作摘要包括有马克思补充的论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俄国的“米尔”及有关制度的材料，在梅恩著作摘要中同样有关于公社生活的讨论。

对古代公社集体组织中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关系和惯例之间的差别，马克思只是开始了考察而已；同样，在古代氏族的瓦解中，从身分向契约的过渡只是被马克思作为事实对待。文明状态中的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问题同原始状态中的共同集体享有相对立。马克思同梅恩和摩尔根一样，把古代的氏族看作是集体，不同的只是梅恩赞美个人、个人的财产所有制、法律和道德地位的出现，摩尔根则哀叹财产的出现、在文明时代对财产的过分追求以及这对人及其精神世界的有害影响。恩格斯对摩尔根真心诚意地表示赞同，马克思并没有表示异议。

确认人是社会存在物的概念，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可看到。他后来又对它继续进行研究，但是关于原始社会只是简略地涉及到。然而原始公社的生活与这早期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在对毛勒、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菲尔和拉伯克的著作的摘要中又继续进行研究。马克思所假定的原始公社和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不仅与梅恩相反，而且也与霍布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88页（中译者把Village和Commune都译成了“村社”，本文作者所说的这层意思就看不出来了。——译者注）。

斯和卢梭相反。研究从原始公社的过渡,不仅是为了研究其本身,而且也是为了理解社会过渡问题、先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状况、后来的社会分为阶级的状况以及原始共产主义对在文明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训。柯瓦列夫斯基曾把从原始公社过渡的基础与私有制的发展联系起来。他假定了一种在共同占有土地并且隔一定时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公社村子里或亲属公社里的初民生活。较远的亲属的增加和新的移民的到来,造成对较远的亲属和新的移民不利的不平等分配。较近的亲属和较老的居民占有着较大的(也许是较好的、较肥沃的?——柯瓦列夫斯基在这里简单化了)份地,他们看到,如果其他人被赋予平等权利,他们的财富就要减少,为了自卫而将这些较大的份地转变为私有财产。柯瓦列夫斯基然后提出了一种把占有时效先定为20年,后定为10年,一达到这个时效就合法地永远取得土地权的理论。马克思评论道:“这样说要简单得多: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争执,——这就必然使事实上享有了特权的人极力确保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地位。”^⑥

马克思接受了关于原始的分村氏族公社、共同土地所有制、各个家庭之间隔一定时间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有某些较远的氏族成员和新的移民到来的概念。土地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争执,于是拥有对土地的优先要求权的老居民为了自卫而建立了私有制。(自卫是双重意义的,第一是维持优先的权利,第二是在发生麻烦时防止侵犯。)然而,分为氏族集团定居,必须以氏族公社的各支系在空间上的分隔为前提条件,空间上的分隔又与离开原来定居地的时间上的距离有联系。这是柯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之间的共同基础。然而,柯瓦列夫斯基提出血亲意识的因素而不是氏族不同支系分居各地的事实作为有促进作用的原因。马克思反对把意识因素这

^⑥ 同上书,第247页。

样引进历史。^⑦

按照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理解,各氏族集团的分村定居、外人的到来、早定居者的反应,造成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因此,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建立在氏族公社固有的社会经济因素上和这样一些外部关系上:同宗旁系亲属的分出、其中有些人的返回以及其他的移居因素。导致私有财产的社会安排之所以被采用,是为了保护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或者保护那些已经从这种不平等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不致遭到可能出现的社会骚动之害。

原始的平等、博爱和共产主义由于内部因素的作用而衰落的理论,应该和公社之间的交换因素联系起来看,商品和商品交换正是从这里开始它们的历史旅程的。这是和前者相反的辩证成分,因为它包括公社对一个外部关系即商品之间的交换的内在化,商品生产的内部关系从而建立起来。相反,在第一种理论中,对不平等出现的解释建立在内部关系的外在化以及通过旁系亲属迁入、回来等的重新内在化上。马克思没有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因为他的研究由于逝世而中断了。

恩格斯提出的对古代公社衰落的解释,一部分已经说过:主观因素是贪婪等,客观因素是公社中财产的积累。关于日耳曼的原始公社马尔克制度,恩格斯同样认为它的基本特征是乡村氏族公社共同占有和使用土地。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血族联盟随着人口数目的不断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而被破坏。从这种原始的联盟中产生出了母村和移民村的体系。^⑧在稍后对马尔克的研究中,恩格斯提出了同样的概念,他甚至认为整个民族在最初构成一个统一的马尔克,从那里产生出母村和女儿村的体系。^⑨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描写的商品交换开始时的情形时,在交换开始中引进

^⑦ 同上书,第 232 页。

^⑧ 同上书,第 19 卷第 540 页。

^⑨ 同上书,第 354 页。

了剩余(社会)产品的因素。^⑩

人口数目增加的因素和民族继续发展的因素，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母村和女儿村的体系看起来是这一发展中的外部关系的因素，但是恩格斯把它看作是一个统一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内部固有的统一体系的社会运动。(这是从内在因素到外在因素的过渡。)剩余社会产品的假定同样是向一种外在关系即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的过渡。这些因素并没有被恩格斯集中到一起，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种过渡既没有被明确假定，也没有与它们的结局联系起来，这些结局就是达到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各公社的历史发展，从而产品的异化、人们相互之间的和与自然界的异化、公社内部的对立，公社之间的对立。恩格斯所假定的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是与上述关系分开的。

技术的改进、征服自然的科学的发展、动植物新品种、新工具(犁、风车、冶金术的发展等)的采用，没有被考虑到。也许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的“民族的继续发展”这句话包含着这些内容，但是这句话太含糊，不能让人得到什么确定的概念。

恩格斯那里缺少的，是原始民族社会生活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形式的和本质的关系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逝世时，这些因素是零散的。我们不能说恩格斯把它们联结成了一个辩证的体系，虽然他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贡献都比后面几代人认为的更丰富；遵循他的传统的后面几代人的贡献是颇为片面的，因此一般说来并没有遵循他的传统。

2. 亚细亚社会和生产资料

马克思无论在菲尔著作摘要中还是在梅恩著作摘要中，都把东方和欧洲的历史过程严格区分开来。只要菲尔试图按照封建主义来思考亚洲的问题就受到他的嘲笑，梅恩对隆·辛格的东方君主国作与欧洲君主国对照的描述，则受到他默默的支持。他还反

^⑩ 同上书，第25卷第1015页。

对柯瓦列夫斯基关于传统印度的封建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象菲尔一样,把印度和西欧的分村加以区分。马克思在上世纪50年代从事新闻写作的时期,曾密切注视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不管亚洲的进一步发展是不是会与欧洲历史趋于一致,他拒绝关于在那时以前欧亚两洲历史道路相同的思想。

恩格斯作为出发点的前提是:“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社会的分工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①这是排除地理差异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曾谈到亚洲驯养、繁殖和放牧牲畜;游牧部落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与其余的野蛮人分离开来。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商品生产、个人之间的交换逐渐发展;畜群逐渐转归私人所有,个人之间的交换变得更普遍。因此,亚洲符合对全人类适用的一般规律。

魏特福格尔指责恩格斯对“作为主要社会制度”的亚细亚社会的存在在赞成和反对之间动摇不定。他说,恩格斯的基本态度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发表以前和以后的著作中都承认亚细亚社会是一种能够与封建制度等相比的历史和社会范畴,而在《家庭的起源》这本书中则看不到这种性质的亚细亚社会。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确认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把它直接与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联系起来,这种公社“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②

魏特福格尔的论据是,东方专制制度是社会中的一种统治形式,它一般是在亚洲早期国家中从垄断控制供水和水利工程的行政职能中产生出来的,有些地方一直存在到20世纪,其次,列宁和斯大林得出结论,这类职能的行政垄断创造了一种可以适用于苏联国家形式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社会范畴,因此禁止使用这个范畴于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分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220页。

恩格斯应该与这种论据有什么联系，魏特福格尔没有肯定。他在提到《反杜林论》时认为恩格斯“缺乏敏锐性”，虽然他发现恩格斯在那部著作中谈到亚细亚社会。恩格斯被指责“隐藏了”他在别的地方大谈特谈的东西，即功能国家的专制主人无情的剥削方法，还被指控“转弯抹角地承认了”他在提到文明时是把东方专制主义排除在外的。然而魏特福格尔对恩格斯的评价与列宁和斯大林的不一样。要么是魏特福格尔对自己的读者没有足够开诚布公，要么是他没有完全制定出自己的立场。这些是关于论据的政治背景、用法和目标的形式的和外部的的问题。至于魏特福格尔对恩格斯的分析的实质，有一个他没有谈到的看法值得考虑。《起源》和恩格斯在1888年准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一样，只关心单线的发展。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则断定有多线的社会发展途径，这些著作或是和马克思合作的产物，或是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共同制定的立场。恩格斯论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著作同样表现出两种情况：第四十三章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材料加工成的，在这里，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帕姆帕斯草原以及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制公社的土地被同中欧和西欧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的土地区分开来。^⑬在恩格斯为补充说明《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文章中，对从农民公社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按直线式阐述的。^⑭

问题不在于，恩格斯独自一人时是单线发展论者，而和马克思在一起时则是多线发展论者。问题在于，恩格斯没有掌握一和多、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是从抽象到具体进行思考的，他的著作表达了这些关系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辩证法在许多场合是有缺点的，因为是片面的。魏特福格尔的辩证法也是有缺点的、片面的，但是在国家形成的问题上，他的辩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818页。

^⑭ 同上书，第1015、1020页。

证法是恩格斯的辩证法的对立面。恩格斯在《起源》中假定了国家发展的一种“完全纯粹的”情况。恩格斯撇开了自然的关系，从而撇开了与周围的公社、氏族、部落的关系。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形成的过程完全在雅典氏族体系的内部进行，由那里面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瓦解和转变来说明。他不考虑在这从社会生活的公社形式向政治形式过渡的时期中人对自然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也不承认公社之间的经济交换或征服这种外部关系。

然而，马克思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公社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⑮“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⑯恩格斯在1894年的评论是：“今天，自从毛勒到摩尔根等人对原始公社作了广泛的研究以来，这已经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了。”^⑰这样一来，《起源》的论述方式的缺陷就更加令人吃惊，因为恩格斯完全孤立地（抽象地）谈雅典的发展，可是产品转变为商品这一在古代氏族瓦解和政治社会形成时期起作用的经济因素，却是公社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向恩格斯提出的指责，比不确切（卢卡奇）或忽略过程中的地理差异（魏特福格尔）更严重。这就是他否认了自己的原则，不要说应用对这种原则的辩证理解，连理解也没有做到。

恩格斯对两个因素置之不理。第一，在产品向商品转化中的不同公社、氏族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古代社会并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情况转变为政治社会的；因此把雅典作为这种情况处理不仅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没有意义。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且马克思曾明确反对说孤立的实体过渡到一般政治社会，不管这种实体是部落、氏族，还是公社、村子等。第二，经济因素在向文明过渡的时期就已起作用，而不是只在文明时期起

^⑮ 同上书，第198页。

^⑯ 同上书，第23卷第106页。

^⑰ 同上书，第25卷第198页注(27)。

作用，这是恩格斯把原始人和文明人分隔开来的一处重要修正。从这两点考虑得出的第三点考虑是：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的转变和公社生活到文明生活的转变，并不是以同一速度平行地进行的；它们是相互交错的，但是恩格斯没有把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弄清楚。

另一方面，魏特福格尔的立场得到后来发表的马克思著作的支持：马克思继续反对把东方的历史范畴归入欧洲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把亚洲的传统社会与古典的封建欧洲的传统社会截然区分开来。魏特福格尔探讨已经形成的早期国家（恩格斯探讨的是形成中的国家）。他展现了不同等级的社会，一端是没有国家的较简单的社会，另一端是有国家的复杂的社会。贯穿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共同因素，是水的控制、控制水的社会机构以及与控制水有直接联系的技术、所有权等的发展。这些首先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从这些关系中产生出的内部和外部的安排。财富的增加和财产的积累、公社所有制与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产品转变为商品的经济关系、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社会中个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过的这一切，魏特福格尔都没有谈。另一方面，他讨论了在已经分为阶级、形成国家的社会中的征服这种外部社会因素。魏特福格尔讨论了在复杂的、分为阶级的社会形成过程中人和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与其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但是没有讨论正在形成国家过程中的社会本身内部的关系和过渡情况。然而，这是马克思在他对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和梅恩的批评中主要关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样的。

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处于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发展的中心。在哲学人类学中，人是社会存在物、在社会中相互作用、而社会本身是集体的理论早就针对人是独立个体的理论被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在经验人类学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在一方面作为一定社会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内部关系得到考察。这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辩证问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关于民族学的著作中探寻通过人类历史和社会斗争的航海图。他采用了这些著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作为他的指南,甚至把马克思的未完成的意见作为规范,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作出自己的评论,从而以具体的方式对人的科学作出了贡献。他的作用与马克思相比是矛盾的,一部分是按规范行事的,一部分是科学的。

马克思在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作为哲学人类学家发表著作,他非常关心对人的经验研究,但是并没有作出这种研究。另一方面,经验人类学研究当时并没有很好的发展,并不能支持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经验人类学。在以后的40年中,马克思密切注视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的发展,并且认真加以研究。A·巴斯提安、E·B·泰勒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民族学家,是他在这个领域阅读和批判的重要部分。因此,随着社会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具体的经验科学,马克思从一种抽象的立场过渡到一种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并且随着这个领域中的科学中心的发展,自己参加到运动当中去。

原载《国际社会史评论》1973年版第18卷

(莫立知译)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 马克思主义分析

[法]克·巴雷尔

编者按：本文概括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其中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目前西方仍然流行的结构主义分析。文中谈到的各种流派的观点和有关文献对于我们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其中涉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则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

本文的一般目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问题体系提出的命题对当代社会的特点进行思考。它的特殊目的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学文献。它所要阐明的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马克思的问题体系是有效的、丰富的，但是把《资本论》提出的模式当作分析的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已远远不够。马克思的问题体系本身要求超越这一模式并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本文将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的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这些文献划分为两类（应该承认，这种划分方法不可避免地有些主观）：一、作为分析社会发展基础的《资本论》的模式；二、对当代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一、作为分析社会发展基础的 《资本论》的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推理的理论模式是建立在一些明确

的或隐蔽的假设之上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两个主要阶级,这个社会实行自由竞争的制度等等。这个模式的目的在于首先通过对商品关系,然后通过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研究来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整个积累的规律,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等等)。众所周知,这些规律的阐述并非十分明确和系统。

概括地说,用这种理论模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就是揭示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然后用这些矛盾或规律所采取的形式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又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1.对《资本论》的模式加以具体化的分析;2.对《资本论》的模式加以补充的分析;3.对《资本论》的模式加以边缘化的分析。

1.对《资本论》的模式加以具体化的分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沿用这种分析方法,它局限于重复列宁和第三国际的分析而没有任何概念上的更新。我们在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59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P·尼基蒂纳《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196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维切波拉科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往往是教条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分解为两个系列命题: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它具有三个一般特征,第一,它是垄断的。垄断形式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第二,它是寄生的、腐朽的;第三,它是垂死的,是帝国主义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总爆发的阶段。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家与国家互相渗透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机体的过程”。^①在这一阶段

^① 参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版第292页。

中，国家成为维持垄断资本家统治和支持他们进行积累的职能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日益集中并获得社会性质，但是国家并未解决任何矛盾，相反，它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曼德尔的分析就属于这种问题体系，虽然他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超政治决定的概念。他力图描述“花甲之年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形式并说明资本主义战后的长期增长和转变。

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在于它把资本增殖条件的根本改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同结构变化这个次要因素结合起来。“资本增殖条件的根本改善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②，剥削率的提高使资本主义能够进行第三次技术革命并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是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现实原因。所谓结构变化则指大企业内部的私人调节以及国家范围内的公共调节。它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暂时的、有限的效益。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只是在表面上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矛盾，从长远来看，它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曼德尔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他认为，结构变化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来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只能起到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极限不可能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形式的界限。无论是私人调节还是公共调节都没有改变事物的性质。它们只能暂时抵销、推迟、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不能阻止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同时也不能持久地保证垄断的超额利润，避免利润率其中包括垄断利润率的下降和解决市场的矛盾。国家的新作用在于使生产力社会化，引导积累，保证生产的一般条件，为此国家将包括越来越多的领域：行政、国民教育与培训、交通运输等等。曼德尔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新的结构的理论。他认为《资本论》的模式完全适用于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必研究这些矛盾的具体的运动形式以及经济结构的整体运动。曼德尔的

^② 埃奈斯特：《花甲之年的资本主义》第1卷第15页。

分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分析是相近的，所不同的是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剥削的消灭。他认为资本主义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是要灭亡的。这两种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局限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基本属性的论断。它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一个职能工具，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具有永恒性质的观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它的整体调节的有效性。这两种分析都认为只存在着《资本论》中规定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

2. 对《资本论》的模式加以补充的分析

这里我们仅限于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波卡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资本论》模式的延长，它明显地优于前一种分析，因为它不仅是《资本论》模式的具体化，而且是这一模式的发展。波卡拉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它的危机和出路》（1974年巴黎社会出版社版）和《〈资本论〉的运动》（1978年巴黎社会出版社版）。

保·波卡拉研究的出发点是：《资本论》的模式是不完全的，马克思揭示了一些规律，但是他并没有研究这些规律的总体运动和辩证法，特别是没有研究积累规律和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辩证法。基于这一事实，波卡拉试图建立关于资本的过剩积累和贬值的理论作为对《资本论》模式的补充。

在波卡拉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的结构性的贬值规律起作用的阶段，这一情况是由于公共投资处于优先地位，国家干预不断加强造成的。毫无疑问，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析能够说明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也不能解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这说明还缺少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与它的作用机制之间的结构上的统一的理论，即缺少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积累、实现、消费和分配的新的、特殊形式的统一的理论。波卡拉关于资本的过剩积累与贬值的理论恰恰能够说明这一复杂情况。

波卡拉虽然还没有建立一个整体的理论，但是他却研究了规律的新的作用形式。他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和作用机制的分析中引入和阐发了与资本的逻辑不一致或矛盾的原则体系：公有化、资本的结构性贬值、社会为劳动力的支出（健康、教育、培训等）。波卡拉反对功能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一切都是为资本服务的，波卡拉认为，资本主义结构和作用机制的变化会引起政治上的后果，因为在这一变化的基础上可以实行制度的民主化，这种制度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求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一角度来看，波卡拉的分析明显地不同于传统分析。传统分析直接运用《资本论》的模式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延长，而波卡拉则认为，《资本论》的模式仍可应用，但形式发生了变化，新的形式与旧的形式有时是矛盾的。

3. 把《资本论》的模式加以边际化的分析

这种分析在法国以外有很大影响。它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领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保·巴兰和保·斯威齐，他们合著了《垄断资本主义》（1968年巴黎玛斯贝罗出版社版）一书。

这两位学者的基本思想是，《资本论》的模式是正确的，但是它混淆了对资本主义矛盾和规律的一般分析和这种分析的具体应用，一般分析是适用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而《资本论》模式的具体应用则只适用于竞争资本主义的阶段。由于竞争资本主义必由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把一般规律应用于这一现代形式的模式，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模式。巴兰和斯威齐把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竞争作用”的不同。对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很激烈的竞争对我们时代来说却是衰弱的。

马克思和列宁论述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尽管出现了垄断形式，“自由竞争”依然存在。巴兰和斯威齐的竞争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术语也不相同，实际上他们用市场理论的概念代替了马克思的竞争概念。在他们看来竞争只是市场的一个条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在十九世纪交换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竞争目前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失去了这一作用^③。

巴兰和斯威齐从垄断代替竞争这一事实出发，认为由于垄断掌握着价格，因此应该用剩余价值提高的规律来代替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问题已成为主要问题，因此应该从这个矛盾出发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形式，尤其应该考察的是它的实现的新形式。

以上列举的各种分析都仅仅局限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特殊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研究都是不充分的。它们都留下了各自的空白，没有一种分析是把当代资本主义当作特殊的总体形式，当作一种特殊的体系来研究的。它们都满足于重复《资本论》的分析，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正。它们研究的仅仅是体系的矛盾和规律而没有提供总体的作用机制的理论，因而不可能把当代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来加以说明。

下面我们将研究一些建设性的分析，它们具有全新的特点和原则上的优越性。

二、对当代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概念，卢卡奇也曾经使用过“整体”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也

^③ 保·巴兰、保·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1968年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版第27页。

加以充分的肯定。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当代的经济结构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总体模式。

结构主义把结构当作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要素，它认为，结构制约和决定着作用机制的运行方式，这种体系的理论强调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优先地位，它对建立在机械论和线性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模式提出疑问，它主张对体系的调节进行研究。当前缺少的正是这种把当代经济结构当作整体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而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继续产生认识的作用，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模式，这种必要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从1945年到1975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可以在非危机的形式下运行。这就需要我们解释这种发展，并研究它的协调性，这种情况与三十年代的危机完全不同；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但是他对这种生产方式的相对的协调性研究得很不够，他没有看到这种可以在矛盾中实现的特殊的协调，因而没有研究这种矛盾的统一及其运动形式；

——当代经济结构模式的建立是对《资本论》模式的推进。《资本论》模式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对积累规律即生产、剥削、资本增殖和积累的研究。它对于各形式之间的联系以及某些形式，特别是涉及现象方面的形式研究得很不够。马克思没有深入分析作为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经济关系总体的经济结构；

——建立总体经济结构的模式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体系的内在需要，即补充和完成马克思的理论建设的需要。经济结构理论更接近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已不同于仍然保留先前社会遗迹或某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关系的古典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它在形式上的自我超越和对自身的相对否定，特别是以这种生产关系为载体的生产社会化的扩大要求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别开来。

1. 对当代经济结构研究的有意义的成果

我们不可能研究所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文献，我们只限于研究两种对于建立当代经济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起着特殊作用的文献。

第一种文献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经济调节问题。在这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有保·波卡拉和G·德·伯尔尼，他们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调节研究小组于1983年出版了《危机与调节》一书。伯尔尼用马克思的利润规律（平均利润率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和社会程序。克·巴鲁瓦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型^④。阿尔都塞把结构当作生产关系的有序的整体，结构主义观点遵循的也是这一理论方向。

第二种文献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力图丰富从马克思、希法亭到葛兰西的分析。它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发展（普选制、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市民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作为这种政治关系发展前提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国家垄断、计划化倾向、生产和剥削形式的演变等等）。这种分析比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分析更切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

这类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尤以葛兰西及其拥护者们的分析最引人注目。

葛兰西研究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发展而是它的政治形式。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成为诡谲与力量、妥协与镇压的结合。这同古典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古典资本主义只是置于制度矛盾深化的单一运动之中。

葛兰西首先研究了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他不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劳动的组织方式，而是把它们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固定资本的节约联系起来，此外他还研究了工资的提高、社会妥协、生活

^④ 参见克·巴鲁瓦：《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危机》1977年巴黎格勒诺布尔—马斯贝罗大学出版社版。

方式的变化、生产组织和社会计划化问题。

葛兰西和他的拥护者们认为，计划化的资本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统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方式。随着机器应用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分工的专制性质必将扩大到整个社会并取代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计划化是资本对经济结构进行组织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调节，国家作为集体资本主义的直接代表成为经济结构的中心，它可以解决资本内部的矛盾，凯恩斯的国家不过是国家资本的形式。

2. 内含积累的模式

这种理论试图全面、系统地说明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⑤。它是多种分析的独特综合。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协调性并不是它的制度（计划、国家、垄断形式）而是它的特殊的积累方式造成的。这就是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内含的积累方式^⑥，它完全不同于战前资本主义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外延的积累方式。内含积累的扩大使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使资本效益和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得到提高。这种提高在雇佣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必然引起消费的大量增加，从而为产品不断提供新的市场。内含积累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决定性因素，即新的劳动组织（泰勒主义、福特主义）、新的消费关系（消费的大量增加）和新的分配关系（实际工资的有规律的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形成了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动态平衡。在外延积累方式中，第二部类的市场处于停滞状态，第一部类的自我服务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过剩，相反，在内含积累方式中，第二部类不断扩大，

⑤ 参见米·阿格里达：《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1976年巴黎卡尔玛—勒维出版社版和罗·波瓦耶埃：《调节理论：一种批判分析》1983年巴黎发现出版社版。

⑥ 参见克·巴雷尔：《内含积累——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标准》，载于《经济学杂志》1984年第3期。

两个部类之间能够做到平衡发展,从而避免了周期性危机。

三、《资本论》模式与当代 经济结构分析

任何模式都是现实的抽象,因而是“非现实的”,《资本论》的模式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这种抽象是否与不断发展的现实相一致。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是否应该对模式加以补充或修改,甚至用新模式来取而代之。《资本论》的模式在三方面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应用不一致。

第一,《资本论》的模式是简单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我们面临的却是复杂的资本主义。在简单资本主义中,生产占居着首要地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他在生产中的作用决定的。《资本论》的模式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它只适用于用基本的、社会化技术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市场关系、技术竞争尚不发达,复杂劳动也居次要地位,而当今的资本主义却复杂得多,个体之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关系是多元决定的,并不仅仅是由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种主要的规定往往受到次要的规定的规定的影响,总之现代社会的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远比《资本论》模式中的这种辩证关系复杂得多。

第二,当今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本论》的模式是以两大对立阶级的存在以及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出发制定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决定了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阶级的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向,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边则是贫困的积累。工人阶级的利益自发地趋向一致,他们一无所有,在革命中,他们除了身上的锁链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此外,随着社会化技术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陷于非熟练工人的境地而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经济结构分析表明《资本论》的模式已不符合当今资本主义的

现实。首先,事情并不象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工人阶级所有成员的利益自发地趋向一致。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部分变成了富裕的阶层,其次,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也发生了问题,因为资本的绝对统治、资本家阶级独占并通过市场机制分割全部剩余价值的格局改变了,最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葛兰西和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资产阶级国家区分为民主国家和法西斯或专政的国家。民主国家的社会协调原则不断地调整着各社会集团的利益。

第三,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日趋紧密。在《资本论》的模式中,经济结构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马克思方法论的基础是:经济占居着中心位置,它是独立的并统治着社会。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远远小于其他社会,而且这种独立性还有进一步削弱的趋势。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制度的影响下,许多过去对资本积累起着次要作用的因素如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社会保险等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互相渗透的现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已经演变为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互相渗透的过程还伴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自我否定,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社会结构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关系或者货币关系建立起来,因此,社会的逻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的逻辑^①。

原载《当代马克思》1988年第3期

(李其庆译)

^① 参见克·巴雷尔、钱·凯巴吉安、奥·威斯坦,《关于危机的研究》1983年巴黎大学出版社版。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英]J·施瓦尔茨曼托^①

一、引 论

本文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我们的意图是集中论述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政治问题,阐明马克思的国家观和政治权力观。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与多元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的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多元主义者把国家当作一个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压力作出反应的中立机构,它与任何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没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把国家当作中立的仲裁者的观点。就精英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也许会同意,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中,实际的权力始终为少数人所掌握。但是,精英理论把统治精英的统治地位归结为个人特征和政治技巧。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掌权者是那些由既定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并要求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因此,权力的基础是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控制。统治精英藉此变成了统治阶级。此外,精英理论还含有一种历史循环观,它断定少数人统治的必然性。相反,把历史理解成一个不断迈向无阶级社会这一最终目标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性内容。

恩格斯曾提出问题:究竟为什么有阶级?他的回答是,由于迄今为止生产的不够发达,“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

^① 作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任教于里兹大学,曾发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论著多种。本文是根据其《权力的结构》(1987圣马丁出版社版)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编译的。——译者注

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②

阶级划分产生阶级斗争。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主制中也同样存在阶级划分和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自由民主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样板。正如托尼所说，“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术语贴切地描述了“将政治民主的事实与尖锐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划分结合起来”的体制。^③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阶级社会的明证。马克思本人不常用“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术语，对此有必要加以简要说明。

马克思相信，无条件地给予民主权利，首先是普选权，必将导致社会的革命性转变。统治阶级将丧失其权力。另外，了解这种危险的资产阶级宁可放弃民主的游戏规则。在这两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与其说是指稳定的国家制度，还不如说是指高度不稳定的政治状态。马克思认为他在1848—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事件中找到了证实这种理论的历史根据。

当然，与马克思的想象相比，资产阶级民主事实上已证明了一种远为稳定的政治体制。普选权和民主权也没有产生马克思所希望和预料的并为现存制度的捍卫者所害怕的革命性后果。民主的发展没有导致社会主义结果的原因，引出了改良及其与革命的关系这一论题，而这一论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核心。“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术语在探究这些问题时是有用的，不过它之所以有用更多地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什么是理解西方民主体制权力结构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民主体制赖以建立的社会与经济条件。

应当补充指出，马克思决不否定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的价值，也不认为它们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相反，他的观点是，民主是消灭阶级划分的手段，而且实际上它将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获得充分发展。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最终将在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③ R·H·托尼：《论平等》1964年伦敦版第78页。

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无阶级社会中消失。

二、阶级权力体制

资产阶级民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或者说国家形式的特征是多党制、代议制和大量的压力团体。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这些制度都存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体制之中。阶级划分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的独特特征。阶级社会贯穿全部历史。古代有奴隶与希腊或罗马的自由民，中世纪有农奴与封建贵族。现代则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新的关键阶段。它为人类征服自然创造了显著的可能性。它将文明传遍全世界。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④

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不能消除始终困扰着人类的那些邪恶：压迫、剥削和战争。^⑤它们最终都归结为阶级统治这一基本事实。但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资本主义阶级划分的独特之处。资本主义的阶级区分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和个人的特性之上，而是建立在抽象的经济关系之上，它使阶级结构简单化了。与资本家统治者相对的不是贵族和平民、行会师傅和工匠这些阶层，而是占绝大多数的一无所有的公民。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是产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是消灭阶级。它将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必须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资本主义虽然取决于生产力，但不能纯粹用经济条件去解释和判断它。它的基本特点是剥削劳动阶级，除此之外它还影响所有人的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⑤ R·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牛津版第24—26页。

心灵和生活。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物化的和异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质量必然被数量化,因为金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

三、国家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整个政治特别是国家被看作维持阶级统治体制的主要工具。国家是政治权力的组织表现,国家本身则是任何阶级社会不可缺少的机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形式,国家也有不同的形式。自由民主国家象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其存在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和社会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政治权力只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不过,国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微妙。把国家仅仅当作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思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对的自主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首先是一个镇压机构。它是一种专门的暴力机器,是一系列的强制机构。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现代历史必然被看作这些镇压机构继续成长和复杂发展的过程。

德雷珀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总括性定义:“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或一系列机构的复合体,它依赖于社会特殊机关对强制性暴力的运用,以便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保护现存财产关系基本不变,并使其他所有阶级处于服从地位”。^⑥

这一定义的价值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重要思想上。第一个思想是,国家由日益复杂的统治机器构成,这些统治机器有它自身的一定的生命,并且独立于市民社会。第二个思想是,尽管如此,国家权力仍然没有与社会全部分离。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捍卫特定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它拥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自主性,但另

^⑥ 哈·德雷珀:《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1卷《国家与官僚机关》1977年纽约版第251页。

一方面它又与社会紧密相联,因为它履行着“保护现存财产关系基本不变”的职能。

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包含国家权力不断强化的过程。专门的暴力国家机器日益复杂和强大。这种发展在法国尤为典型。确实,马克思在他论述法国政治的著作中对此作了最生动的说明。

马克思也用其他的比喻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国家是社会的累赘,它妨碍社会的自由行动,使真正的人民统治和自治无法实现。马克思把国家当作市民社会的“寄生赘瘤”。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除累赘。从短暂的1871年巴黎公社那里,马克思预见到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机构。公社“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⑦它取代了第二帝国的官僚国家机器。它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公社的政府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他们领取工人的工资。换言之,公社尽可能地接近于直接民主制。正如亨特所说,公社是“没有专职人员的民主制”。^⑧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人民政权的设想是否与中央计划的集体主义经济相适应。

马克思批判性地考察了突出地表现在波拿巴帝国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指出“国家政权不是悬吊在半空中的”。马克思还揭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强有力并倾向于独立地运用这种权力,但它仍与社会有联系,与它所维护的阶级权力体制相联系。国家首先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联系。正是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的这种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基本信条。我们必须考察这种联系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权力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平衡又是怎样得以保持的。我们还会明白国家通过什么手段来实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1页。

^⑧ R·N·亨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第2卷《经典马克思主义》1984年伦敦版第161页。

现它的目的。当然,凡是国家显示它的暴力的时候,它都依赖于它的军队。但是,国家并不仅仅依赖于暴力。

四、统治阶级和执政阶层

接下去我们必须解释,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国家是怎样作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我们将专门就自由民主体制来讨论这一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自从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后,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地位”,所以,“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⑨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马克思至少在他更成熟的时期没有赞许这种观点。当然,在《宣言》作者当时所必然面临的政治舞台上,工业和金融资本的直接影响比它在随后的任何民主共和国中所发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法国每170名居民中只有一名投票人,选举权限于200名法国纳税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政治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不认为,现代代议制国家的阶级性质使资产阶级独占政权。第二共和国和后来的第三共和国所保证的民主权利,首先是普选权,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来自下面的压力”。

马克思在区分“统治阶级”(herrschende Klasse)和“执政阶层”(regierende Klasse)时,已经预言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思想。那些建立国家机器和政府的国家掌权者通常不是那些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在1855年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声称,在英国,执政阶层决不等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它必定被指定执政之前,它将不得不时而进行这种联合,时而进行那种联合。

下面一点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是自由民主制国家,它也是阶级的国家,行使维护统治阶级权力的职能。但是如果从这种意义上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说国家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他们并不是对既定指令作出反应的傀儡。正如米利班德所说，国家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妥善行事，但这并不是说它要按照统治阶级成员的命令活动。把国家理解为一个阶级的直接的反映工具，是一种极其“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米利班德指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国家概念本身意味着一种选择的过程。^⑩国家的掌权者必须决定，哪些措施事实上将促进有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这个阶级中部分人的利益。的确，国家作出的决定有可能有利于资本主义秩序及其受益者的长远利益，而与统治阶级的直接的或眼前的利益相冲突。柯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即‘工厂法案’的立法者，既不是盲目的资本家的眼睛，也不是受到资本家活动本身危害的那种体制的稳定者”。^⑪

这里谈到的措施是指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如缩短工作日、支付假日工资以及其他社会立法。这些可能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措施，虽被企业界视为直接的负担，但是有利于稳定整个体制。1933年美国的“新政”即是一个范例。其中的政府调节被某些企业界的代表称作“渐进的社会主义”。但从长远看，国家的行动却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使它能够在不危及基本体制的情况下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的福利政策，它实际上赢得了政治舆论的广泛支持。它的成就，尤其是国家卫生服务法案和1944年的教育法案，是对人民压力的反应。然而，我们可以相应正确地把这些措施看作国家在涉及由税收支付的直接费用方面作出的强制性变革，看作维持现存经济秩序合法性和群众接受这种经济秩序所必要的措施。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之所以必须有相对的自主性（即独立的行动范围），有两个原因。第一，国家履行着一种马圭尔所

^⑩ 拉·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牛津版第77页。

^⑪ R·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295页。

称的“凝合统治阶级”的功能。^⑫ 它不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维护阶级权力体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一般条件。为了代表全体资本家的利益，它不得与统治阶级的某一部分有过分紧密的联系。进而言之，为了维护资本家的长远利益，它必须超越整个阶级的眼前利益而自由地行动。这暗含着被迫让步的可能性，这种让步极可能与统治阶级相对立，但却是其生存所必需的。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国家的自主性概念之中。

阶级凝合意味着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冲突的利益的整合。德雷珀指出，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比任何先前的统治阶级更加容易。因此，国家更需要既作为分裂成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又独立于它们而发挥作用。^⑬

第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为了维护其合法性而必须拥有某种自主性。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国家与某个利益群的关系过于密切并受其支配，那么，它就不能使人相信它代表着普遍的利益并服务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必须由它的大多数人民所共有的信仰对于国家及其机构的正常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国家不光依靠暴力。实际上，在通常情况下它的暴力的一面是被掩盖起来的，或者仅仅针对极少数公然与其权威进行挑战的人。因为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领域里，似乎全体人民都成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以国家能够作为阶级社会的捍卫者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公民的阶级地位似乎并不重要。不管社会存在什么样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政治领域中都是无关紧要的。政治掌权者必定宣称，并且极可能确实相信，他们在来自市民社会的不同利益和压力方面是中立和公正的仲裁者。换言之，国家应当表现出正在接近多元主义社会的理论。如果国家不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意图行动而始终遵循资本的领导，那么它作为中立者的现象就会立即消失。国家的中立和公正仅仅是现象，从而是一种幻觉，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⑫ J·M·马圭尔：《马克思的政治理论》1978年剑桥版第23页。

^⑬ 哈·德雷珀：《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1卷第322页。

一个基本信条。这一论断事实上表明了，即使是一个进行改革的政府的行动范围也受其体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在公开的政治舞台背后，经济权力可能通过引起投资环境和就业的危机，或者通过股票交易机制来表明自己并从而影响国家的通货。此外，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可能出现对这种政府的抵抗，这些政治精英的集体心理是由意识形态的因素形成的，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而更加重要的是群众的意识形态状况。因此，意识形态及由此产生的共识被认为是国家除了其镇压权力以外所依赖的第二个因素。人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意识形态的职能得以有效地履行，暴力就会中止。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五、国家和意识形态

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们决定社会的结构。这种结构及它所依据的生产方式反映在人的思想中。它们形成人们的观念。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观念。然而事实上，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支配着教育和学习领域。它通常也监督思想观念向全社会的传播：“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④

显而易见，人们会赞同那些适用的并且能确证其有利地位的思想观念。现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将维持这些思想观念。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观念体系是明显地为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发明的，那就错了。只要社会随其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这些观念就会一代传一代。它们被当作永恒的真理和上帝或自然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而加以接受。它们既显示出阶级社会的一些基本事实，同时又掩盖着它们。用柯亨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被剥削者明白他们是被剥削的，他们就会憎恨其服从，并威胁社会的稳定。如果剥削者明白他们在剥削，他们自信地进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行统治所必需的沉着冷静就会动摇。作为社会动物，剥削者必定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当这种感觉难以与事实协调时，事实必定被掩盖起来……因而，幻象是阶级社会的要素”。^⑮

即使在旧秩序行将崩溃的情况下，对利益和特权的捍卫也总是在思想观念的旗帜下进行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是为物质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他们所信仰的生活意义而斗争，所以斗争会更加剧烈。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现存秩序的攻击者：“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⑯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将消失。然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牢固地扎根于统治阶级及其政治和思想代表的头脑中，而且也扎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散播到国家和市民社会之中，而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主要经济与社会资源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以致于最终工人阶级也把现存状态视为理所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产生了工人阶级，通过教育、传统、习惯，工人阶级把这种生产方式的状态视为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这就形成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后来所称作的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同样地甚至或更多地存在于文化领域。葛兰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宏愿得以实现之前，必须侵蚀和融解这种领导权。

如果意识形态被接受并且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它必定或多或少反映出它所在社会的真实性质，但也必定反映出该社会作为其行动指南而认可的理想。它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欲的。马克思在

^⑮ R·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330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

《资本论》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马克思在这里从理论上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显现在它的成员面前的那幅图象。因此它是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表现为一种观念的该社会的现存实在。

自由和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这种自由与平等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有限范围。个人必须将其全部存在屈从于商品体系的需要。关键在于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以他们完全异化的代价买得他们的权利，即他们存在的可能性。正如柯亨指出：“物的统治是资产阶级自由的代价。”^①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另一方面在于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是抽象的概念。个人的行动范围处处受经济事实的限制。关于平等，马克思说，只是在所有肉体都平等地拥有体重和占有三维空间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才是平等的。一旦超出抽象的量的规定而考察其质的属性，这种平等的外貌便立刻消失了。同样，在交换过程中所看到的平等也仅适用于表面的过程，在这种表面过程的背后，个人的平等和自由不复存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有人将统治意识形态与其社会条件相脱离的危险。他们指出，如果我们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相分离并使它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那么，历史将仅仅作为观念的历史而出现。如果进而把国家看作观念的捍卫者，那么这种观点就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接受。只有国家捍卫的东西才是意识形态。但是国家不是一个神秘的或抽象的实体。它的活动为组成国家精英的人们所操持。他们共同拥有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捍卫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正是他们的任务。

政治精英、主要文官、法官、武装部队等不是民选的代表，他们是国家的官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他们所共有的信仰和偏见是否

^① R·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125页。

能消除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国家的中立性的怀疑。问题并不是关于他们信仰的真诚或希望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最大利益而行动。无论如何，心理态度的某种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六、自主的国家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论断是，如果国家要成功地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它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性”。这对于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运行的自由民主体制来说尤其如此。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丝毫不影响国家及政治掌权者。马克思认为，争得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在通向社会主义解放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因素。这首先适用于基本的民主权利即普选权。但也适用于其他的民主权利，如组成政党和工会、举行公共集会等。这些权利对于无产阶级赢得政治权力和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拥有这些权利，工人阶级便能够对资本家及国家施加压力。这并不是说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说诸如缩短工作日之类的改良是能够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赢得民主”实际上就是给资本家施加压力。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可能放弃这种民主体制。在危机状态他们可能要求一种不同的国家，即高度自主的“强权国家”体制。这样一种国家将破坏按照自由民主规则建立的民主制度从而挫败工人阶级的努力。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看作是这种发展的典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主题就是资产阶级放弃了民主体制。正如德雷珀所说，贯穿该书的主题就是“国家权力与各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叙述了国家采取高度自主的条件。

这种自主性有两个方面。首先，在这类国家中，国家的官僚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比它的民主和代议部门更强大。军队、警察和官

僚夺取了议会的权力。

其次,除了牺牲其他部门而强化行政权力以外,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整个国家权力急剧地强化。专门的暴力机关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它独立于并且对立于是社会。国家对社会、甚至于对统治阶级来说,变得绝对自主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阶级都同样地在来福枪面前跪下了。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也在政治上服从于国家。所有市民社会都求助于强有力的国家的保护。统治阶级不再效忠于与代议制相适应的传统的代表、政党或政治家。现在它支持的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政治领袖。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完整的社会权力准备认可其政治权力的破坏。实际上,国家表面上完全独立的地位意味着国家重要性的大大增强。它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但马克思认为,即使有其独立性,国家仍然捍卫和保护阶级权力体制。资产阶级认为,在议会体制框架内他们不能充分保护其社会和经济利益。他们害怕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权利会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害怕普选权会摧毁私有财产制度并导致革命。在一定的环境下,资本主义也会感到与民主体制不相适应。但尽管如此,国家既不能废除也不能无视社会的阶级结构。

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波拿巴主义类型的行政统治国家表现出所有国家具有的两个特征。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有其自己利益的独立统治机器。同时,这个国家机器又与社会的阶级结构相联系。它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在波拿巴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特征得到了加强。第二个特征则包括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与其经济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区别。即使是波拿巴主义的国家,也仍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物质权力。

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著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丝毫不是因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依据。这些政权还有行政和镇压机构大量增强以及摧毁整个民主制度的特征。这些政权之所以产生还有一个重

要因素，即对代议制的幻想完全破灭和有产者阶级愿意解散捍卫其利益的政党从而放弃其政治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害怕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或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他们并不轻易接受强化行政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深刻的危机状态。

七、革命后社会的国家

另一种经常被曲解的马克思的看法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次成功的革命将立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历史的最终目标将一举实现。但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确实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但这种变革仅仅为环境和人的漫长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象其他任何社会形式一样，它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把推翻资本主义后直接产生的社会想象为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纯粹的乌托邦。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国家在过渡时期将起什么作用？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将是什么样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简要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⑮

马克思所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产生无阶级的社会。这是第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原始共产主义除外）。由于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社会中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权力而产生的一个机构，所以解放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将逐步缩小国家的活动范围和功能；它将逐渐废除国家。这便是著名的国家“消亡”学说。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政府主义观点区别开来，因为无政府主义要求立即废除国家，而马克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思主义则认为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仍需要国家。无产阶级仅需要一个垂死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确保胜利之日起，国家就进入消亡的过程。

这种消亡中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因而它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形式。它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消除了作为现代国家特征的复杂的统治机器。近乎直接民主的体制将取代那种机器。保留组织的目的是发展和保证革命的成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将逐渐消失。

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际组织中可推导出类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必定是在极其隐晦的意义上作出的。公社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也确实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它实际上是普法战争后巴黎的自治政府。马克思在公社中所看到的是与波拿巴主义国家的高度行政权力尖锐对立的東西。马克思把公社当作社会用人民统治的形式代替全权国家的一个插曲。它恢复了市民社会直接管理它本身事务的权力。社会获得了创造力。它“破坏了现代的国家政权”。

对于马克思来说，公社最可取的特征在于它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在于它的反精英主义、分权组织和废除官僚。他重视代表的短期轮换和对代表支付工人工资的事实。这些都是预防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成为专门职业的实践。

马克思从未明确说过公社是各地的革命后政权组织模式。确实，马克思在1881年致纽文胡斯的信中写道：“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①不过，它仍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员的参与式民主。

根据国家职能逐渐由社会同化的程度，国家愈“消亡”，人民就将愈自由。自由在于将国家从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关转变成一个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机关。然而，在过渡时期，新的共产主义社

^① 同上书，第4卷第422页。

会在每个方面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这既意味着经济上还没有产生出满足人民欲求的充裕财富，又意味着旧的观念、习俗、偏见依然存在。所以按劳分配虽然是资产阶级的原则但仍被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按需分配。

只有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更高级的道德阶段。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考察革命后社会的最后阶段，并将回答上面提出的国家将会怎么样的问题。这个答案是：国家将不复存在。这可能使我们想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关于“对人的统治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这一观点。然而，这一命题也表明，在最终目标上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调和。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将是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马克思非常相信，只要存在着分裂社会的阶级，国家就不可能被“废除”。只有无阶级的社会才可能逐渐变成无国家的社会。现代评论者没有领会这一观点：“正如阿维尼里敏锐地看到的，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国家的废除是一种暴力性政治行动，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国家的废弃则是漫长的社会和经济转变过程的最终结果”。^{②①}

马克思相信，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经济将有巨大的发展。当人不再成为机器的奴隶时，一幅未来人性的图画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将成为机器的主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将消失。与其后来的许多解释者和评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工业化是邪恶。他作为万恶之源而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只要机器不再成为资本，它就不会失去其使用价值。

然而，我们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所能想象的既不是机器人的社会，也不是崇拜自由感觉的马尔库塞派的社会。如果我们忘记马克思期望在那种无阶级和无国家的新社会中发现一种新型的人，那么他所描绘的图画将是绝对无法相信的。自由的时间将使时间的占有者自然地变成一个不同的主体，他将作为这种不同的主体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环境和人都将变化

^{②①} J·M·马圭尔，《西方马克思主义》1986年伦敦版第54页。

的观点的意义所在。自由不再是自由竞争的自由。人类的整个心灵结构、目的、行动和思想都将极其不同于现在。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预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

八、结 论

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完整地评价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社会经济理论。我们将自己的考察仅限于它的政治方面。在这方面，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如何组织起来的模式。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于处在工业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公社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废除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关和国家的其他暴力部门。此外，这种模式强调分权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将公社的制度扩展到全法国，公社制度不会破坏法国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是根据分权的路线来设想“生产者的自治”。但是，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难道不需要集权的和官僚的管理制度吗？人民自下而上的管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得到维持吗？这些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消除官僚机构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带有更直接的政治性质，它是精英理论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一同提出的，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可能各不相同。巴黎公社确实是没有职业官僚的民主。然而，因为它与暴力有关，它仍然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形式，尽管这种暴力不受军队和官僚工具的影响，并且从理论上说仅适用于少数试图反对新秩序的人。公社官员及其所有机构负有直接责任和随时可以被撤换，这是旨在防止新的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的出现。但是，实际上结果会是这样吗？遵循韦伯和米歇尔斯思想的精英主义者的答案是，尽管有全部反对措施，统治集团或寡头仍将必然出现。韦伯主张，生产资料集中化的社会主义将迫使官僚精英脱离人民的控制。在他看来，

将要出现的是官员的独裁，而不是工人的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管理精英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认为马克思也许太轻易地取消了权力结构问题。巴枯宁指出，从官僚和掌权者日益脱离人民意志的趋势看，马克思所提出的预防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他怀疑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认为它只会掩盖少数统治者的专制。

20世纪的历史发展没有证实马克思的预言和期望。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发动了一场革命，但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将日益激进，并倾向于采取革命行动，但是实际情形却相反。流行的是“德国模式”。这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期间作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民主路线。它包括一些组织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党的观点，这些政党正通过议会道路走向胜利。换言之，这是恩格斯在1895年的《序言》中所描绘的途径。当然，恩格斯的实际意思是，如果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放弃议会方法来剥夺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胜利，那么工人阶级的暴力反应将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这种可能性也许将无限地推迟。考茨基在1895年写道，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在现存国家的框架内并通过国家的手段而得以改良，是纯粹的幻想。然而，十年以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让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你就会明白议会主义如何将获得新生和产生硕果。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我们将发现，几乎所有西欧社会民主党大体上都采纳了类似的观点和相应的策略。政党精英到处都掌握着主动权。而且显而易见，与马克思的期望相反，大多数劳动群众并没有跟随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即使在社会主义政党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地方，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十月革命在国家体制方面也没有使国家开始“消亡”。它与巴黎公社极少相似。在这种体制中高度集权的政党垄断着政权。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1914年的夏天开始了一个我们无法预料其结果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内部的两极化导致了现存的

状态；一方面，改良主义社会主义仅与马克思主义维持一种不太重要的关系，另一方面，列宁主义及其变种垄断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说这种垄断已经遭到了挑战，但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尽管最近欧洲共产主义已经提出了新的综合。然而，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分裂，就必须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在俄国的实践方式。

（俞可平编译）

弗兰尼茨基论实践与辩证法的基础

柴方国

自六十年代以来，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要求重新理解唯物辩证法，提出辩证法要重视人的因素，要使辩证法人道主义化。这些观点，一度被人们看作实践派否认辩证法、至少否认自然辩证法的论据。

的确，实践派中有人否认自然辩证法。但是，实践派成员众多，观点也不尽一致，在研究时须区别对待。为了正确理解实践派的观点，本文打算就《实践》杂志主要发起人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的观点作些说明，因为他的观点在实践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弗兰尼茨基注重研究社会发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力图使他认为被教条化、自然主义化的辩证法重新回到人本身，同时，他也主张给自然辩证法以应有的地位。

弗兰尼茨基是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提出问题的。他认为，我们的时代自本世纪初以来已经历了世界大战、人的物化、非人的统治，人性受到压抑和摧残。而今天又因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加速了人的片面化。科学连同对真理的追求，成了为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服务的工具。专业的划分，民族的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哲学领域也不例外，哲学和哲学家分成了许多流派。人们把自己限制在专业范围内，对哲学作越来越“客观”的、“唯科学”的、漠视价值的研究，使哲学越来越实证主义化。

弗兰尼茨基认为，哲学实证主义化造成了哲学的僵化，使机械的辩证法观念占支配地位，并使这种观念变成毫无生气的本体论

偏向；把许多理论问题排斥在哲学之外，比如宣称异化理论是黑格尔主义的残余；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为一门哲学学科，把哲学的内容分解成许多实证公式（如陈述、命题、定理）和社会学范畴（民族、阶级、政党、国家等）。归结起来，就是使辩证法丧失对历史主体的理解和把握，回避人与历史问题，把研究的范围非历史地限于形式逻辑、认识论和哲学——自然科学问题上，以致使“哲学思想局限于关于自然界、自然规律和抽象的一般辩证法等等的思辨之中……而忘记了根本的利益即人的利益。”^①

造成哲学实证主义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人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的命运缺少责任感。哲学越是实证主义化，就越是脱离时代精神。哲学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或科学问题，而主要是关于人的、历史的，也就是生活的问题。哲学家同任何科学家一样，也是历史的存在物，应当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历史过程，探究这些成果的历史结论。哲学作为社会历史现实的表现，就不是仅仅对存在物的摹写，而是对它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创造性的、进步的实践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任何迄今重大的哲学的第一推动者置于视野以外，这一推动者可以理解为人类……包罗万象的全部实践。”^② 实践成了弗兰尼茨基全部思想的最基本范畴。

几乎所有的实践派哲学家都对实践问题作过论述。有特点的是，弗兰尼茨基把实践与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强调现实的、感性的人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把作为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统一的实践理解为自然与人类历史联系的基础。在这里，弗兰尼茨基扩展了实践的内涵，并对实践作了规范化的解释。

弗兰尼茨基认为，人总是处于实践的感性关系中，实践包括生活的所有方面，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生活结构。因而，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对一种创造性的哲学、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在肯定以往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实践作

^① 《人与历史》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78页。

^② 《实践》（国际版）1963年第3—4期第477页。

为根本范畴，并由此形成整个哲学体系。而教条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失误，就在于仅仅从实践——认识的认识关系中去理解实践，抹煞了实践改造生活、创造生活的意义。似乎实践的目的只是为了认识世界、说明世界。而实践在实践——认识关系中的作用，也只是使认识对象的本质明了化而已。这样的实践概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所说的实践，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而是作为人类基础的实践，作为人的哲学特性的实践。”^③

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尼茨基主张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上去，“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指创造性的、感性的、物质的人与其对象的物质作用，这种对象是人基于一定的物质前提，通过创造新的历史现实加以改变的。”^④ 实践的思想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得到了最富有哲学色彩的表述。而在后人阐明哲学的工作中，实践问题经常被忽略，或论述不够全面。

在弗兰尼茨基那里，作为人类基础和人的哲学特性的实践，主要是指主体和客体的现实关系。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并没有消失，而是不再分离。具体说来，实践包括三方面的关系，即感性具体（具体地改变现实的活动）、理论抽象和情感体验。^⑤ 通常人们注意的，是前两方面的关系。

在感性具体方面，弗兰尼茨基把实践解释为最广泛的生产的、技术的、科学实验的和革命的活动，认为恩格斯仅把实践理解为实验和工业是不全面的。实践是复杂的，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作为实践存在物，多方面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人的存在也只有通过改变他的自然、自我才能得到确认。“自然的、历史的现实改变，同人的改变、人的意识和人的关系的改变是统一的过程。”^⑥

人是按照自己的结构（不仅按照物理的和生理的结构，而且按

③ 同上刊，1965年第1期第42页。

④ 《人与历史》第80页。

⑤ 《实践》（国际版）1965年第4期第43页。

⑥ 《马克思主义史》1978年萨格勒布版第3卷第297页。

照自己的历史结构)来改变世界的。个体的活动也就意味着个体的力量和历史结构的改变。这样,实践便表现为一种感性的、具体的关系。

实践也是理论的,“在谈到实践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两个根本的要素:对(物质的和历史的)现实的感性的变革、改造、生产和改变;对这种人的感性活动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理论上的论证。”^⑦在实践中,人以或多或少的目的性指导自己,有意识地以理论引导自己。人不是以任意一种态度面向世界的。没有特定的态度、目的和观念,人就没有处于实践中,而只是盲目活动。即使很低级的实践活动,也有许多来自科学、生产、社会结构和组织方面的观念的规定和限制。实践的感性活动方面和理论抽象方面共同规定着实践。因此不应以实践的感性特征反对它的抽象特征,完整的实践概念是把二者都融为一体的。如果勉强把它们区分开来,那么就可能造成一种不包括任何实践因素的意识、假说和理论,或者不包含任何理论抽象的活动。事实上,感性具体和理论抽象互为条件,理论抽象是为感性具体服务的,因为人的存在和思想,他的生活的未来图景,只存在于实践的深刻本质,即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中。

弗兰尼茨基认为,实践概念不只这两方面内容,它还包含另外一层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情感体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谈到这层含义。他说在异化的劳动中,劳动者不是感到享受,而是感到人性的丧失,一旦能够摆脱劳动,他们便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它。弗兰尼茨基把马克思这里的内在含义揭示了出来,认为“实践如果没有特定的情感态度,将是没有意义的。”^⑧情感体验从两方面影响着实践关系。一是,情感体验作为价值选择的因素之一,推动或抑止实践过程。情感体验不仅影响着人的感觉,也影响着人的理性态度。这样,在实践中,除了对目的、手段、

⑦ 《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1963年贝尔格莱德版第71页。

⑧ 《实践》(国际版)1965年第1期第44页。

结果的科学论证以外，人们的直接的情感体验对实践过程起重大作用。这在心理学中已得到证实。二是，创造适合于人的产品，使人在自己力量的外化中感到快乐，本身就是实践的目的之一。实践表现为人的潜在能力的外化，在其中人确认了自己的存在，肯定了自己的人格，从而获得改变环境中使他不满意之处的情感体验。

弗兰尼茨基强调人按自己的结构进行实践，把实践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实践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表现，或直接就是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实践、感性活动、行动、劳动都是人的本质的规定，正是根据这些规定人才同其它生物区分开来，正是根据这些规定人才成其为人。”^⑨

马克思曾经系统地研究过人的本质结构问题。他指出：“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⑩“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⑪；“人的本质在其客观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⑫这样，人们便看到了处于社会系统中的、基于人的肉体 and 思想组织而发挥实践功能的完整的人的本质结构。实践既是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也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的人的肉体和思想组织的功能。

人按照自己的结构改变世界，这种关系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即把人当作自由自觉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人的“存在和本质正是他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如果我们通过实践概念承认人的创造性，就必然得出结论：人按照其实践的可能性创造自己的历史。”^⑬

弗兰尼茨基把实践与人的本质结构联系起来，突出实践中情感因素的意义，其目的与实践派其他哲学家一样，是为了给实践以规范化的界定。实践派普遍认为，必须把实践同活动、作为纯认识

⑨ 《马克思主义史》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0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⑫ 同上书，第3卷第514页。

⑬ 《实践》（国际版）1965年第1期第42页。

论范畴的实践区别开来。这里的实践(Praxis)概念同实用主义的以及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大相径庭。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指的是基于纯粹认识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而实践派的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理想活动的目的在其自身,它具有根本的价值意义,同时也是其它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实践概念本身包含着其关键的认识论概念:主体概念。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预先要求既意识到自身和对象,也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手段和达到预期目的的人的存在。”^①

这样,与一般活动相比较,实践增加了规范化的成分,它更关注人类的共同目标。实践同一般活动一样,都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但实践的对象化“不是一般的对象化,而是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形式的对象化。”^②这一思想,后来在另一位实践派哲学家米·马尔科维奇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马尔科维奇把规范化的实践的特点归结为7点,主要是:首先,实践是人的潜在能力的对象化,与一般的活动相比,实践更具有自我肯定的特征,它使人实现自己的最佳潜在能力,是一种本身就使人感到快乐的活动,尽管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而一般的活动,或者成了追求某种外在目的手段,或者职业分工使人变得片面化。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实践也满足其他个体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人直接地意识到通过他的活动及其创造物,丰富了其他个体的生活,并间接地成为其他个体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同他人之间的人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成了类存在,每个人既富有个性,同时又是社会存在。其次,实践也是理性的、自由的。人不仅仅靠本能、尝试和犯错误的方式来活动。人类能够发现自己所处的自然和社会过程的结构,推断发展的趋势,确定目标,寻求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就实践来说,它必须有自己的理性规范,即有自觉的目标、为实现既定目标所必

^① 《反映论若干问题》1960年布莱德版第23页。

^② 《马克思主义史》第106页。

需的自觉的活动、克服阻力的必要经验以及对活动结果与既定目标的比较。由于这种理性规范和特征,一方面,参与实践的主体能够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摆脱来自外界的强制,摆脱由于某种外界自然力量和强制性的社会力量而被迫总是以同一方式从事同样活动的状况;另一方面,实践主体自由意识的增长,使他一开始实践就能够意识到实践是为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忽视或否认这种理性规范,就容易把实践降低为通常意义上的活动甚至本能。此外,实践还具有明确的审美性质,主体以美的法则指导自己的活动,并在活动中感受到美的意义。^⑩

把实践范畴进一步规范化,使实践同人类进步、人性的肯定联系起来,无疑是由于看到人类活动在当代社会中往往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弗兰尼茨基同恩·布洛赫有相通之处。布洛赫对进步概念作过界定,认为并不是任何向前的发展和运动都意味着进步。在发展的同时,往往造成某些东西的丧失。人类只有依据人性的东西,坚持对人和世界的信念,他的探讨和活动才可能是进步的。“进步概念包含着趋向,而且是希望得到实现的、美好的、但尚未实现的趋向。”^⑪自觉创造的历史,就经常被思索的、间接预测到的自由王国的全部内容来看,总是导向对人类存在的充分确认。在这里,布洛赫以“人性的东西”、目的与机械决定论的进程相对立。但他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人性的东西同样是历史的,而任何历史的东西,只有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

对实践概念加以界定、规范化,具有多重理论意义。显然,与辩证法相关的意义,就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中,排除在历史发展中起消极作用的活动的意义,使辩证法确立在真正科学的理性的实践基础之上。不过在这种规范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实践派所共有的理想主义色彩。

^⑩ 见《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1979年三联书店版第265—270页。

^⑪ 恩·布洛赫:《进步概念的区分》1956年柏林版第40页。

由于坚持这样一种实践概念，弗兰尼茨基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关于辩证法的基础及其内容的“正统”解释：把支配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原封不动地运用于社会历史，甚至以这种规律构想社会变革。弗兰尼茨基认为，完全按照古典力学的精神理解历史运动，就会完全非辩证地仅仅从自然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并把历史规律看作不因人们的自觉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化的自然规律。这样，实际上就是对辩证法作了自然主义的理解。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把一种总的辩证的观点应用于历史，而在于应当对那种叫作人与历史的极其复杂的现象进行辩证的和唯物的分析。”^⑩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对辩证法作自然主义的理解，其原因主要是错误地理解了辩证法的科学性。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自然现象的规律较之社会发展规律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近代科学的开始阶段，科学在认识自然现象方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心，科学方法成为深一层次的方法论的基础。在黑格尔那里，许多自然科学的发现甚至成为他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恩格斯，按弗兰尼茨基的理解，或许是由于理论系统化的需要，倾向于用科学事实作为实例来说明辩证法。而这一时期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力在自身中清除主观的东西，追求“客观真理”。这种特点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以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为基础的辩证法。在辩证法发展的不成熟阶段，用科学例证对它加以说明是必要的，但这样做，仅仅是从维护辩证法而不是从发展辩证法的立场出发的。

这种现象所以延续，是由于当时接受辩证法的环境。在理论上，从维护辩证法的立场来对待辩证法的作法一旦到了极端，就是固守已有的理论框架，把辩证法归结为几个屈指可数的特征，而排斥许多重要的范畴，如“范畴、否定、一般和特殊、异化、人道主义、逻辑原则等基本的哲学问题，好象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⑪从现实的环境来看，社会主义作为最能给人提供

^⑩ 《马克思主义史》第488页。

^⑪ 同上书，第489页。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条件的社会形态，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人的关系暂时还不能占主要地位，以致理想社会首先被设想为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而不是最能体现人的创造、人的关系的社会。因此，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人的关系被忽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哲学上的原因，即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的研究中，就对实践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并从这种观点出发，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反，提出了关于人、人的意识、认识和人类历史的新观点。”^{②0}“这个观念的中心点就是把实践理解为哲学的范畴和人的本质。”^{②1}从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就可以看出，自然主义地理解的辩证法要比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落后得多。

弗兰茨基把实践理解为辩证法的基础，强调辩证法与主体活动、主体本身的关系，从而卷入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争。几乎当代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辩证法的问题在自然界中，即在历史地理解的自然界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②2}但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十分对立的：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黑格尔主义的残余，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辩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初对自然辩证法表示异议的是卢卡奇。卢卡奇认为，停留在一般的、本体论的辩证法观念上，就会轻视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对历史进程作机械论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人实际上消失了，和其它自然生物一样成了一般发展的要素。因此，他认为，应该研究那些活生生的和迫切问题的辩证法，把辩证法仅限于社会历史方面。“那些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分析中产生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恩格斯依据黑格尔的错误先例，把辩证法扩大于认识自然界，

^{②0} 同上书，第 489 页。

^{②1} 同上书，第 53 页。

^{②2} 《人与历史》第 83 页。

但是在这方面,辩证法的具有决定性的定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范畴的基质的历史性变化是它们在思想方面的变化的基础等等)并不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②③}

萨特则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可能确实存在,但必须承认,我们连证明这一点的最小的苗头也没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它直接抓住了一切辩证法的来源,即受人的物质性支配的人的实践)既是任何人能够具有(和确实具有)的关于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异化的经验,也是使人能够把人的历史理解为进程中总体化的改造性的和建设性的方法。”^{②④}

类似的观点还在其他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过。弗兰尼茨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它的产生并不象某些“正统”的辩证论者所说的,是完全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对辩证法的修正。许多西方学者看到自然主义地理解的辩证法在人类生活实践面前表现得苍白无力。他们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辩证法,是由于他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实践的历史的领域。正是这个领域被人们忽视了,辩证法变成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由于这种本体论“把特殊的历史辩证法和人忽视到了这种程度,结果重新出现了对这种本体论的反动(布洛赫、列菲伏尔、萨特)以及把辩证法仅限于历史现实的作法(萨特以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自然辩证法或者是某种未经证实的东西,或者是和现代人的历史的、革命的实践不相干的东西。”^{②⑤}

在强调辩证法与历史、人的实践相联系的意义,上,弗兰尼茨基赞同卢卡奇等人的观点,认为卢卡奇真正领会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天才的思想,即应当把感性、客体、事物当

②③ 格·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柏林版第16页。

②④ 罗·加罗迪,《人的前景》1959年巴黎版第108页。

②⑤ 《马克思主义史》第352页。

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就把存在的实质理解为社会过程,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产物。从而,“存在的本体论的范围被缩小为只是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本身被正确地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而人也被正确地理解为社会历史进程的主体和客体。”^{②6}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作为对自然主义化的辩证法的否定,“作为对那种完全本体论主义的否定,就应该采取一种辩证法的否定形式,至少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形式。”^{②7}

《我们的论题》杂志1963年组织了一次关于辩证法的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怎样理解辩证法这一概念,它是不是认识过程中的方法,或者是认识过程的实质本身?……二、怎样看待自然辩证法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自然辩证法?如果说,辩证规律支配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各个领域,那么,能不能说辩证法的各个不同的表现领域也总是包括人的实践关系,或者说辩证法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历史领域?……三、进步概念与社会的和自然的过程的关系是怎样的?”^{②8}弗兰尼茨基在为这次讨论写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知道,辩证法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是人的东西的问题。”^{②9}人的东西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注重作为实践存在物的人的基本关系、基本利益和基本的哲学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人的问题的实质。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自然界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和发展,而不考虑人的实践在其中的作用,说到底,这种理解是无的放矢。

在实践派那里,实践被理解为人类生活的结构,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因此,实践自然而然地就被看作是辩证法的基础。弗兰尼茨基认为,实践之所以是辩证法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实践的观点体现了创造性的辩证法的实质。在一般的物质基础上对世界作客观的描述,是以往哲学已经做到的事

^{②6} 同上书,第353页。

^{②7} 《人与历史》第78页。

^{②8} 《我们的论题》1963年第9期第1417页。

^{②9} 《人与历史》第78页。

情。创造性的辩证法毋宁说是一种实践的本体论。二、实践关系、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辩证法的主要内容。西方学者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固然有些片面，但不能不说他们在其中突出了辩证法的主要成分。“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中介是实践。实践表明：1.自然始终是历史范畴；2.人的世界通过历史地改变了自然的质料和人的关系建立起来，就是说，人的世界是人的创造；3.感性活动造就了理论活动；4.自然历史现实的改变，伴随着人、人的意识、人的关系的改变过程；5.解开人的神秘的进化的钥匙，就是对作为实践的存在物的人进行分析。”^⑨三、辩证法本身就是实践的、革命的。辩证法在现存事物中发现其不合理性，在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中发现更适合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景。

但是，弗兰尼茨基也看到了卢卡奇等人的失误，认为他们在力图避免在理论中把人等同于自然物的时候走得太远了。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现实领域，其明显的后果是“不必要的和不正确地缩小了哲学分析的领域。”^⑩创造性的辩证法是涉及整个人类实践发展的，而人类实践的领域又是极其广泛的，包括生产的、技术的、实验——科学的和革命的活动等等。把哲学分析的范围局限于历史领域，势必忽略改造自然的实践及其结果，即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以致不能全面地理解辩证法的基础。恩格斯曾说过：“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⑪而且，作为整体，实践自身是包括其结果的，规范化的实践尤其关注实践的结果。按照这种实践观，没有对其结果进行检验的活动，就无法确认其结果对于人类的意義。另外，就自然界本身来说，它在实践中发生变化，成为“人化自然”，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的主客体对立，从而成为统一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界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主体因素，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存

^⑨ 《人与历史》第70页。

^⑩ 《马克思主义史》第352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在物。

因此,片面地强调辩证法的任何一个方面,是同辩证法的涵义不符合的。弗兰尼茨基明确指出,一些人“认为辩证法只能够解释成为我们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另一些人则强调对辩证法应作普遍意义的理解……我则倾向于那些认为不应该对辩证法作狭义理解的人的观点。因为辩证法毕竟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正如哲学是普遍的一样,它是关于怎样理解一切东西的问题的。”^③这样,弗兰尼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便与实践派中的某些人发生分歧。例如,米·坎格尔加就认为:“辩证法仅仅存在于实践的、人的历史中,离开了历史的人的实践,或者在历史的人的实践之外,就没有辩证法,因为在人的活动之外,或者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与人有关的、为了人而产生的并由人来衡量的东西。”^④

从表面上看来,弗兰尼茨基对辩证法作广义理解这个观点,同他赞同卢卡奇等人时所表述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其实,这正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弗兰尼茨基的观点,所以产生关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关键在于对辩证法基础的理解。创造性的辩证法除了实践基础外,还有其一般的物质前提。这不是哲学上的二元论。“我们的思想结构和过程的辩证法,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能是一种单独过程的结果。”^⑤偏执于一般物质前提,就是忽略了人的作用;而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领域,则又是明显地不顾自然物质前提。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获得辩证法基础的正确解释。

弗兰尼茨基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和发展,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先。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某些一般的辩证法因素是确实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事物、现象都是辩证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客观现实的任何个别情况,都能够反映辩证法的许多方面和要素。同样地,我们在分析逻辑和范畴的一般问题时,也不可避

^③ 《马克思和现时代》1963年贝尔格莱德版第597页。

^④ 《反映论若干问题》第38页。

^⑤ 《马克思主义史》第598页。

免地碰到辩证法问题。而这些问题与社会的、历史的辩证法的联系不是很密切的,就是说,我们无法把这样一些问题归结为历史辩证法问题。的确,历史的辩证法确实有一些使它本身成为特殊的辩证法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必须是一切辩证法的前提,正如辩证法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然主义地理解的辩证法一样。因此,应当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统一的人类世界的辩证法的特殊成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成分。如果以为辩证法的基础只是实践,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的因素强加给自然界的运动和运动。这样理解实践,就必然导致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要素。

况且,实践本身也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它除了受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以外,还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实践,作为说明人的基本范畴,如果没有人与周围现实统一的这另一方面,是无法解释的。”^⑥ 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人类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实践中,自然界也使人自然化,变成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一部分。实践主体也只有在与自然界的协调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主体作用。在这里,自然界便有了活动的、积极的、辩证运动的意义。因而,要理解辩证法的基础,就必须看到人与其自然现实的统一性。“存在的一切领域是实在的整体,是对立的渗透,或者说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自身的否定,因而必然通过自身的发展突破那种内在的界限等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存在的一切领域以至历史都有某些共同的辩证的特性。”^⑦

坚持辩证法的一般物质前提,同时强调人的实践作用,这样,弗兰茨基既维护了辩证法的广泛特征,又揭示、发扬了创造性的辩证法的实质。

⑥ 《人与历史》第 82 页。

⑦ 《马克思和现代》第 113 页。

“真正的哲学是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

——霍克海默的晚期思想

[联邦德国]H·贡尼R·林古特^①

霍克海默于1968年为自己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论文重新印行作了序，他在序言中表示，他毕生都信赖叔本华的著作，“我一向喜欢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即每一种真正唯物主义思想所隐含的因素。我第一次认识哲学要归功于叔本华的著作；我和黑格尔及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我要理解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都没有抹去我对叔本华哲学的体验，虽然我与他在政治上是对立的。”^② 政治上的对立指的是叔本华坚决反对1848年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他在遗嘱中规定把部分遗产赠送给阵亡的政府士兵。晚年的霍克海默想克服和叔本华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他把叔本华对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情的惧怕看作“他的时代性的标志，是时代精神不能收买的”^③，他还把叔本华对世界历史的野蛮性的认识同他对社会不公正的永久性的洞察结合起来。

霍克海默认为叔本华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在于，他在纯经验主义面前坚持了古典的二元论，并且“没有把自在的世界，即真正的本质加以神化”^④。霍克海默认为，叔本华就这样和欧洲哲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最固定不变的教条——“本质”的永恒保证了善和完

① H·贡尼和R·林古特均为哲学博士，《明镜》杂志社会科学部编辑。本文是他俩合著的《霍克海默》一书（1983年联邦德国罗沃尔特出版社版）的最后一节，标题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②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13页。

③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53页。

④ 同上书，第256页。

美——决裂了。叔本华的“意志”并不是合理性的冲动，而是维持生命的欲求；世界是意志，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不会静止的、每一次满足后又会重新活跃起来的对健康和享受的欲求”。霍克海默的结论是：“活着的东西和一切生物的不可灭绝的现实性总的来讲就在于此，而不在那些理智总能为追求找到的原因之中。”^⑤ 结果就是：本质不是最高的善，它不会教人应该做什么。同样的，理智，即意识也只是愿望和企求的合理化的工具。不仅如此，还有“理智，即合理化的工具，个人、利益集团和民族借助这种合理化使他们的要求在自己和其他人看来符合到处有效的道德规范，理智的作用就是：它是和自然，和人作斗争的武器。理智是个体以及族类借以进行生存斗争的武器，反抗能把理智激发起来，它也会随着反抗的停止而消失。”^⑥ 霍克海默认为，叔本华的这种悲观主义的自然主义预见到了心理分析的基本观点，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接近现代科学，从而预言了向管理的世界的发展，即向一个适用于结构、而不是适用于人的自我保存的活动的活动的发展。

叔本华是不是把世界设想为意志，意志作为生存欲求和世界的本质只不过是想要得到满足；黑格尔是不是谈到了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就在于想得到自我并从而摆脱一切动机；尼采是不是预先想到了权力意志就是争霸世界的虚无主义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又将以哲学基本学说的名义来进行；海德格尔是不是在工艺学中看到了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等等。所有这一切学说都在追求意志的意志中达到了顶点，而这种意志，海德格尔把它理解为是正在没落的形而上学以及技术世界的标志，而海德格尔的这种理解也是由这种形而上学所决定的。霍克海默认为这种追求意志的意志是不可扬弃的，社会将成为万能的主体，向管理的世界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是必然的。海德格尔则相反，他在迄今没有想到的技术的本质中，在“框架”中，看到了在存在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

^⑤ 同上书，第 257 页。

^⑥ 同上。

成果,这个成果把人提出来了,也就是说,抓住了人和要人从技术上预定和使用可以想象的、同时是可以制造的东西的全部储存。时代的这一命运,即被错误地解释为人的诡计的技术世界,海德格尔认为是可以克服的。1969年,他在生日庆典的致词中说:“虽然我们并不能跳出技术世界;它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必然因素,但是它并没有达到也许可以使人的生存得到拯救的程度。”^⑦而在10年前,他以罕见的乐观主义说:“这个地球上的人还不会灭亡,这是因为人还储存着本来就非常丰富的愿望和能力。”^⑧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命运还在未定之中,他并不象叔本华和晚年的霍克海默一样,已对人的命运下了最后的定义。即使在新兴的世界文明中,技术、科学和工业也不是始终能决定人的生存的。霍克海默则相反,他认为,对技术世界的未来而言,科学不仅会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生产力,而且也会使人准备去从事一种广泛的活动,一切东西,包括作为个体、作为人的正在消失着的工业原子的灵魂,都必须服从这种广泛的活动。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早已现实地指出了这种以适应和合理的适应为目标的内在性了:“叔本华批判地对待那些与实际上正确的东西有冲突的思想和感情,这种实际上正确的东西对他来讲,就象对科学一样,是和真理同一的,只要这真理不涉及到罪恶的生命意志或者那唯一有根有据的形而上学的彼岸,即无。当前,历史向自动化管理的现实的发展,从他那坚定不移的悲观主义的意义来看,是合逻辑的。”^⑨

因此,人类将走完伟大的哲学看到了的、担心过的、在一些内容上已预见到了的道路。霍克海默认为,这条道路通向这样一种人类,它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巧妙的一种,它脱离了精神、理性

⑦ 引自奥托·佩格勒尔,《海德格尔的政治和哲学》1972年弗赖堡版第102页。

⑧ 《马丁·海德格尔——他的故乡曼斯克尔希祝他80寿辰》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3页。

⑨ 霍克海默,《叔本华的现实性》(原始手稿)。

和一切先验的努力,放弃了对“灵魂在此岸和彼岸的天堂式未来所作的异想天开的、有神论的、乌托邦式的或其他的幻想。”^⑩但这样一来,不以纯粹的实用而以合目的的行动、以赢利为目的的仁爱也就消失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以公正的名义放弃自由,但是公正将只意味着物质机会方面的和需求满足方面的,以及匮乏的消除方面的平等。继续存在的就是匮乏,就是痛苦,别人的快乐就是痛苦;就是不公正,不受保护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死亡,驳倒任何一种合理性的死亡;就是虚无,作为否定的幸福而证明存在的荒谬:“虽然承认同情是最高的德行,但个体的生存客观上仍是无关紧要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公正,被折磨者的死亡,犯罪者的快乐等等对惊慌失措的人来讲仍旧是决定性的。叔本华预先指出了人的思维过程,除了实证主义者外,欧洲再无别的思想家能做到这一点。”^⑪

作为对于来自右翼的极权统治的回答,霍克海默谈到了他的信念,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能消灭国家社会主义。然而他还补充说:“但是,我当时就怀疑马克思要求的无产阶级团结最终能导致一个正确的社会。”^⑫团结作为青年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意识,也许作为革命的推动前进的力量,在青年霍克海默那儿也已经被所有人的团结所代替,这是考虑到人的有限性和孤独后作出的结论;霍克海默从未倾向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及修正主义。相反的是,他批评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他一方面把这种分裂归因于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社会党多数派和旧皇帝军队1918年的联盟。在《黄昏》和《极权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苏维埃民主的同情,但同时,早在1940年,他就坚决怀疑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极权和官僚主义倾向,这种怀疑后来变得越来越强烈。霍克海默直到晚年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霍克海默:《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5页。

信念，即一个时代的理念反映了经济基础的现状、关系和发展过程，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理念及其社会联系的形式就反映了万能的交换原则，对商品的崇拜变成了理念的工具化，变成了一切人的关系的物化。^⑬霍克海默坚信这一点，1968年他在《批判理论》的前言中，对此作了很精炼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对理解社会动力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用来说明民族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已经是不够的。”^⑭霍克海默对局限于洞见到社会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拒绝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国家干涉、不但吸收了民族主义的东西而且极权化了这种情况是十分失望的。早在1940年，霍克海默就直截了当地指责斯大林的统治是“最狡猾的党阀统治”^⑮。1961年，他又批判说：“对人类的认识被歪曲为激进的国家崇拜。本世纪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由社会主义本身提供的。国际的革命家们成了民族主义领袖的牺牲品……对人类未来有益的就都是好的。在这一点上，过渡为疯狂是多么容易，而自己的祖国又负有最紧迫的使命。每一种有限的本质（而人就是有限的）都把自己吹嘘为最后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成了嗜血的偶像，而且为此还具有一种恶魔般的改头换面的能力。最近的许多革命的历史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提供了令人咋舌的例子。列宁和他的大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前追求的是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而实际上，他们却为官僚极权政治开辟了道路。在这种统治下，自由并不比过去在沙皇统治下要多。”^⑯

60年代初，霍克海默还没有过渡到他的关于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公正的新辩证法。这个时候，他还坚持康德关于自由和公正统一的观点，那时他就把不能象社会主义创始人希望的那样带来个人的实现的社会主义称为“极权的野蛮”^⑰。1966年，霍克海默

⑬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卷第10页。

⑭ 霍克海默：《极权国家》197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49页。

⑮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264页。

⑯ 同上书，第215页。

提出了他的关于当代及其未来的新理论。他把社会主义含有的极权野蛮统治的扭曲看作时代的普遍特征，认为这种统治把时代驱向新的世界文明、驱向管理的世界。霍克海默在1966年强调，由于适用于一切工业社会的向管理的世界的发展过程的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包含了文化领域崩溃的历史过程并没有使统治解体。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向不再是两个阶级的制度结构过渡，当然并不能把这设想为是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当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的论断，即危机正在加剧被继续证明是对的时候，他们的理论从总体上来看却由于现实而变得陈旧了。在东方国家，一方面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神学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而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似乎是现实的宗教。这种宗教对内和对外都起着操纵工具的作用。”^⑦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关于行动起来争取社会革命的指示，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动力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洞见，就这样成了维持统治的工具，成了国家理性的手段，成了大国政治、结盟思想和非神圣同盟的工具，非神圣同盟在核僵局的思想下重复了古典外交的游戏规则。霍克海默认为，这一切表明全世界处于民族主义的过渡时代，带有一种持久的世界性灾难的危险，但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危险由于新的世界文明的技术结构正在变得极其强大，如果不是被最终加以克服的话，也将是可以阻止的。但是霍克海默还认为，正是这种向世界文明的过渡，而不是向马克思的乌托邦、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已赶不上了，而且不能相应地从概念上对此有所表达。那末社会批判理论在这种完全充分组织起来的世界社会严格的自动化过程和操纵过程的过渡时代能做些什么呢？霍克海默在1966年指出：“早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就可以看到，绝对的控制并不仅出于偶然，而是社会过程的一个标志。技术的完善、交通和联系的扩大、居民的增加，都促使严密地组织起来。这当然遭到了不顾一切的反抗，但反抗本身也被纳入它本

^⑦ 同上书，第237页等。

要加以改变的事物发展过程，表达这种认识并进而帮助使用新的恐怖，当然仍旧是还活着的主体的权利。”^⑱

海德格尔在1970年和理查德·维泽的电视谈话中，把技术世界的社会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结果，是近代主体性的绝对化，这一主体是笛卡尔建立的，从黑格尔以来则变为意志的绝对化，变为追求意志的意志。一种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只要在主客关系的范围内，在思维想象的范围内运动，那么它就不能深入到技术的本质；这就是海德格尔从马克思主义和技术世界的关系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和霍克海默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是相吻合的，尽管他们两人的论证有所不同。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霍克海默和海德格尔的看法是一致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写道：“无家可归成了一种世界命运……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从根本的和重要的意义上，视为人的异化的东西，其根子在于近代人的无家可归性……因为马克思经历了异化，他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之中，因此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见解就比其他所有的历史观都要高出一筹。”^⑲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政治革命的行动理论，但确实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不是通向自由王国的轨道，但确实是社会的动力学，理性的主观化在其中表明自己是个人和社会的异化和物化，霍克海默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意义，然而马克思的概念正在变成一种陈词烂调，霍克海默1966年在纪念保罗·蒂利希的讲话中就是这样说的：“在一个为了管理的目的而完全组织起来的世界中，思想失去了意义。在分界线的这一边，不少思想成了空话和口号，而在那一边，马克思理论的概念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陈词烂调。”^⑳霍克海默1969年在和

⑱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卷第11页等。

⑲ 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说——附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1947年伯尔尼版第87页。

⑳ 霍克海默：《冲动的最后踪迹——保罗·蒂利希的遗嘱》，1966年2月16日的讲演，载1966年4月7日《法兰克福汇报》。

意大利杂志《快报》记者的谈话中，将思想家马克思和别的德国哲学家作了比较，谈到了他的地位。这篇谈话也许最终证明了霍克海默对马克思的拒绝。对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霍克海默的答复是：“只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我承认马克思，当然不包括他的继承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他还没有伟大到必须把他放在康德或黑格尔之前。”^①

晚年的霍克海默认为德国唯心主义者，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接近犹太教的虔诚和犹太教的思想，而他把反犹主义者叔本华看作是接近真正的、也即悲观主义的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接近也是叔本华本人所要求的）。马克斯·霍克海默作为德国犹太人本身的经历就反映在，他是怎样把他青年时代主要的基本的感觉作为犹太宗教和德国哲学之间的传统桥梁和活的痕迹加以反思的：这种基本感觉就是分裂为二之中的统一，这种基本感觉要求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去进行批判和辩证思维，也要求他们走向民族的、爱国的自由主义。霍克海默是这样论述的：“犹太教是我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帝国是我的祖国。”^②基于这种基本感觉，德国犹太教从哲学上总是追求和它的德国兄弟的和解，他认为把自然和精神、过去和未来、德国故乡和精神上的犹太宗教统一起来的东西，肯定是思想上的和解，这种和解已经在解放中得到预示。反过来，晚年霍克海默也在德国哲学中看到了这种和解的倾向，而《启蒙的辩证法》也贯穿着这一犹太教的基调。因此，他就是这样理解从斯宾诺莎而来的黑格尔的思想的，并证明这种思想是反对一直还在流行着的愚蠢的，霍克海默在青年时代对黑格尔既反对又钦佩，对于黑格尔归根到底就是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说法，霍克海默是这样说的：“黑格尔让自然不顾个体的一切痛苦，并借以在人类历史中得到完成，而继续推行斯宾诺莎主义。每一个民族在通向各国人民合理状况的道路上都有自己必然的使命，这条

^① 《和〈快报〉记者的谈话》，1969年2月16日。

^② 蒂洛·科赫编：《德国犹太人思想史》1961年科隆版第256页。

道路就构成了历史的意义。这时，在各个集体的整体范围里一直起作用到自由意识普遍地得到实现的时候的东西，对个体来讲就是优秀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上帝之爱。他还用曾经是德国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意识特点的那种尊严来装饰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别的地方早已是无须赘言的了。对黑格尔的指责越来越喧嚣，说他崇拜普鲁士国家，这种指责总是忽视这样的事实：在那个时候，在德国，普鲁士有着相当进步的机构，而对哲学家黑格尔来说，他更多的是为了自由的建立，而不是为了普鲁士。对他的学说来讲，从政治上实现宗教宣布的一切人的平等和自由的能力是一把尺子，他就用它来衡量各国人民的成熟程度。”^{②③}

这种对成功的崇拜就是局限于经济生产力和经济扩张的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思想，正是这种使俾斯麦帝国具有特色的对成功的崇拜，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使德国人离开了他们的哲学及其对犹太宗教的接近：“精神和追求公正的意志是同一的，在现在这样的世界上，这种意志和现状是对立的。德国人走上崇拜成功的道路就是疏远了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和犹太宗教有着同样的看法，即提出和确立绝对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倒是解释有限和摒弃偶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拯救真的东西，就不在于对它加以认定，而是要洞见到一切显示为真的东西的有限。”^{②④} 康德和黑格尔在实践中看到德国状况的痛苦历史并在理论上洞见到人的事情的痛苦历史的时候，经历了否定的严肃和痛苦，这使康德坚决拒绝理论理性的认识可能性，使黑格尔走上变动的、常常是互相过渡的概念的辩证法，这些概念中没有一个是变成教条和可以信手拈来加以应用的，而犹太宗教则着重从这样一个民族的生存中找出结论，这个民族始终拒绝“承认暴力是真理的根据”。而在这一方面，霍克海默则更进一步说：“这个民族把它所经历的暴力引起的痛苦变成了持久和统一

^{②③} 同上书，第 261 页。

^{②④} 同上书，第 262 页。

的因素，不公正并没有促成解体……而是变成了一种经验。痛苦和希望^⑲在犹太教里成了不可分离的东西。”^⑳

痛苦和希望的统一是作为统一的分裂，它决定了犹太人的生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里，法律和迫害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统一分裂了，所以它得到了维护，而分裂就是痛苦，痛苦就是经历并认识不公正，它使希望存在下来。如果思想认识了不公正，那么真理也就呈现在否定之中了。说出真理的人消失了，因为他的生存被移交给了历史上的偶像，但是他的思想则在追求公正的意志中克服了现实的权力要求；只有在否定中，思想才会得胜，无权的真理才会战胜现实。

黑格尔的理论方法在晚年的霍克海默看来就象是犹太教法典里的历史，这是这样一种理论方法，它决不会在达到目标的时候停顿下来，也不会^㉑在论述自己的立场时提供打开整体的秘密的钥匙，这是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在“圆圈中循环”^㉒，在这种转圈式的循环中，哲学总是绕着真理旋转，但从来也不能确定、从来也不能达到和占有真理，同样的，在晚年霍克海默看来，犹太宗教和传统也是德国唯心主义一再地只是否定地讲到的、但从未肯定地讲出来的真理的见证：“犹太人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迫害还保持了他们的学说，个人幸福的丧失与个人永远受罚，和学说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犹太人在国家消失以后仍忠于这个国家曾强制推行的法律，其原因是他们抱有各民族的公正之士在将来都会有的希望，这是一个矛盾，是这个矛盾把他们和德国的伟大哲学、甚至和一切普遍地和被嘲笑地叫做唯心主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㉓霍克海默看到，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在当代被以新的方式提了出来，也就是说不再用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来加以证明。这种被最近的历史残酷地摧毁了的关系，即使在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时代也不

^⑲ 同上书，第262页。

^⑳ 黑格尔：《哲学全书》1921年莱比锡版第15节。

^㉑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312页。

再预示着会出现一种奋起反抗恶的现状的共同意志。于是霍克海默就讲到犹太人和真正基督徒的团结，因为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在全面野蛮的时代也遭受了犹太人一再遭受的恐怖。

在晚年霍克海默看来，是虔诚的基督徒及其基督教，而不是交纳教堂税的人组成的基督教界，才是一种新的可能会受迫害的、恐怖会加害于他们的少数派。霍克海默以此只是想证明他早已认定是基督教的历史功绩的东西，即只是想证明他在《黯然失色的理性》中所讲的和在阿多尔诺影响下的《启蒙的辩证法》不一致的地方，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同时写成的。《启蒙的辩证法》说，耶稣基督是“神化的巫师”^{②⑧}，而老年霍克海默在一次关于保罗·蒂利希的记者谈话中却说：“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我曾夸奖过基督教，当然是在它把这样的人尊为榜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人出于爱而献身于痛苦和受苦的人。我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说出我的赞赏的话的。至于这个受苦的人是不是上帝的问题，我的疑惑确实比蒂利希要少些。”^{②⑨}《启蒙的辩证法》的说法是：“人的自我反映在绝对的身上，上帝通过基督而人化，这基本上是假的”^{③①}，而霍克海默在《黯然失色的理性》中则说：“灵魂的价值由于平等的思想而升高，这种平等的思想就包含在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以及耶稣为全人类赎罪而牺牲这样的事情中……人的自我和有限的自然在基督教中并不象在严格的希伯来人的一神论中那样是互相同一的。因为基督是无限的真理和有限的人的生存之间的中介人，抬高灵魂，贬斥自然的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最终就不得不向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让步，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是调和理想世界和经验主义的一种伟大的方案。在和相互竞争的世界宗教以及古希腊道德哲学的尖锐对立中，基督教凝聚了一种拒绝的能力，即用高于任何

②⑧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67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59页。

②⑨ 见《保罗·蒂利希的事业和著作——一本纪念册》，斯图加特版第21页。

③①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59页。

一种法律的全面的爱来克制本能。”^①

全面的爱比法律更高,它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在对上帝的拯救性的爱的信任中不是把爱体验为一种本能,而是把爱体验为一种博爱,正是这种全面的爱一再使霍克海默相信基督教,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怜悯之爱是出于对自己的罪责的意识,并在真正虔诚者的生活中揭示了“今天成为问题的意义”^②。晚年的霍克海默最后认为这一意义完全可以从宗教上来加以解释,他把独立见解、自由、自我规定对作为现状的他物取顺从态度等,明确地称之为是一个真正虔诚者生活中的“基督教因素”^③,这个人在生活中应该讲博爱、应该期望上帝的拯救怜悯。但是,对于这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他物的顺从具有重要意义的则是博爱本身,而霍克海默却并不想在内容上对它作更详细的说明,但对霍克海默来讲,它却同时就是受严重威胁的“最高自由”^④。晚年的霍克海默终于在圣经的话中找到了对作为他物的命令、作为合理行为准绳的博爱的证明,他在1966年说:“和神学的最后踪迹一起,应该尊重、甚至热爱他人的思想失去了逻辑的基础。”^⑤这里所说的神学当然不是霍克海默认为不值一提的实证教义学,而是“对世界是现象,世界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最终的东西的意识”^⑥。这种意识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渴求,“是渴求杀人凶手不再能战胜无辜的牺牲者。”^⑦

霍克海默在晚年一再讲到这种渴求。这种渴求表达了拯救失望者因为矛盾而绝望了的希望,阿多尔诺早在1935年致霍克海默的信中就已把这种希望设想为批判理论的基本意向。如果说霍克

①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130页等。

② 霍克海默,《叔本华的现实性》(原始手稿)。

③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343页。

④ 同上,第346页。

⑤ 霍克海默,《神学的最后踪迹——保罗·蒂利希的遗嘱》,1966年2月16日的讲演,载1966年4月7日《法兰克福汇报》。

⑥ 霍克海默,《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第61页。

⑦ 同上书,第62页。

海默和阿多尔诺在辩证法中确实谈到了作为世俗化了的犹太一神论的批判理论的话，那么霍克海默在晚年则强调：“如果人们不想扬弃宗教的话，那么宗教是无法世俗化的”^③，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他谈到了批判地否定的哲学思维必然需要神学的推动，例如在《论人的概念》中，他就是这样说的：“因为哲学反映的是历史关系，所以它就表达了这些事件的否定、残酷和不公正，在这一方面它就和神学相近了”^④，在关于保罗·蒂利希的谈话中，霍克海默承认：“我相信，没有一种我表示赞赏的哲学会不具有神学因素，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必须被解释为相对物的话，我们就必须作这样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康德和叔本华是很清楚的，而我认为，不清楚这一点的哲学劳作就不是哲学劳作。”^⑤

因此，神学就是关于人的世界的必然相对性的知识，而霍克海默甚至把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关于解脱的形而上学及生命意志消融在无中的思想都加以相对化了，这是因为他把无的概念理解为人的、从不涉及绝对及其真理的规定。相对是以绝对为前提的，而这样一来，霍克海默的隐蔽的神学（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否定神学，更不是教条主义的实证神学）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证明（在伯特兰·罗素看来，这种证明在逻辑上是无意义的）的意义上来看，就可能会遭到误解：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偶然的，因此并不是必然的，是短暂的，是充满了被动和痛苦的，“因此”就必须有一种绝对地必然永恒的东西，即有一种不带痛苦和被动性的纯粹行为。这种论据对霍克海默来讲是生疏的。他在《叔本华的现实性》中甚至谈到了“倾向于有神论的证明的贫乏”，并断定：“人的思维能处理感觉到的事实，但不能超越它们，除非是作为从神学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对这一世界上的另一种东西的渴求。”^⑥因

^③ 同上书，第 68 页。

^④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 201 页。

^⑤ 见《保罗·蒂利希的事业和著作——一本纪念册》斯图加特版第 16 页。

^⑥ 霍克海默：《叔本华的现实性》（原始手稿）。

此,实证主义的思想就是正确的,但不是真的;对真东西的渴求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也超越了这种思想,它对公正的建立是有效的,但不再是在世俗化的宗教意义上,即不再是正统的、自由的犹太教对人类历史在救世主出现时发生改变的期待。就象宗教是关于绝对、关于痛苦和短暂世界是绝对的思想一样,就象绝望了的渴求在宗教中表示这一绝对能不顾任何可能的阻碍而拯救人一样,真理(在谈到尼采的辩证法中也已讲到过这一点了^②)从强调的意义上来看,和上帝的存在是不可分的,因此绝望的实证主义关于上帝死了的神学,在霍克海默看来是荒唐无稽的,乃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教条:“真理,作为被强调的,超越人的错误而存在下来的真理,是不能直截了当地和有神论分开来的。否则实证主义就是有效的,而最新的神学尽管和它有着各种矛盾,但还是和它联系在一起。要拯救一种没有上帝的绝对意义乃是一种虚荣心。进步的新教神学家还能使绝望者自称基督徒,他们就这样给教义加了括号,没有教义的力量,他们自己的话就站不住脚。永恒的真理也和上帝一起死了。”^③

就象真理是不能实证主义地把握、而只有在痕迹和残片中、在世界的分裂中、在人的分裂中、在思维的根本否定性中才能长久存在下去一样,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和神学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也是不能用存在主义的主观主义者的白白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主观主义者教条主义地认为,如果他们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意义,那么与此相反的意义就是真理的虚无主义,而批判的辩证理论的语言就象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可以解释这种对立,这种语言而且还可以用来表达叔本华思想中对绝对真理的生动活泼的热情:“他的哲学完美地讲出了今天青年的预感:没有一个政权是不抛弃真理的,真理甚至自在地带有无权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对的,因为并没有一个能把真理隐藏起来或者从它

^② 参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01页。

^③ 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277页。

那儿推导出来的绝对。神学形而上学反对实证主义也是对的，因为语言的每一句话只能提出一种不可能的要求，不仅是要求预期的作用、要求成功，就象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而且要求真正意义的真理，而不论讲话的人是否想到了这一点。没有想到真理，并因而想不到真理所隐含的东西，就不会知道它的对立面，即人的孤独，因此，真正的哲学就是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甚至比悲哀还要悲哀，而没有悲哀也就没有幸福。”^④

(任立译)

^④ 同上书，第 263 页等。

人类思维与活动的本体论基础

[匈] 卢卡奇·捷尔吉^①

一

如果我们想要在一次会议上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最一般原理进行哪怕是表面的分类,我们就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的现状进行批判性考察;其二,我们至少应该说清楚新本体论的基本结构。为了集中解决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哪怕是简单的说明。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实证主义(较旧的认识论倾向的更激进的形式,认为任何从本体论上提出问题都是非科学的)占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倾向不仅支配着哲学领域,而且支配着实践领域。一旦人们认真地分析当代政治、军事和经济倾向在理论上的主导思想,就会看到,这些倾向全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新实证主义思想的支配。新实证主义的近乎无限权力基于以下一点:一旦与现实的对立造成公开的危机,就会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以及在我们的哲学研究方法中引起大革命。既然我们刚刚处于这个过程的开端,那么,这些话该是足够了。

^① 本文是作者为1968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14届国际哲学大会准备的发言稿。这里根据欧·朱斯的英译文译出。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了一定的处理,他认为:“卢卡奇的术语几乎总是很冗长,译者只得把它们重新造句……或者干脆把它们删掉,以期改善卢卡奇的文体,这样就去掉了一些人认为难以捉摸的东西。”不过,朱斯强调指出:他没有改变卢卡奇的基本术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删去了一些他认为是重复的段落,用他自己的话简述了这些段落的要点,加了括号,并印成黑体字。——译者注

在我们的文章中，我们不打算讨论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本体论的大胆研究。我们只是想说明，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要举出这个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如萨特）最近的发展，至少可以说明存在的问题及其方向。

这个问题表现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我们都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很少被作为本体论来研究。然而，本文的任务是指出马克思的决定性哲学研究就是要克服黑格尔的逻辑—哲学唯心主义，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明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本体论概念。黑格尔的作用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制订了被看作历史的本体论，它与各种宗教本体论相反，是从“下界”演化出来的，从最简单的[现象]开始，展示了必然向人类文化最复杂的对象化发展的历史。显然，他要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及其产物，这是黑格尔的特点；因而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创造者出现的。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从黑格尔的本体论中排除了历史进化性质的一切逻辑演绎的和目的论的因素。通过这种唯物主义的“纠正”，原初的（开端的）综合作为过程的动因也必须消失。在马克思那里，起点既不象古代唯物主义那样是原子，也不象黑格尔学说那样是抽象存在本身。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本体论的起点。对马克思来说，存在实体必须是客观的（即客体），同时也是具体总体的能动的和被动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有两个基本结论：首先，存在的总体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其次，范畴不是表述存在的某种东西或变化着的东西；它们也不是构成物质的（观念的）原则。它们不过是物质本身的能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存在的形式，实存的规定”。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但人们往往以旧唯物主义的精神解释它，这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轻视意识的重要性，只重视物质存在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只限于说明，马克思把意识理解为物质的本体论发展的后期产物。当然，如果我们按照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本体论结构，或者按照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

的意识概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会有前面这样的印象。另一方面,按照唯物主义的发展哲学,后期产物具有的本体论重要性一定不会小些。意识反映现实,并在此基础上使物质的改造作用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并非象那些过分教条地解释这个理论的人那样,把它看作一个弱点。相反地,这个特征证明了意识的现实力量。

二

这里,我们可以转来专门研究社会存在本体论了。不过,如果我们不考虑社会存在发源于有机存在,而有机存在的实存和进一步发展又依靠无机元素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社会存在的特性。科学正开始揭示一种存在方式向另一存在方式转变的预备阶段。那些从原理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范畴,即与较低级的存在形式不同的较复杂的存在形式的范畴,已经由科学发现了:与简单地变化(或者变成别的某种东西)不同的生命的再生产;与单纯被动地适应不同,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有意识地适应环境。同样十分清楚的是,较简单的存在形式通过飞跃而同真实产生的较复杂的形式分离,不管有多少中介范畴;这种存在在质上是新的东西,它的产生决不能简单地从简单形式“演绎”出来。

每一飞跃都伴随着新存在物的产生。然而一种新质的东西的产生看起来往往只是原来那种存在物(它使得有可能变成新的功能范畴)的反应方式的改变。这种新的特征实际上构成了正在出现的存在物的新颖性。我们来看一下光的情况。光对植物有一种纯粹物理的和化学的作用(甚至在这个水平上引起生命的特殊表现),而对高等动物来说,光使它们对环境产生特殊的生物反应。

因此,在有机界中,再生产过程采取了符合其特殊本质的形式,并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然而,这决不能否定本体论根源的踪迹。虽然我们不能对这些复杂问题作哪怕是简要的论述,但我们想指出,有机界的再生产过程(按其本来意义,它总是一种明

显生物学的生成)的高度发展,借助于感性知觉,也形成一种意识;在这个层次,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副现象,是有效行使功能的高级器官。

有机界再生产过程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才会有作为一种新存在物的动态的和构成的基础的劳动出现。这里我们又必须不谈无数纯粹属于最初阶段、同时是绝境的劳动表现形式,尽管事实是:不仅从其中曾演化出可以说是劳动的东西,而且随劳动而来的是必然的进化,即劳动分工。劳动的这些后来阶段,由于受到种的生物变异的限制,不包含向存在物的新形式发展的动因;它们保持着停滞的稳定性;它们是进化的绝境。

劳动的本质恰恰在于生物反抗环境限制的生物斗争。构成分离的基本要素的,不是生产物的完美,而是意识的作用;这里,意识不再是生物再生产的单纯的副现象,因为马克思说过,生产物是一种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想象中观念地存在的结果。

看来也许令人奇怪,正是在划分有机界的物质存在同社会存在方面,我们认为意识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人们不应忘记,只有当意识起能动作用时,我们这里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自由和必然)才获得现实的意义,即本体论的意义。只要意识没有成为有效的本体论力量,[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就根本不会发生。的确,凡是意识有效地[客观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地方,结果都必定包含这些对立的要素。

我们可以正确地把劳动者即通过劳动变成了人的动物称作反应的存在物。毫无疑问,一切劳动都是作为满足需要的解决手段出现的。然而,以为这里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我们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增多地以种种问题来表达我们的需要,并确定满足它们的有效手段,我们才成为反应的存在物。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我们通过各种中介为我们的活动奠定基础,扩大它。因此,支配这种活动的意识的产物不仅是回答,而且是问题。不过回答在这个运动着的复合物中从本体论上不失为

第一位的东西。作为个人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动力的复杂的物质需要,真正推动了最初的劳动,而且,一切中介只有在它们满足这种物质需要的范围内才是本体论的。

(……从我们的反应中产生的连锁反应改变着我们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并通过自然力的释放和开发使我们的能力得到发挥。)

劳动和劳动者发展的可能性在本体论上是由劳动本身提供的。如果我们在劳动的本体论特征上加进能动地和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与被动地适应它不同)的结果,那么,劳动就不仅成为社会存在的特点得以表现的手段,而且从本体论上说,会成为这种新存在的模式。

我们对劳动的功能越观察,这个特征(即劳动作为环境的模式和改造者)就越清楚。劳动是由那些推动因果系列的目的论设定构成的。对事实的这种简单陈述排除了千年的本体论偏见。因果性被看成就是自发支配一切存在向其共同表现转化的规律,相反地,目的论始终是一种在意识中设定取向的方式。这种目的论只是使因果系列按特定方向运动。以前的哲学并不认为目的论的设定是社会存在特有的特征,因此,它们不得不一方面发明一个超验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发明一种能造成目的论联系——将会与自然界和社会中具有目的论性质的发展相一致的联系——的特殊有效力量。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的双重方面;虽然在一个已经成为真正集体的社会中,大多数活动(它们的总体构成社会的全部功能)原初都是目的论的,但它们的现实存在——不论这些活动是孤立的还是形成一个总体——则在于因果联系,后者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目的论的。

如果我们把劳动看作社会实践的模式,那么,任何这样的实践本身都把这种对立统一起来。一方面,这种实践在于作出抉择性

的决定,因为当行动时,一切个人都有行动或放弃行动的选择。因此,每个社会的行动都产生于对未来的目的论设定的选择。社会必然性本身唯有在个人经常受到无名的压力,因而被迫沿着特定方向实现他们的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对这种情况正确地作了如下的描述:人们迫于环境,“在死亡的威胁下”,按一定的方式行动。不过人们终究不得不自己去行动,哪怕这样做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初衷。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所有现实的复杂问题都可以从我们以前常称作自由的那些必然的情况(较复杂的问题则从较复杂的情况)中推出来。我们可以在不超出本来意义的劳动范围谈一下价值和义务这两个范畴。自然界并没有这两个范畴。有机界中发生的从存在的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显然与价值观毫无关系。在有机界中,再生产过程从本体论上说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即使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适应],然而从本体论的观点看来,其中任何一种都不会超出单纯变形的界限。对于劳动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一般地说,我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方式,明确区分客体的自在的存在与客体的为人的存在,而这只是认识过程中的思想。但是,在劳动中,劳动产品的为人的存在本身实现了它的客观本体论特性,并且恰好成了产品(在正确地主题化了的时候)能够赖以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那种存在。正是这样,产品成为有价值的(不然,就是无价值的)。只有在为人的存在实际上成了一个客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的较高层次,这些客体会采取观念的形式,这个事实并不排除这种本体论起源的根本意义。

义务的情况也是如此。义务指人的那些由社会目的(不仅仅由人的单纯自然的或自发的爱好)决定的态度。即使我们把这种动态结构变成纯观念的领域,我们在这里也看不到决定性的本体论的变化。(卢卡奇在这里强调的是本体论方法与认识论方法的区别。认识论方法不仅不能看到较高的实现过程的基础形式,或

指出从最初的思想观点发展到后来思想观点的途径，而且基础的和高级的本体论形式从认识论观点看来则表现为矛盾。)

从劳动主体的观点看一下劳动过程的总体，很清楚，虽然主体有意识地实现目的论的设定，但他决不可能对其活动的一切条件都估量到，因而也决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后果。当然，这不妨碍主体行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不得不冒着死亡的危险行动，虽然他们意识到只能够控制环境的很小一部分。

这种看来是绝境的情况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劳动的不断完善的这种内在辩证法拓宽了劳动的范围，并导致更细的分工。)另一方面，在这个发展过程，劳动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无法解决；也就是说，不可能认识[作决定时必须认识的]一切环境。与劳动发展相应，劳动的这种本体论特征在我们身上唤起对超验的现实的体验，于是我们试图支配它的未知的力量，并使它为我所用。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去讨论作为这种情况之必然结果的各种形式的巫术的和宗教的信仰。不过，我们还是提到它们，虽然它们仅仅是意识形态表现的根源之一。我们之所以提到它们，还有另外的原因，即劳动不仅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客观的本体论模式，而且，在上述场合是神圣创造的直接模式和由全知造物主的目的(Telos)产生的现实的直接模式。

劳动是有意识的设定，因而是以关于目的和手段的具体知识为前提，即使这种知识还不完全。如前所述，发展和改进是劳动的本质的和本体论的特征；也就是，劳动如何使自身完善，或者如何产生更高级的社会结构。也许，这种衍进的最重要的方面在预备劳动向独立状态发展中可以得到证明，而这一点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劳动中的目的和手段相分离的知识联系在一起。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最初是这个劳动预备过程的各个部分和要素。这些部分在没有完全丧失它们的最初功能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这些科学的普遍性和独立性程度是与劳动的普遍性和独立性成正比的。

这种衍进已经是一种较高的分工形式。但是，它仍然只是劳动发展的最初结果。甚至在分工充分发达以前，在人们只是采集必需品的时期这种现象就已经以某种方式(如狩猎)出现了。

我们这里应该注意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新的目的论设定形式的出现。任务不再是按照人们的计划去耕种一块土地[ein Stück Natur]，而是推动一个人(或许多人)按照事先拟定的方式去完成目的论设定[计划]。虽然一项工作可能与劳动分工的特征十分不同，但它已经能够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而且必须找到手段来保证在准备和完成劳动中计划的统一。因此，这些新的目的论设定[有目的的活动]必须与分工同时有成效，而且仍然是任何分工中不可或缺的手段。随着更高的社会衍进和利益冲突的阶级的产生，这些目的论设定变成了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基础。因为意识形态为较发达的生产制度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冲突提供了框架；这些意识形态结构使我们既能够意识到这些冲突，又能同它们斗争。

社会生活充满这类冲突。它们从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并在个人劳动中得到解决的冲突，扩展到人类至今在社会大变动中一直尽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到处都基本上显示同样的倾向：正象认识自然过程以便有效地发展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变换，对劳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样，关于人性以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定知识对于使我们能迅速反应，以便完成预想的目的论设定，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德、传统、习惯和神话最初是怎样从起源于生活需要的知识中产生的，后来又如何成了理性的认识方法(也就是科学)，用方坦纳的话来说，这些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指出，那些为影响人同自然变换而形成的科学，比起那些旨在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科学来，更易于同作为其基础的目的论设定分离开来。在新一科学中，目的与认识论基础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但这种评价决不能使我们夸大一致性与绝对差异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其中存在的共同性与差异是同时出现的。它们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历

史辩证法中才能得到解决。

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社会-本体论的基础。每一社会事件都产生于个人的目的论设定，但本身却具有纯粹因果关系的性质。当然，对所有社会过程来说目的论的发生都有重要的结果。一方面，客体同它们的所有结果一起出现，而这些结果是单单自然本身永远不会生产出来的。例如，想想车轮，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地说明了上述状况。另一方面，每一社会都按必然性不再具有自发的机械的作用这种方式发展；它的典型现象总是变成一种激励、强制、迫使人们作出或避免作出特定的目的论决定的更强烈的方式。

社会的一般总过程是一个因果性过程，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律，但没有特殊的定向。甚至在人们或群体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的地方，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往往同原来的打算有差距。（人们不要忘了，古代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社会基础，并引起类似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那种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等等。）目的论设定与其因果性结果之间的这种内在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参与的加强而增大。当然，这种状况同样应该按照它的具体矛盾来理解。某种重大的经济事件（例如，1929年的危机）可能作为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出现。但是历史证明，即使是在最大的变动中（例如大革命），列宁称作主观因素的东西也有更重大的意义。目的性与其结果之间的差异表现了物质要素的真正优势和这些要素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倾向。不过，这并不是说物质要素的这种优势在任何场合都能没有阻力或约束地产生自己的结果。从人对这种影响的反应中产生的主观因素，有时表现为缓和的因素，有时则表现为决定性因素。

三

我们曾试图说明，社会存在中决定性的范畴以及它们的相互

关系怎样已经在劳动中产生。要想通过一次会议哪怕是简略地说明从劳动逐渐上升到社会总体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省略掉,例如,从实用到交换价值以及从交换价值到货币等等这样重要的转化。)

[……]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马克思著作中他的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因而过去经常加以赞扬和谴责的经济必然性是什么。从一开始,人们必须强调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强调在这里必然性是毫无疑问的,虽然马克思本人在反驳唯心主义时使用过这类术语。我们已经强调过根本的**本体论基础**:因果性通过目的论的决定(选择在这里起作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的实证知识在这方面必然具有基本上事后的特性。当然,总的趋向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在具体上,这些趋向以不规则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致我们大部分时间不可能先获得关于它们的真正特征的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最尖端复杂的社会产品这样被认识,即我们能够看到短暂时期内采取什么方向。因此,这样的趋向只能在后来才能理解;社会的见识、努力、预见等等——这一切对于揭示这些趋向决不是不重要的——也只有后来才能得到证实或否定。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经济发展中下面三种趋向,尽管它们往往很不规则,而且不受作为目的论设定的基础的意志和知识的支配,但显然实现了。

第一,维持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在不断地减少。今天,这种趋向可说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了。

第二,再生产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社会化。当马克思说“自然的范围”不断“缩小”的时候,他指的是:一方面,人的(因此是社会的)生活仍然永远以自然过程为基础;另一方面,在生产和产品中纯粹自然要素的量的和质的部分不断减少;而且人的再生产的一切决定性因素(让我们想想营养和性欲这些自然功能)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方面,并且在本质上不断被它们改造。

[第三,卢卡奇提到了日益复杂的社会联系。]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碰到了社会存在的外部变化和内部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决定性的重要的趋向。通过这些变化，社会存在获得特定的结构；人从自然存在变为人类的人，从相对高度发达的动物的种变为人的种，变为人类。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因果关系的产物。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目的性。因此，它的更高度的发展包含着甚至更大的和更基本的矛盾的展开。虽然这种进步构成了人类活动的总体，但决不能使它在目的论意义上完全实现；因此，这些最初的、美好的但在经济上受限制的实现过程又会不断受到干扰；这就是客观经济进步总是以新的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因。这样，似乎无法解决的阶级对立在原始公社中出现；这就解释了最丑恶形式的非人行动何以也是这种进步的结果。在早期，奴隶制比同类相食要进步；同样，今天人类异化的普遍化是另一种变化即经济发展的征兆，这种变化想要使我们对劳动的关系革命化。

个体已经是存在的自然范畴，类也一样。有机存在的这两极只有在社会存在中才能同时使自己上升为人的个人和人的类，并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社会中的个人和类。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甚至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批判，对费尔巴哈来说，仅仅存在孤立的个人，而在另一极则是把许多个人天然地结合起来的不说话的类。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历史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任务是要揭示在总体发展中表现的发生、发展和矛盾。那么必须指出，作为生产者同时也作为社会的产物的人在人性方面取得比单纯成为抽象的类的标本更多的东西。在这种本体论水平上——更加发达的社会存在所达到的水平——类不再是单纯的普遍性（其实例仍然盲目的隶属于它）；相反，它们已经上升到它们有了更有意义、更明晰的声音的高度；它们变成意识到属于人类的个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综合体。

四

马克思作为研究这种存在和生成的理论家，从历史发展中得出所有结论。他说明，虽然人们通过劳动把自身创造为人，但到今天为止，历史还只是人类的前史。真正的历史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才能开始。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关于实现一种设计出来的状态的乌托邦式推测的预告；相反，共产主义开始之际，就是真正的人的力量得到发挥之时，这种力量至今一直被发展激发，并且作为在形成人的过程中的重要成果再生产出来；人的这些力量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甚至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切是作为人们自己的活动的结果由人们自己取得的。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下进行创造。”这里的意思跟早先所表达的话的意思一样：人是反应的存在物。这个定义说明了社会存在中固有的具有各种矛盾的自由与必然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这种现象以及在设定及其结果中表现出来的因果性和强制已经在劳动中或者在目的论决定（和其中包含的选择）的不可分割的、矛盾的统一中看到。这是一种在人的活动的所有社会的、个人的领域中不断重复并采取了越来越发达和直接的形式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把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说成自由王国，而这种自由王国“只能在作为其基础的必然王国中发展起来”。（如前所述，这个必然王国包含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再生产和客观的发展趋势。）

自由王国依赖于其社会—物质基础，即依赖于经济的必然王国，表明人类的自由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他自己的活动的结果。自由和它的可能性既不是某种由自然现成地赋予的东西，也不是“上天”的恩赐；说它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或者某种有着神秘起源的东西都同样是错误的。自由毋宁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现实

中这种活动产生的结果与预想的不同，但它有效地拓宽了自由的可能性王国。因而，一方面，自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增加了选择的数量；另一方面，它由于增加了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任务而扩展了人的能力。当然，所有这一切还是属于“必然王国。”

劳动过程的发展以及活动领域的拓宽还有其他间接后果：人的个性的产生和发展。这需要能力的增长作为它的必要基础；不过人的个性决不是这种增长的简单的和直接的结果；相反，它们的发展历史表明，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但当对立达到较高阶段时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今天，似乎能力的日益差异和发展成了人的个性的形成的直接障碍，成了人的个性的异化的媒介。

人即使处于最原始的劳动水平也不再是类的不说话的成员。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达到了一个类似纯粹自在的阶段，即能动的意识发现了受始终存在的经济因素约束的社会联系。尽管社会交往有很大进步，而且拓宽了范围，人类的一般意识还没有克服个人和类的始终存在的状况的特殊性。

然而，高度发达的类的观念从来没有从历史的日程表上完全消失。马克思把自由王国定义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力量的发挥”；因此，由于这些力量的内容有价值，它们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可能是正当的目的。显然，这种高度发达的类是以必然王国——如此繁重苛求以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从没遇到类似的王国——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当劳动已经完全受人类支配的时候，只有当劳动已经有可能“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只有当人类已经超越了自身再生产的各种约束的时候，才会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活动扫清社会道路。

“扫清道路”意味着：获得必要的物质条件；创造一种使自我能够自由地施展活动的社会环境（及其种种可能）。这两方面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前一方面必然是发展的结果，后一方面是正确的应用这些必然成就的与人相称的结果。自由本身不能纯粹是不可避免

免的过程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它施展的全部条件在这种发展中也只获得实现的可能性。

因此，这里不可能存在乌托邦的问题。首先，因为它的实现的某些现实可能性是由必然过程造成的。我们并没有徒然强调在原始劳动形式中已经显而易见的通过选择的自由表现形式。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获取我们的自由。我们能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已经包含自由的因素，作为它的必要组成部分。

不过，还有更加攸关的问题。如果这个因素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没有不断地浮现出来，而且本身没有保持不断的连续线，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大变动中起着主体因素的作用。但是，本身充满矛盾的不平衡发展总有这样的结果：目的论设定的结果由于它们的纯粹因果性质，在前进的每一步中都作为进步与退步的矛盾的统一而产生。这与意识形态一起不仅会上升为意识（往往上升为前意识）——并且适应各个时代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通过斗争来解决——而且会应用于社会或活的个体的总体，以及应用于作为寻求自己真正道路的个人[Persönlichkeit]的个体。这个关于人类活动世界的至今还是零碎的世界图式（它值得而且应该被看作目的本身）在重要的个人表现中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时被认为是划时代活动的实际创新消失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另外一些没有实际价值、往往似乎被宣告死亡的创新却留存下来，而且持久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最优秀人物——他们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能够前进一步，以求真正变成人——的意识保证它的表现具有持久性，尽管它的创新还大成问题。〔卢卡奇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牢不可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人类不断完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大部分意识形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保存和发展类本身服务。它们总是适应那些具体的和当前的东西；它们被用来同各种各样的现实危险作斗争。

只有伟大的哲学和伟大的艺术（以及模范的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才会在类本身方面起作用；只有它们的范例才会不受强制地在人的记忆中保留下来。只有这样的资料才会被汇集起来，作为我们为达到自由王国在精神上作准备的条件。首先，这里的问题在于，社会和个人都否定那些威胁这个日益人性化过程的趋向。青年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拥有”范畴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主要威胁。马克思以迫使人的感性变得理论化的角度设想了人为自由而斗争的顶峰，不是纯粹偶然的。除了伟大的哲学家以外，莎士比亚和伟大的悲剧诗人在马克思的理智发展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念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这肯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的。（同样，列宁对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的欣赏也不是偶然的。）这些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经典作家与后来那些总是容易受摆布的追随者不同，他们从不忽视自由王国中的特殊类型的实现。当然，他们同样清楚知道必然王国的根本作用。

今天，在试图评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时，必须重申〔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对社会存在的本质与构成来说，物质因素的第一性是与对以下事实的认识分不开的，即关于现实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当今经常地只谈〔存在的〕客体特性和主体特性这种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李惠斌译 詹汝霖校）

敬告读者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原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从1978年创刊至今,共出五十八辑。它得到学术界和其他各界读者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谨此深表谢意。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本刊将于1990年起改刊。关于新刊物的名称和宗旨、文章的内容和所设的栏目等,不久在报刊上或邮购订单中敬告。请读者密切注意。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

1989年11月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7年至1989年(第47—58辑)总目录

马列新文献

马克思的手稿[《资本论》第一版的补充和修改

(1871年12月—1872年1月)]……裘挹红译(89.1—2)

附:关于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张钟朴(89.1)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

安人村社》一书摘要……马克思(87.1—4)

新发现的卡尔·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的

书信……李华译(87.1)

马克思致格·莱茵兰德德尔……周亮勋译(88.2)

马克思致某书商……周亮勋译(88.2)

新发现的恩格斯及其父亲的两封家信……王竞译(88.3)

恩格斯一封未发表的信的草稿(1888年)……张慧文译(88.4)

列宁致约·彼·戈尔登贝格……项国兰译(89.3)

列宁致卡·亚·库利戈夫斯基([1919年]8月13日)

……何宏江译(88.1)

附:1919年的信……[苏]尤·阿米安托夫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民主德国〕恩·施米特等(89.2—4)

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哲学共产主义……赵仲英(88.4)

“真理的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真理”

——论马克思从批判的哲学到对政治的批判的发展

-〔民主德国〕威·舒芬豪威尔(88.2)
-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命运王 东 孙承叔(88.1)
- 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它的形成、内容及其在
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民主德国〕汉·德罗拉等(87.1)
- 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内容和功能
.....吴达琼、刘焯星译(87.2)
- 异化概念在目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中的功能
.....〔民主德国〕克·梅尔茨
- 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异化观念的歪曲
.....〔苏〕博·别索诺夫
- 卡尔·马克思学说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以及我们
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苏〕伊·谢·纳尔斯基
- 异化是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的表现.....〔民主德国〕哈·施里瓦
- 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克服异化和隐蔽性.....〔民主德国〕汉·卢夫持
- 政治经济学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
.....〔民主德国〕汉·瓦格纳
- 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民主德国〕罗·鲍威尔曼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劳动和
作为异化劳动的劳动.....〔民主德国〕赫·东凯
-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一些
看法.....〔民主德国〕巴·罗持
- 列宁论异化的扬弃.....〔苏〕弗·赫德勒
-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一书和现代.....〔苏〕И·С·纳尔斯基(87.1)
- 恩格斯与同时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关系
(节译).....〔民主德国〕马丁·科赫 卡尔·海尼格(87.1)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济思想研究

- 关于马克思《反思》手稿和斯密两种
贸易规模相等命题的探讨.....沈志求(89.3)

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研究对制定他的使用价值

理论的意义……………〔民主德国〕吉·施皮勒(88.2)

论《大纲》中的“资本和利润”……………〔日〕内田 弘(88.4)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形成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研究)

……………张钟朴(87.2)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

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民主德国〕曼·缪勒(87.3)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起点问题……………李善明 杨致恒(87.3)

农业化学和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发展……………〔苏〕米·泰尔诺夫斯基(88.3)

马克思1866—186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

著作的纪事……………〔苏〕Л·Р·米兹凯维奇(88.4)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产生……………王全民译(87.4)

价值理论在《资本论》第一版的补充和修改

(1871年12月—1872年1月)中的发展

……………〔民主德国〕巴·里茨(89.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

——关于当代该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日〕一之濑秀文(88.1)

关于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等问题

的再思考……………〔日〕静田 均(89.1)

论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肖贵毓(89.3)

列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创立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理论

——介绍《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杨祝华(87.1)

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的理论原则和发展规律

……………林 晓译(88.1)

苏联过渡时期经济政策演变的规律和特点……………〔苏〕B·П·德米特连科

论经济政策的开始阶段……………〔苏〕Л·Ф·莫罗佐夫

经济政策中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苏〕З·Л·奥斯科尔科娃

-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苏〕H·Φ·库兹明
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条件下理论和实践
的相互作用(1921年春天至夏天)
……………〔苏〕E·B·奥列谢尤克
在公有化过程中调节多种成分的经济的原则和方法
……………学 思译(88.2)
过渡时期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工业化问题
……………〔苏〕Э·К·兹韦兹金 С·В·库利奇茨基
苏维埃国家的合作化政策……………〔苏〕П·Е·法因
调节私营商业和工业企业经营活动的阶段和方法
……………〔苏〕B·A·阿尔希波夫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过程中过渡性经济形式的利用问题
……………〔苏〕B·П·丹尼洛夫
列宁合作化思想探讨……………(88.1)
列宁的合作社思想的来龙去脉……………杨承训
列宁合作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合作社发展的基本趋势……………闻 一
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杨存堂
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总体战略目标未变……………南俊英
谈谈苏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问题……………张伟垣
全盘集体化与列宁合作制思想之间的继承性和非继承性……………陈鸿寿
列宁并没有放弃利用集体农业形式来改造小农的思想……………李庆曾
《论合作社》一文中的合作社含义与性质……………陈文科
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聂运林
列宁的《论合作社》与过渡时期理论……………林蕴辉
谈谈列宁晚年合作化思想的发展……………车有道
列宁的《论合作社》与苏联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徐博涵
合作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路……………李洙泗
合作化·社会化·集约化——谈合作社的发展方向……………郑异凡
列宁《论合作社》译文的几处重要修改……………郑异凡
关于“合作社”的百科全书辞条选译……………丁世俊译(88.4)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过程
.....〔民主德国〕约·海尔曼(87.4)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义和影响
.....〔民主德国〕约·海尔曼(88.1)
- 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徐若木(87.1)
- 马克思恩格斯与柯瓦列夫斯基及其著作
.....〔联邦德国〕汉斯-彼德·哈斯蒂克(87.3)
- 马克思对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
所做的摘要笔记简介.....王宏道编译(87.3)
- 两种生产和两个转变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研究.....徐若木(89.3)
- 关于“原生形态”概念的历史(马克思著作中
的原始社会概念).....〔苏〕H.Б.特尔-阿科皮扬(87.2)
-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困惑与思考(提纲)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张奇方(89.1)
-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
会部分论文摘编.....道木摘编(87.4)
- 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贺麟
- 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艾福成
- 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许苏民
- 原始道德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张正霖
- 试析《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nation
一词的涵义.....王明甫
- 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人类学笔记”.....荣钊
- 恩格斯晚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贡献

-〔苏〕鲍·塔尔塔科夫斯基(89.4)
- 对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的初探肖贵铤(89.4)
- 列宁论党领导管理苏维埃国家问题王立行(87.4)
- 列宁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
.....〔苏〕弗·伊·波波娃(87.2)
- 列宁与“工会国家化”问题杜应国(88.3)
- 列宁对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工作
的领导刘彦章(88.1)
- 关于改进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
主义作斗争格·季诺维也夫(87.3)
- 苏联对科学共产主义对象问题的最新
研究〔苏〕Э·В·塔杰沃相(87.1)
- 苏联社会阶段划分理论发展的若干问题帅永章(88.2)
-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帅永章编译(87.1)
-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端问题.....〔苏〕А·Э·施捷克利(87.3)
- 托马斯·卡莱尔与空想社会主义
.....〔苏〕伊·尼·奥西诺夫斯基(87.2)

国际共运史研究

-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的信金嗣焜译(87.2)
- 莫泽斯·赫斯的十篇政论文章.....王宏道译(88.2.3)
- 约·格·埃卡留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
一组文章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民主德国〕乌·艾姆里希(88.3)
- 流亡者联盟中的早期无产阶级纲领
.....〔民主德国〕沃·迈泽尔(87.2)
- 关于苏联历史著作中拉萨尔主义的目前
评价的形成史.....〔苏〕尼·格·费多罗夫斯基(89.3)
- 列宁主持召开的人民委员会会议

- 第4—10号记录……………孙凌齐 王士云译(88.4,89.1)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 全国代表会议记录……………王士云译(89.3、4)
- 研究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参考资料
- 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俄〕弗·亚·巴扎罗夫(89.1)
-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对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
- 错误观点的批判(摘译)……………〔苏〕阿·鲍·列兹尼科夫(87.3)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
- 个人迷信的百科全书……………〔苏〕H·H·马斯洛夫(89.3)
-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苏〕A·齐普科(89.4)
- 论策略……………〔俄〕格·普列汉诺夫(89.4)
- 苏联新发表的布哈林的信……………宋洪训译(89.3)
- 布哈林和他的帝国主义论评介……………商德文(88.2)
- 1929年的转折和布哈林的
- 选择……………Г·А·博尔久戈夫 B·А·科兹洛夫(89.2)
- 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 ……………〔奥〕古·埃克什坦(88.4)
- 希法亭反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顾海良(88.3)
- 关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殷叙彝(87.3)
- 社会民主主义的来源及其变化……………张世鹏(87.3)
- 苏联百科辞条选译
- 自由主义……………薛春华译(88.3)

传记和回忆

- 恩格斯1881年夏的美国和加拿大之行
- ……………〔民主德国〕托·波勒(88.4)
- 恩格斯1849年夏在瑞士的政治流亡
- ……………〔联邦德国〕米·克尼里姆(87.2)
-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

- 期间同莫泽斯·赫斯的关系……………〔苏〕雅·罗基扬斯基(88.3)
- 莫泽斯·赫斯——生平、著作以及和马克思的交往
……………侯才(88.3)
- 关于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摘译)
……………〔苏〕M·B·谢列布利雅科夫(88.2)
- 马克思和罗·丹尼尔斯及其《小宇宙》
……………〔联邦德国〕赫·艾斯纳(89.2)
- 马克思恩格斯和巴·瓦·安年柯夫
……………〔苏〕И·И·科诺别耶夫斯卡娅, В·А·斯米尔诺娃(89.1、2)
- 马克思和约·列列韦尔……………〔波〕A·Φ·格拉布斯基(89.4)
- 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恩·德朗克传略
……………〔民主德国〕伊·洪特(89.1)
- 写于1872年的马克思传记……………〔民德〕英·吉斯豪艾尔(89.2)
-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马里扬诺夫
……………〔苏〕Д·И·安托纽克(87.1)
- 约翰·马克林传……………〔英〕威·诺克斯(88.4)
-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选载……………
- 特·阿多尔诺……………李惠斌译(88.2)
- 沃·本杰明……………王吉胜译(88.2)
- 米·马尔科维奇……………苑洁译(88.3)
- 阿·赫勒……………李惠斌译(88.3)
- 佩·安德森……………李惠斌译(88.3)
- 约·伯杰……………李惠斌译(88.3)
- 克·拉希……………王吉胜译(88.3)
- 莱·科拉科夫斯基……………苑洁译(88.4)
- 亚·沙夫……………苑洁译(88.4)
- 拉·米利班德……………李惠斌译(88.4)
- 詹·R·奥康纳……………王吉胜译(88.4)

学术讨论和动态

- 目前围绕《资本论》初稿进行的争论……〔苏〕阿·切普连柯(89.4)
- 马克思体系中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
……〔德〕拉·冯·鲍尔特凯维茨(87.1—2, 88.3—4)
- 关于“转形问题”的产生以及五十年代以前国外的
研究情况……〔日〕种濂 茂(87.1)
- 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
情况……〔日〕高须贺义博(87.2)
- 七十年代以来的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研究
概况……李成鼎(87.3)
- 对所谓马克思“市民理论”的质疑
——沈越同志《“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
“市民权利”》一文商榷 刘暉星(88.2)
-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它的当代“批评家”
——理论战线上的某些争论问题……岑川译(87.4)
-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定不了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石沛征(88.2)
-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迫切问题……毛卫平译(87.4)
- 从马克思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点的三次转变
看哲学和经济学的交融发展……高新军(87.4)
-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现时代……〔苏〕B·邦金 A·叶非姆金(87.3)
- 试论生产关系国际化……马丁(87.1)
- 苏联《哲学问题》主编B·A·列克托尔斯基
谈当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邢艳琦译(89.2)
-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
——苏联《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简介……詹汝琮(87.1)
-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苏〕Л. П. 梅斯里夫钦科(89.1)
- 当代对辩证法的研究.....〔苏〕Л. Э. 文茨科夫斯基(87.1)
- 评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王吉胜 童国木(89.1)
- 也谈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刘玉昕(89.2)
- 葛兰西是唯心主义者吗?.....毛韵泽(88.1)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和改造.....〔美〕诺·莱文(89.2)
- 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批判.....〔意〕德拉-沃尔佩(89.2)
-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克·巴雷尔(89.4)
-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波〕奥·兰格(89.1)
-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英〕J. 施瓦尔茨曼托(89.4)
- 《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美〕劳·克拉德(87.2)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
-〔美〕劳·克拉德(89.3、4)
- 马克思恩格斯与自然史和人类史辩证法的关系
-〔美〕劳·克拉德(87.3)
- 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和妇女解放
-〔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87.2)
- 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杜章智(87.1)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类学和科学的人道主义
-〔法〕L·塞夫(89.2)
- 法国的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洪饯德(89.1)
-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
-〔美〕诺·莱文(88.3、4)
- 从总体上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衣俊卿(89.3)
-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和划分.....燕宏远(88.3)
- 新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洪饯德(89.3)

- 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的贡献 洪镰德(88.4)
- 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剖析 洪镰德(89.2)
-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昨天和今天 南山译(88.3)
- 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阶段
和后马克思主义阶段 [奥地利]安·佩林卡(89.2)
- 国外对卢卡奇思想的探讨 劳徒(87.4)
-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者的
卢卡奇·捷尔吉 [苏]T·И·奥伊则尔曼(87.4)
- 卢卡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杜章智 周穗明 翁寒松(89.2)
- 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的概念 周穗明(89.3)
-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赵桂琴(89.1)
- 卢卡奇晚年对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批判 宫敬才(89.3)
- 卢卡奇和胡塞尔 [匈]米·瓦伊达(89.3)
- 阿尔贝斯论鲍威尔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 殷叙彝编译(89.4)
- 葛兰西思想的主要特点 张本(89.4)
- 纪念葛兰西 [英]马丁·雅克等(88.1)
- 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对科莱蒂的批判
..... [美]安·史密斯(87.3)
- 恩斯特·布洛赫的生命哲学
..... [联邦德国]R·施泰格瓦尔德(87.1)
- 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和希望的思想家
..... [南]戈·施科里奇(87.1)
- “真正的哲学是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
——霍克海默的晚期思想 [联德]H·贡尼 R·林古特(89.4)
- 阿尔都塞思想简评 彭赞(89.1)
- 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简介 李其庆(89.1)
-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范畴 衣俊卿(89.1)
-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异化观 衣俊卿(89.2)

- 弗兰尼茨基论实践与辩证法的基础·····柴方国(89.4)
- 佩·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他·····杜章智(88.2)
- 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托派概念
 ······〔美〕保·皮孔(88.3)
- 阿·古尔德纳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类和对
 佩·安德森的批评·····杜章智(88.1)
-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节译)·····〔美〕阿·古尔德纳(88.2)
- 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研究什么和争论什么
 ······〔苏〕M·H·格列茨基(87.1)
-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一些现象的
 思考·····〔英〕阿·齐曼斯基(87.4)
- 米·马尔科维奇谈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刘丽明译(89.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匈〕卢卡奇·捷尔吉(87.4, 88.1)
- 革命的现实政治·····〔匈〕卢卡奇·捷尔吉(89.1)
- 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本体论基础·····〔匈〕卢卡奇·捷尔吉(89.4)
-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卡·科尔施(88.1、2)
-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路·阿尔都塞(88.4)
- 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法〕路·阿尔都塞(89.3)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意〕L·科莱蒂(89.3)
-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革命思想
 ······〔南〕加·彼得罗维奇(89.2)

书刊评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的现状和今后的
 任务·····〔民主德国〕埃·昆德尔〔苏〕亚·马雷什(88.3)
- 苏联发表列宁新文献一百余篇
 ——《列宁文集》第40卷简介·····韩江(87.2)

- 一本研究《资本论》方法论和现代科学的书……………京 祚(87.3)
- 一部研究《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和范畴
的专著……………王孝勇(87.4)
- 《〈资本论〉的第一个俄译者》……………林 东(87.2)
- У·И·格林：《〈资本论〉的译者和出版者》……………平 瑞译(87.3)
- 民主德国研究《资本论》第二稿的最新成果……………朴金中(87.3)
- 西方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专著……………陈国维(87.3)
-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学》简介……………徐 汶(88.4)
- 《论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一书出版……………禾 子(88.2)
- 苏联新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开始出版……………晓 戈(87.2)
- 美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百科辞典》……………水 月(88.1)
- 关于列宁在十月革命这一年的国际活动的
文献资料……………徐 汶(87.3)
- 《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的发展趋势》简介……………徐 秋(88.2)
- 《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一书简介……………王淑秋(87.4)
-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编：《科学的分类：
马克思对未来科学的预测》……………章 沛译(87.3)
- 沃·弗·豪格：《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
文化的论文集》……………殷叙彝(88.1)
- 波兰发行新的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
思想》……………徐小英(87.1)
- 《当代马克思》——法国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李其庆(87.3)
- 法国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当代马克思》第三、
四期目录……………李其庆(88.4)
- 《国际共运史研究》出版……………(87.2)

读者·作者·编者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美国新
百科全书》的某些条目非恩格斯所写……………马 兵(88.3)

-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统一战线”一词……………编者(88.4)
- “统一战线”一词的由来……………夏洪跃(87.4)
- 列宁讲过三种含义不同的国家消亡……………张慕良(88.2)
- 是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反对经济计划?
——从一段列宁话语的译文修订谈起……………丁世俊(89.1)
- 应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土地问题(涉及王安石)
的一条脚注……………郭值京(87.3)
- 列宁在政府部门人事制度中实行
“亲属回避”原则……………施均(89.2)
-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被列宁否定的“旧观念”
——答张克明同志……………何宏江(87.4)
- 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译文的
几点意见……………伍铁平(87.3)

简 讯

- 轰动一时的发现……………王栋华(87.2)
- 国外陆续发现伊·恩格斯致弗·恩格斯的
二百余封书信……………佟迅(87.1)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研兵(88.2)
-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
研讨会”在榕城召开……………闻文(87.2)
- 全国第二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讨会
在贵阳召开……………其芳(89.3)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编委会在柏林
召开学术讨论会……………〔民主德国〕瓦·奥比茨(87.3)
- 马克思故居举行“德国唯心主义和法国革命”
专题学术讨论会……………韦建华(87.3)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MARXISM-LENINISM
(QUARTERLY)
NO. 4, 1989 (Serial 58)
CONTENTS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arx's and Engels's Theory fo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Xiao Guiyu
On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G. Steiger (DRG)
Questions and Deliberations Concern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Asia" (Outline)
-- From Marx's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His Notes on Anthropology Written
in His Old Age.....Qi Fang
Engels'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Works of
Marxism in His Old Age.....B. Tartakowski (USSR)
On the Origin of Stalinism.....A. Chipuko (USSR)
Academic Discussion Abroad
The Present Debate on the First Draft of *Capital*.....
.....A. Chepurenco (USSR)

Documents and Material

- Marx and J. Lelewel.....A. F. Glabski (Poland)
On Tactics.....G. Plekhanov (Russia)
The Minutes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 (Held in Prague)

..... Translated by Wang Shiyun

Western Scholars' Studies of Marxism

-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msci's Thinking..... Zhang Ben
- Alberz's Discussion of the Marxist Thinking of Bauer and Gramsci.....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Yin Xuyi
-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Ethnology Compared (II).....L. Krader (USA)
-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 Barrère (France)
- The Marxist view of State.....J. J. Schwarzmantel (Britain)
- Vranicki's Discuss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Practice and Dialectics..... Chai Fangguo
- "A Genuine Philosophy Is Critical and Pessimistic" —Horkheimer's Thinking in His Old Age..... H. Goani and R. Lingudt (FRG)

Selected Writings of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Marxism Abroad

-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Thinking and Action.....G. Lukàcs (Hungary)
- A Word for the Readers
- The Contents of Issues from 1987 to 1989.....